

中共党史资料

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

井冈岁月今忆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

“四清”记

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

马林来华与国共合作

关于旗帜问题的历史回顾

64

总第六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英档案馆

1997年12月出版

98852

D239
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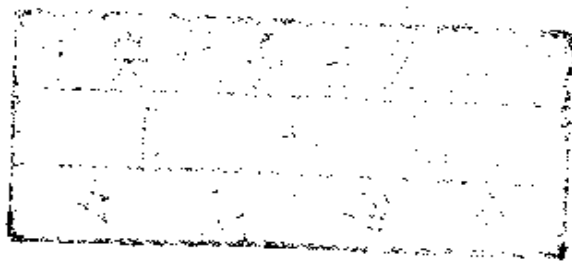


200041347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主 编：韩泰华

副 主 编：杨公之
陈 夕

文献编辑：罗一恒

本期责编：刘荣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第 64 辑/韩泰华主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12

ISBN 7-80136-085-0

I. 中… II. 韩…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 V. D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7577 号

中共党史资料 (64 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 央 档 案 馆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62881570 传真：(010)628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7.125 印张 160 千字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ISBN 7-80136-085-0/K·75

定 价：6.00 元

目 录

文献资料

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 (1)

回忆录

井冈岁月今忆 欧阳毅(35)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 穆欣(50)

“四清”记 李新(85)

访谈录

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

——访吴恩远 陈夕(112)

专题资料

马林来华与国共合作 王德京(127)

1925—1926年胡汉民的莫斯科之行 李玉贞(146)

苏联、共产国际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郭红婴(156)

人物介绍

- 胡耀邦与青年团工作…………… 陈 模(171)
李硕勋在香港、海南的英勇斗争 …………… 何锦洲(181)

地方党史

-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作用…………… 王 棣(190)

资料文摘

- 关于旗帜问题的历史回顾…………… 郑必坚 龚育之(200)
邓小平何时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
…………… 高 放(203)

译文选登

- 联共(布)领导对国民革命军北伐态度的演变
…………… [俄]A. И. 卡尔图诺娃著 马贵凡译(207)

信息窗

-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概述…………… 霍海丹(219)
新书选介…………… (224)
封面照片:黄洋界战斗遗址

林伯渠日记

(1935年5—11月)

编者按：林伯渠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革命事业。1934年10月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中央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部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

这里刊登的是林伯渠在长征途中的《日记》，时间从1935年5月起至11月止。它记录了此期间中央红军的行军进程以及林伯渠的所见、所闻、所行，为长征史和林伯渠生平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日记》按照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在此首次公开发表。由于该《日记》记于长征途中，环境恶劣，时间紧迫，记录比较简要，有些文字和语句不连贯，有些地名甚至用了难以辨别的同音字。为保持历史文献全貌，本辑编发时只作了最必要的订正。

毛儿盖(与松潘并列)——此地番民□□(□号为无法确认的字。下同——编者注。)十八寨，每寨一二百人不等。有三四个汉人在该处做生意。有土司官，有一喇嘛寺，共有和尚五六百人。从此西行即草地，从此东行走两天马

路到卡龙山又一三〇里，到红桥关即松潘附近。由毛儿盖东北行到两河口（岷江南源）不知里数。

一九三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晏**。早六时由泸定行，行五十里经冷基到兴隆坝（龙八埠）宿营。

今晚开少数民族（夷民）会，博古同志意见：1、夷民尚未形成一民族；2、须要在阶级上侧重联络白夷。

我主张提出：A、民族自决；B、区域自主。

闲说话中未将侧重白夷事加力说明。

六月一日，**雨**。早六时半行，行二十里到化林坪宿营。午后五时纵队部开会，洛甫同志报告：渡河以后 A、能渡河之三点：（1）党与军委战略正确；（2）红军英勇；（3）群众拥护。

B、今后任务四点：（1）提高士气消灭敌人；（2）巩固和扩大部队；（3）加强赤化工作（地方工作）；（4）瓦解白军。

C、继续开展反右倾：a、过分估计敌人力量；b、不信自力；c、渡河后苟安心理。

六月二日，**雨**。原地休息一天。拟文件。

六月三日，**晏**。早五时半行，行一百〇五里到水子地宿营。

六月四日，**晴**。原地休息。

六月五日，**晴**。原地休息。

六月六日，**曇**，午后雨。早九时行，行约四十里到张家坝宿营。同日，经过泡桐岗，甚峻而路滑长。

六月七日，**晴**。早六时行，行三十五里到干河宿营。

六月八日，**晴**。早五时行，行四十里，午十二时到天全县城宿营。

六月九日，**晴**。原地休息。收集工作。

六月十日，**晴**。原地休息。收集工作。

六月十一日，**晴**。早三时行，行约八十里到灵关，前进四里之中坝宿营。

六月十二日，**曇**。早四时行，行五十里到宝兴县宿营。

六月十三日，**曇**。早四时行，行约六十里到盐井坪宿营。

六月十四日，**曇**。早六时行，行约三十五里到硃磧欠四十里之河桥边，露宿营。

六月十五日，**晴**。午十二时行，行约四十里到夹金山下之大硃磧宿营。

六月十六日，**晴**。早六时行，行四十里到新寨子宿营。

六月十七日，**曇**。早四时行，行约七十里，经过夹金山（邛崃山系上下约四十里），午后一时半抵达维宿营。与红四方面军之一团见面。

六月十八日，**晴**。早五时行，行九十里，午后二时抵懋功县城，住新街子，当即约叶季壮、李湘玲、吴东生、杨至诚开粮食会议。

六月十九日，**晴**。原地休息。工作第一天筹集粮食一万七千斤。

六月二十日，曇。午后五时开军委纵队及红四方面军干部同乐会。

本日(筹粮第二天)收粮四万一千斤。

六月二十一日，曇。原地休息。

六月二十二日，晴。军委电令前进，午刻行，行约七十里抵八角宿营。

六月二十三日，晴。早五时半行，行一百四十里，晚七时抵两河口。

六月二十四日，晴。原地休息。集粮工作，共买收麦子三十斤，交总政；猪一只，交一科。

六月二十五日，曇。原地休息。集粮工作，收粮二百八十斤，大米八斤。

六月二十六日，晴。原地休息。没收牛三匹。

六月二十七日，晴。原地休息。

六月二十八日，曇。原地休息。纵队司令部开动前进。

六月二十九日，雨。原地休息。午后决定明日午前同往慰劳红四方面军^①。

六月三十日，曇。午十二时行，行约六十里在红桥山麓宿营。

七月一日，晴。早五时行，行约一百〇五里到大秋地八十七师政治部宿营。

七月二日，晴。早六时行，行约八十里到关口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宿营。

^① 同往的有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等。

七月三日，晴。午前十一时抵杂谷脑，部队及番人群众均列队街口欢迎。午餐后伯承、富春赴东门外访徐、陈^①原总兵站部部长吴先恩。余留此^②。

(□：前方共有粮三千六百石)

军委 主 席 张〔国焘〕^③

副 主 席 徐〔向前〕

陈〔昌浩〕

参 谋 部 长 倪志亮

总供给部长 熊国斌

医务部、总医院 周光坦

兵站部 吴先恩

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陈昌浩(兼)

副主任 曾传六

傅 钟

总指挥 徐〔向前〕

总政委 陈〔昌浩〕

副指挥 王树声

参谋六人

前方 总 政 主 任 傅 钟

① 即徐向前、陈昌浩。

② 慰问团到杂谷脑后，得知红四方面军后勤机关和中共川陕省委在此，遂决定林伯渠留此慰问，本日记及7月4日、5日、9日的日记记录的就是林伯渠在此了解到的四方面军的组织结构、人员编制、所存现款物资与粮食情况以及为四方面军制定的筹粮计划。

③ 方括号内的文字为编者所加，下同。

第四军军长	王宏坤
副	刘世模
政委	王建安
第九军军长	何畏
副	许世友
第三十军军长	余天云
政委	李先念
副	程世才
第三十一军军长	孙玉清
政委	詹才芳
三十三军军长	罗南辉
政委	张广才
西北特委书记	周纯全
宣传部	刘瑞龙
组织部	谢浚之
妇女部	张琴秋

军 A、参谋处主任 12 人

B、政治部

- | | |
|-------|---------|
| 1、宣传科 | 5、白兵工作队 |
| 2、组织科 | 6、保卫连 |
| 3、政务科 | 7、通信队 |
| 4、地工队 | 8、训练队 |

C、经理处

D、医务处

师 A、参谋处主任

B、政治部

C、经理处

团 共十二连(内九个步兵连) 1100人 700枪

A、政治处主任

B、经理处处长、指导员

C、医务所主任、指导员

D、机关连长、指导员

E、特务连连长、指导员

另外有：传令排、特务队(便衣队)，又两个步兵

营

营 营 长

副营长

政 委

传令排

管理排

战委会：每星(期)开会一次

五委员会：一、经济，二、卫生，三、游戏，

四、文化娱乐，五、主席

连 连 长

指导员

三个步兵排

四、机枪排

五、管理排 约十五人

六、支书：青年小组长

宣传干事

组织干事

每连党团员约三十人。每排三班，照编制每班十一人，实际八人左右。

七月四日，晏，晚雨。游喇嘛寺即刘湘派简某所驻之寺，前回此宝殿寺已燃一部。晚与粮秣处总兵站工作人员谈话。

九 军		四 军		三十 军			三十一军				
二十五	二十六师	二十七	十一师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一	九二	九三		
七三、七四、七五	七六、七七、七八	七九、八〇、八一	二八、二九、三十	三一、三二、三三	三四、三五、三六	三六、三七、三八	二六五、二六六、二六七	二六八、二六九、二七〇	二七一、二七二、二七三	二七四、二七五、二七六	二七八、二七九、二八〇
每连二轻	每团八重										

① 此处“四、五、六”的顺序号与上边不一致，原文如此——编者注。

熊国斌 总供给部长
王维舟 原三十三军军长 现充经委主席
宣汉人
罗南辉 〔原〕三十三军副军长
郑亦武 军需处长兼制造处长
吴西太 粮秣处长
吴永康 财政处兼财委会

九军供给部

- | | |
|-------|----------|
| 1、总务科 | a、缝厂三十五人 |
| 2、军械科 | b、修械所十二人 |
| 3、被服科 | c、熬盐 |
| 4、粮秣科 | d、打袜二人 |
| 5、出纳科 | e、打斗篷六人 |

财委报告：

- 1、现洋(内有金)：十六万元
- 2、银子：二万四千两
-
- 4、镪水：二十五措，每措五十斤
- 5、白菜：二百八十斤，每棵六分
- 6、白耳：二百两
- 7、洋油：二百瓶
- 8、大小绸缎：四百米
- 9、派财经委员

皮衣九万二千，金子一千两。各军现款约四五万

元在外。

七月五日,晴。参观第九军供给部承运红军帽大衣等。

七月六日,晴。与财委军需处谈事,晚参加省委会议。

粮食

土门 二〇〇

茂州 三〇

上下孟屯□□ 五〇

卜其沟 三〇

乾坡 八〇(加二十石)

九军供 一〇〇

通化三十军 三〇

粮秣处、喇嘛寺 四〇

粮秣处、理番 四〇(加一〇三石)

计 六〇〇

军需处本身工作人员 三六〇

又运输员 四〇〇

又制造处 八六〇八

其余无报告

银行会计 苏永冈

□□ 曹书城

粮食开支

1、总分医院、附□总处 共二万人

2、红大、工大、警戒队、省一级 五千人

3、兵站运输员、县役、各军后方、地方武装 五千人

(一)粮食计查

a、目前第一期需要多少

b、探买区域

c、各部分分工合作,并要报告探粮数

d、分配

e、运输计划

(二)各资材运达某地尤其是菜叶

(三)实行簿记与单据

(四)行动中应不使用票币

拟集粮数与区域

下上孟屯与九子沟 三〇〇石

卜其沟——千坡 三五〇

威关——杂谷脑 一五〇

扣苏九沟、甲比、喇嘛寺 三〇〇

七日起,自七日以十天计,前后需二千四百石,除已有四百石外,此一带可筹一千一百石,尚缺九百石,拟电由卓克基筹三十万斤。茂州、通化、东门外沟尚可收粮。

1、对土豪收麦;

2、以……菜叶换。

七月七日,晴。晚国、富、伯各□□自东门外回。

七月八日,晴。参加K·T·动员会。

七月九日，晴。筹粮商议，拟集粮地区：

上下孟屯——九子沟 三〇〇石

蒲汉沟——干坡 四〇〇

威关——杂谷脑(达色尔沟、胆占木) 二〇〇

扣苏九沟、甲比、喇嘛寺 三〇〇

梭罗进三十里 五〇

现有粮食(七月九日计)：

1、粮秣处、喇嘛寺 三〇·八斗

2、理番各机关 二〇

兵工材料：

1、铁钢丝为炸弹弹簧材料

财：

现洋：一万八千元

银：二万四千两

金子

茶叶

带银二万两

带现洋四千(内三□票二千)

用中央元票，用四方面军三□票

茶叶：茂州运四百包到沙坝，杂谷脑运四百包到

马塘

通知各机关熬盐

军需：羊皮一千张、扒山□五百件、布三百尺、羊

子一千五百头

督促各军做羊皮衣

土工作业器具已发了一部

经济公社每日出二十五打

约存四百打,一方面军送一千

存纱九千斤

现有铁工四十,每日造炸弹五百个

现存盐四千五百斤

每日熬盐可出一百斤

军需科护送锅子到芦花

现存毛牛三十九只

存牛粉六百斤

又财处存三百斤,羊干一百斤,九军存牛粉一万
六千两

粮秣科 五十五人

找十个番人当干事以便弄粮,由省委书记负责,
各区组织一队。

兵站科 共二千二百四十一人

马一八三匹

招待处十四处

二百二十八人(马伕)

造船(威茂)二九一人

修路二十二二人

一千二百二十八人(运伕)(一〇二人一个中队)

大衣六百件 单衣二百五十 棉衣五十

炸弹三十箱 银一千八百元 袜子一千双

派伙伕六十七人、二十一人(原拟每军抽一百)

七月十日,晴。拟行未得行,现定明早成行,未知有变更否?

七月十一日,晴。午后二时半由杂谷脑行,行三十里到关口宿营。

七月十二日,晴。早六时行,行七十五里到大秋地三十军政治部宿营。

七月十三日,晴。行一百里到丰头寨宿营。

七月十四日,晏。早五时半行,行七十里到马塘宿营。晤四方面军经委负责人王维舟同志。

七月十五日,晏。早六时行,行九十五里到马河坝宿营。

七月十六日,晴。早六时半行,行八十里,午后五时半抵侧格宿营。

七月十七日,晴。原地休息。筹粮。

本纵队各单位粮食调查 七月十七日

名称	人数	名称	人数
一科	105	总政	150
二科	55	二十九分队	56
三科	41	五分队	92
中央一	49	六分队	112
中央二	32	警卫一连	84
中央三	29	通信连	93

侦察队	37	(总卫生部)	(35)
保卫局	32	电话队	80
收容队	35	一科运输队	39
卫生所	12	计	1195

以一千二百人计算,每人日需粮食一斤,计二十天共需二万四千斤,已有粮食三千六百二十斤,割回麦子二千七百一十斤,合共六千三百三十斤,尚欠一万七千六百六十八斤^①。

七月十八日,晴。早八时到大村(罗坝街)工作团督促筹粮。罗坝街可割一万斤,交教导团可作十五天之用。

工作团在卓克基(马尔康大部队、松冈、腊蚂沟)区域

老三	二〇,〇〇〇
老一	六〇,〇〇〇
前梯	一六,八〇〇
后梯	六四,四〇〇
四方面	五,〇〇〇
老九	五,〇〇〇
计	二七三,二〇〇 ^②
又索横	七,〇〇〇
盐	七,〇〇〇
羊	二〇〇
猪	七〇

① 记录有误,应欠 17670 斤。

② 记录有误,应为 271200。

a、请补足教导营，以便筹粮；

b、请四方面军派员参加割粮、分粮（在未派员以前，应有介绍信），8‰购粮，2‰买皮衣

四个地区 阿坝

傅钟政〔治〕部拨一部运粮及其他军部拨一部（5000人马）；

c、探粮、管粮、分粮；

d、一月三十六斤（或四十斤），动员购粮须政部负责；

e、运茶叶问题并以茶交换粮；

f、军委会拟定支出。划区、购买、组织（或□粮食、农具），问总政□□人员。

七月十九日，晴。由罗坝街返侧格。是日决定恢复总供给部，内分军需、制造、财政、粮秣等四处。

七月二十日，晴。原地休息。（1）帐棚及布；（2）牛马之收集；（3）羊及羊布；（4）设仓德招待所事，银子并存；（5）设运输站及于军宣处下设运输科。

七月二十一日，晴，午后雨些许。是日午前十时由侧格行，行四十五里到仓德宿营。

七月二十二日，晴。早五时行，行六十里到中打鼓宿营。

七月二十三日，雨。早五时行，行约一百里（过雪山^①）到沙窝宿营。

七月二十四日，午前晴，后雨。十二时到毛儿盖晤五

① 指打鼓雪山。

科政委商事。

七月二十五日,晴。早起布置工作。

七月二十六日,晴。(1)刘明德等赴金藏;(2)朱张^①等来;(3)本日检查□□□。

七月二十七日,晴。到军委商粮问,调干部团到沙窝及本委工作。是日并派二六六团赴金藏筹粮。

七月二十八日,晴。早六时到军委商事,决定派杨至诚同志等十二人随前总部〔到〕小姓沟筹粮。

七月二十九日,晴。至诚随队到小姓沟。

七月三十日,晴。

七月三十一日,晴。筹粮与分粮到极紧张时。

八月一日,曇,变天。决定明早派人去卡力革运粮,今早王盛荣赴卡力革、波罗子。

八月二日,曇。

八月三日,晴。早到一科,午后一时一科电一队等行,到总指挥部又访何畏同志。

八月四日,曇。午前哈龙送毛牛十八只,回至诚附以不正确的分配案当即更正。到一科商行动事,得电波罗子粮无。

希望须等五六天到红则运粮才能成行。

中央在沙窝开会。

八月五日,雨。早起为送银事费事。到一科,又到总指挥部商事。留给傅钟一信,告筹粮布置事并告一切以后

^① 即朱德、张国焘。

处理情形。

今日，中央继续在沙(窝)开会。

八月六日，晴。早起处理带件，到总指挥部决定明日行。

八月七日，晴。早八时行，行不数里，得军委令仍就原地宿营。得悉昨晚沙窝会议已告一段落，决议案已通过，仍驻原地整理一时期。

八月八日，晴。预拟二次筹粮计划。

八月九日，晴。(a)早访毛主席(b)派一部分人到卡力革取粮(c)八时召开供给会议，九时许移至总指挥部开会(d)规定二次筹粮计划：(1)集粮五十万斤，卡力革十万，毛儿盖四十万；(2)卡力革十号开始割麦，毛儿盖十五号开始割麦。

八月十日，晴。粮委第一天工作：(a)第一大队插牌分区(b)组织纠察队(c)结束松潘案(d)发出第二计划。

八月十一日，晴。割麦与运输人数不足之补救。

八月十二日，晴。(1)加紧纠察队工作；(2)进行分队调查；(3)第三大队工作。

整个动员，割麦人数只一千四。

八月十三日，晴。派检查组三组出发检查割麦准备工作。到总部商事：(1)加强粮秣处工作；(2)拨警卫连。

八月十四日，晴。开了三种会，动员准备明日割麦。李湘玲由卡力革来。晚到总指挥部发粮七千斤，明日去格德镇。

八月十五日，午前晴，午后雨。是日开始动员割麦，本

部割了三百余斤。今日未出门，小有病。

八月十六日，晴。早餐后到总部补充准备须增一倍，原十四万斤，现须二十八万斤。到第三大队检查动员四到四百余人。朱张来电，要永康带银子去。决定明天永康去□，致义□一信。

八月十七日，晴。（十五一十七）三天割麦统计，三个大队得干麦约一万二千斤（每湿麦三斤当一斤干麦）。

今日一2（原文如此——编者注），经常得麦二万斤，补充八千斤，又部队（1）四万五千斤（2）二万斤（3）七千，共十万。

八月十八日，晴。十二时在四科召第一大队及第三大队开会，决定：（1）十一师归总部，补充二万；（2）三军归一军，后梯及前梯割麦，补充四万五千。

八月十九日，曇。早餐后访富春，谈三军补充粮食事。又访洛甫，谈此次粮问及其中事件。

八月二十日，晴。午后访一军，晤林、左^①谈粮食及供给部事。

八月二十一日，曇。早餐后到总指挥部谈事。吴振城、王盛荣回，吴的报告太不切实。

八月二十二日，晴。纵队命令今日开毛儿盖宿营，明早二时行。本日原驻地未移动。第一次（七月五号——八月十五号）筹粮七十三万斤；第二次筹粮（八月十五号——二十五号），四十万斤。

① 即林彪、左权。

八月二十三日, 晏。早六时由毛儿盖行, 行七十里到腊子塘宿营。是日兵工厂工人掉队十七人及其运输员二十余人又工人家室数(人)。露营, 雨。

八月二十四日, 晏, 时雨。行约七十里到分水岭西北头地区露营。夜雨。翌晨据兵工厂管理员周科长报告: 昨日傍晚兵工厂行到红大后三里地区被敌骑兵袭击, 损失、冲散其运输员约四十余人。

八月二十五日, 晏, 时晴。行约七十里到后河宿露营, 晚来雨, 该地草浅, 无丛树。是日掉资材一措, 860 元。

八月二十六日, 晏, 时晴。是日行约六十余里超过色既坝前约二十里露营。无雨。

八月二十七日, 晏, 时雨。是日行约七十里离班佑四十里地区宿营。夜雨。

八月二十八日, 晏。行约六十五里到向包座方向的白舍宿营, 有房子。

八月二十九日, 晴。早起约至诚、傅钟到总指挥部开筹粮会议。a. 一百一十二万八千斤。b. 三处粮区: 巴西、阿西、包座。c. 时间: 三十号——三号, 共五天。

八月三十日, 晴。派粮秣处赴阿西指导筹粮。

八月三十一日, 晴。平亭卡力革粮委事。

九月一日, 晴。德怀报我三十军于上包座消灭敌四十九师俘一团长。到红大查粮并谈何畏处三军全部来。

九月二日, 晴。到总政开地方工作会议。

九月三日, 晴, 午后雨。是日纵队部行动到阿西, 我们一部分因处理粮食未行。

九月四日, 晷。早餐出发, 十一时到阿西。

九月五日, 晴。午前移驻甲溪。刘有凤报告: (1) 上包座存粮七万; (2) 苏油三千斤。是日拟在□□区域的粮食条例。

九月六日, 晷。致巴西、阿西各一信指示筹粮事宜。总部规定七号——十三号每人有粮二十斤并七天吃粮及另筹帮助左路军的。

九月七日, 雨。(1) 到下包座割麦人未出发; (2) 派莫钧涛到上包座领苏油; (3) 今日总部新指示, 每人须即时筹足十五斤干粮。

九月八日, 晷。派肖正刚到下包座筹粮割麦。……

九月九日, 晴。上下包座筹粮人均未回。……

九月十日, 晴。早三时半(得令) 开行。先到阿西集中, 是日行至拉界宿营, 行八十里。

a. 行动前二三日将运输员全部调出割麦, 临时未回受训实非小^①。

b. 政治处十一人, 工人班十一人, 警卫员五个, 通信员一人, 运输员三人, 工作人员六人, 马伕二人, 特务二人。

c. 掉队的工作人员九人, 通信员四人, 电话员一人, 警卫员十二人。

九月十一日, 晷。行约六十里到俄界宿营。

九月十二日, 晴。到俄(界)。原地休息。开中央会。

① 林伯渠派出的割麦人员, 因部队突然决定先行北上, 50 多人未能调回, 故受到纵队领导的批评。

九月十三日，晴。行四十里到俄头寺宿营。是日开会决定第三纵队各队改编。

九月十四日，晴。早三时行，行约六十里未及阿藏寺之河边村庄对岸露营。

九月十五日，晴。早六时行，行不二三里即阿藏寺，纵队在此宿营。检查担子，失去资材一措，即前次掉队仍没归来之一箱，计金子一百二十七两，文件二包，同时押担子之郭东生同志因押运至管子庄(□□离此五十里)附近被袭击牺牲了，真可惜。午后二时，行约三十里至毛地宿营。

九月十六日，晴。早五时行，行约八十里到黑纳宿营。是日又失一个措子。

九月十七日，雨。午后二时行，行约三十余里到大山中露营。

九月十八日，晴。早五时行，十一时到黑朵(永乐村)大休息。午后二时行，行约二十余里到腊子口露营。

九月十九日，晴。早五时半行，行约九十里，经过大喇(曾人村)，午后五时到离大草坪(台)三里之维格村宿营。此村系回人，群众均在家。

九月二十日，晏。早五时半行，行约七里到鹿园里宿营。是日司令部命令取消先遣工作团、财委会，改组供给处。

午后五时开干部会，毛主席报告行动方针与任务。

九月二十一日，晏。十一时前本处改编完成。支队部命令本处须立开前进五十里之荔川镇筹粮。午后三时行，

行二十五里至哈达铺宿营。

九月二十二日，**曇**。早五时行，行二十里到荔川镇宿营。当一军地工部刘晓同志询悉此间情形。是日接收：(1)粮食约五千斤；(2)油约二百八十斤(四桶半)。

九月二十三日，**晴**。早十时行，行约六十里至古城(间井)宿营。是日因马佚给马吃十余斤麦，把马胀死了。

九月二十四日，**晴**。早五时行，行约一百二十里至离新寺里许露营。明日十时至新寺。

九月二十五日，**晴**。午十二时行，行约四十里到新寺宿营。

九月二十六日，**晴**。早五时半行，行约七十里到浦东连宿营。

九月二十七日，**曇**。早六时行，行约四十里至榜罗镇宿营。

九月二十八日，**曇**。早五时开干部会(全军的)。是日原驻地休息。筹粮工作。

九月二十九日，**曇**，**傍晚雨**。早七时半行，行约五十里到的山坡宿营。

一纵缺：(1)帽子三四六顶；(2)绑带八八五；(3)袜子一二八〇。

九月三十日，**晴**。早六时行，行约四十里到通渭城宿营。

十月一日，**晴**。分配物品。午后五时开同乐会。

十月二日，**晴**。早五时由通渭县城行，行约八十里至梁家河附近宿营。

十月三日, 晏。早五时半行, 行约六十里到宋家山乡村宿营。据说离清江益(似为青家驿——编者注)还有二十五里, 界石铺八里。

十月四日, 晴。原地休息。

十月五日, 晴。早二时行, 行八里到界石铺, 又行六十里到公益镇。

十月六日, 晴。早三时出发, 行六十里经将军堡到马连川宿营。

十月七日, 晏。早一时行, 行约七十里到清上咀附近之掛马沟宿营。是日一纵队在清上咀消灭敌骑兵二连。

十月八日, 晴。早四时出发, 经来山村到白杨城, 原拟在此宿营(约行七十里), 嗣又向北行约三十里到一土围子宿营。是日一纵击溃敌二营, 遇敌飞机二次。本处为分配事与工作团口角(1)凯丰骂人(2)四处工作讨论(3)纪律。

十月九日, 晴。早七时行, 行约六十里经过孟家园到马集园附近宿营。

十月十日, 晴。早五时行, 行约六十里到离吴家原约十五里之乡(李家集)宿营。

十月十一日, 晴。日间原地休息。傍晚六时行, 行约二十里宿营, 大部露营。

十月十二日, 晴。早六时行, 行约六十里宿营木家瓦。明十三日行, 经彭家河、马家堡子到□家湾附近宿营。

十月十三日, 晏。早六时行, 行约六十里到北草湾宿营。

十月十四日,晴。早六时行,行约六十里到离河连湾二十里之地方宿营。

十月十五日,晴。早三时出发,行约六十里经过河连湾到人家岌子北端(徐家庄)宿营。

十月十六日,晴。早六时行,约行六十里到来岳山宿营。

十月十七日,曇。早十时行,行约五十里到扁窑下宿营。是日掉资材单据担子,失银三十两及□科余。

十月十八日,晴。早五时行,行约七十里到陈家湾宿营。

十月十九日,晴。早五时行,行约六十里到猫儿台宿营(属陕甘省庆阳府)。夜约九时行进二十里宿营。

十月二十日,晴。早六时行,行约三十里到吴起镇,前进之黄底沟台(又名彭家沟门)宿营。

十月二十一日,曇。原地休息。此地已有乡苏组织。是日,由乡苏带回购粮七百斤。

十月二十二日,曇。原地休息。

十月二十三日,曇。原地休息。

十月二十四日,曇。原地休息。早餐后到吴起镇,访支队部政治部前委商事。发后方办事处杨立白票一千元,又到离该地十五里(洛河下)之鲍家岭打土围子。晚开同乐会,交供给处事于叶季壮。

十月二十五日,晴,午后雨。早九时到吴起镇开干部会议,到团级干部。毛主席报告:(1)胜利的到达目的地,一年来的奋斗能得如此成绩,并粉碎新“围剿”之各条件,

是党领导正确。(2)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3)任务：
(a)军事、政治教育；(b)争取群众，扩大红军；(c)改善生活，充实被服。

十月二十六日，**曇**。原地休息。得通知决定二十八日进苏区。

十月二十七日，**晴**。原地休息。(1)午后二(时)上政治课一时半。(2)不应发伙食白票三百元：a 前委，b 休养队，c 李德。

十月二十八日，**晴**。早八时趁毛招商^①被服及其器材问题，决定：

甲、(1)羊毛衣五千套(最急)；(2)羊毛短裤六千条(最急)；(3)羊毛风衣六千条(一千最急)；(4)羊毛帽子五千顶(三千最急)；(5)绑带五千双(三千最急)；(6)羊毛棉被二千床(一千最急)；(7)布军鞋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8)夹袜一万二千双(六千急，余次急)。

乙、西药。

丙、无线电器材。

丁、兵工厂器材。

a. 设採办处于凤凰镇^②，以杨至诚为主任。b. 拨款二万七千元交支队司令部，又拨三千交採办处。

十月二十九日，**晴**。早八时行，约五十里到波罗寺宿营。

十月三十日，**晴**。早七时行，行约七十里到高家湾宿

① “趁毛招商”指应毛泽东之召，商讨有关问题。

② 即凤凰寺，在吴起镇东北约二三十里。

营。

十月三十一日，晴。早六时半行，行约七十里经过保安县大休息。群众慰劳。饭后到康家沟宿营。

十一月一日，晏。早七时行，约行七十里到石板（原拟定边县）宿营。

十一月二日，晴。早六时半行，行约七十里到下寺湾（陕甘边区政府所在地）宿营。

安塞，一千担，每石约四百斤，已运来二百（没收的仓在外）。

赤安，四百担，每石约七百斤，过去有义仓约四五不收。

定边、靖边革委，据报，约二三百担。

鄜甘革委，二十运队决定送一百五十担，每担四百斤。

肤甘革委，决定一百五。

洛河川借了一部分（三百石）群众的粮食，粮规定每月每人一斗（四十斤），每月要一千石以上（此间赤卫三千）。

黄米（密子米），每石四元；小米（谷子米），每石四元。

小菜类（咸白菜、洋芋、萝卜、□形、蔓菁圆）。

盐，每斤五分，五元一百斤。

由花马池、由靖边过去七百里。

粮食部长马锡五同志,赤安人。

经济部长焦孟雄同志,关中淳化人。

财政,杨雨亭同志,帮经委。

党、政、军各费每月约五千元。

a、事后有报告。

b、每人每日伙食二分,一律。

c、军医院三分,有时另补。

d、地方供给马干,补发三升,以后二升,豆或包谷十二斤。

衣服问题

a、保卫队、游击队归各分区担任。本分区三千套(决定五千套),每件羊皮三张或四张。进款:①打土豪;②卖牲畜。

b、大红军由省苏担任。

食油:三个大鼎移延川(永平)。

此间群众还用植物油,机关用洋油制过清油,每斤五分。

生羊皮每张二角或三角;黑羊每只一元,白羊二元。

货币:自印一角、二角、五角三种,约四千元。

买入:

东面:河□、汉城、朝邑、通州、蒲城贸易局(另组

织了贸易队)。

东北:由榆林洪山小商人。定边到凤凰市。

南方:淳化有革委,有分区,离三原不远,可买布。

西方:到庆阳西峰镇。

消费合作社四个,洛河川、赤区一二区,布杂。

食盐二个,赤区一二区。

耕牛合作社二个,赤区一二区。

陕北红军公粮一万三千石。宜川可筹五千石。

全区粮食够吃到明年年底,米脂区杨家沟最富。

粮站工作不好,才开始建立。

过去赤卫队,现组担架队。

瓦窑堡兵工厂,又清涧炸弹厂,又十一架缝机,七十
个工人。

永平现有□机,每天可出二百斤,大锅可出六千斤
□□。一个月左右可解决皮服。

葭县有纸工。

山清涧开始分土地。

黄河泛。犯了侵中农。佃中贫富,解决富农不好。

定贫农为地主。

延安、延长把贫、佃农分离。

关中及下寺湾不分之错。

公积:赤安、安塞有合作建立。

生产事业：油坊、粉坊、毡坊。

在赤苏区(政府所在地洛河川)一带正找工人，工人三十人。

安塞、赤安、赤苏各建了一个皮工厂。

农民合作银行，赤苏经委领导，原定一千股，每股三元，拟由政府出六百元。

十一月三日，**雾**。早七时到前委。回到边区特委开会。省委报告及边区军委报告：

颜家沟(属下寺湾)工厂管理人习丙三，帮助屈尚中。

逢三日胡皮头集市，逢五日王家坪集市。

每头好驴三十余元、次十余。每头四十、二十余、八元余。

顶上马百元以上，普通四五十元。

剪羊毛分春秋二季，每匹可收半斤，每斤一角或以下。

棉花从韩城来，延安、延长也产棉。银子八分作一元。

清涧有贸易局。

十一月四日，**晴**。早餐后到政府访人谈事，是日移驻下寺湾市上。

十五军团欠五百件

一纵队短欠二千四百件

15K	500	
1K	2400	背心
2K	600	布棉
	100	

前方	3600	棉
后	400	
	4000	需布 1200 件

裤子	5500
	1000

	6 500
	+ 500

	7000
每匹二条半	需布 2400 匹
	2400 斤

15K	欠 4000 短皮大衣
1K	欠 2600
	1600

	4200
后方	1300

	5500+
--	-------

共需	9500	需 38,000 条皮子
----	------	--------------

风衣内外	42 尺
------	------

棉袄	21 尺
----	------

棉裤	18 尺
----	------

夹被	38 尺 5 寸
----	----------

夹袜	5 尺
----	-----

耳帽 3尺1寸

绑腿 6尺

以上每件□布□

十一月五日,雪(初雪)。原地休息。

任则义 财经委主任

王璞 食米部长

朱副主席 兼土地

朱开全 教育部长

朱宜之〔朱理治〕 陕甘省委书记

高生荣 土地委员

殷原三 负责赤安、靖定工厂

王颂虞 负责安塞

十一月六日,霁。原地休息。

十一月七日,晴。早七时行,行约七十里到高桥宿营。

十一月八日,晴。早七时行,行约六十里到安塞宿营。

十一月九日,晴。早七时行,行约八十里到蟠龙宿营。

十一月十日,晴。午后三时抵瓦窑堡,列队欢迎的群众甚多,当到省委商事。

十一月十一日,大雪。午后三时拟开群众大会,因下雪未果。访省苏马主席、艾部长^①谈话。

十一月十二日,霁。移驻市上。是日拨陕北苏票三千送前方,并拨借现大洋三百元交总供购布。是日致彭毛前方一电并一函。

^① 马主席即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艾部长即财政部长艾楚南。

十一月十三日, 晷。因病未出门。

十一月十四日, 晷。□□□供给管理人开会。

十一月十五日, 晴。发出筹款文件。午后一时开第一次中府会议, 讨论陕西省苏工作。

十一月十六日, 晴。

十一月十七日, 晴。发预决算表, 中府发一号训令。

十一月十八日, 晴。时日令清查。子常决定设毯厂。

十一月十九日, 晴。八时党校开会, 博古报告肃反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 晴。召马、艾诸同志开经济会议。是日概算□□集, 经常六万六千, 临时五万六千元。

十一月二十一日, 晴。决定预算标准。

十一月二十二日, 晴。与延长、永平工友代表定生产工作条约。

十一月二十三日, 晴。清涧等四县财长来谈, 定泽民任经长。

十一月二十四日, 晴。早与泽民谈话。午一时参加陕北财长联席会议, 到十二县市区。

十一月二十五日, 晴。继续开财长联会。晚永平(延川)来谈总医院达会用苏票。

十一月二十六日, 晴。整理内部。开印所工会增加伙食为一元。今早敌机来□。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晴。核编预算。

十一月二十八日, 晴。午后一时开中府会议(第一次), 讨论财政经济。

十一月二十九日，雪。八时中央开会，洛甫同志报告统一战线问题。

十一月三十日，曇。早餐后到办事处。是日拟发兑现手续布告一件。晚招印所工人开会。

井冈岁月今忆

欧阳毅

1997年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70周年。每当回首那段难忘的岁月，总是心潮起伏，不能自己。随着岁月的流逝，健在的井冈山老战士已不多了，我有责任尽可能地回忆那一段峥嵘岁月的片片断断，作为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一、第一次见到“毛师长”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井冈山。那时，指战员们对他的称呼不是早期大家习惯的“毛委员”，也不是后来全党全军都习惯的“毛主席”，而是除了井冈山战士之外都很陌生的“毛师长”。

1928年4月20日前后，萧克率领宜章独立营在资兴县东南三四十里的龙溪洞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了。我们是湘南暴动部队中最先与毛泽东部队会合的部队。萧克头一件事就是打听毛泽东是否在这支部队里。他首先遇到的是连长陈毅安，陈连长说毛泽东正在这里迎接宜章独立营，便领着我们十几个人去见毛

泽东。走了几里路，遇见了师部派来的通讯员，他又把我们领到前面村落有几间铺子的小街上，并大声喊道：“宜章独立营来了！”

铺子两边跑出许多人来欢迎我们，萧克迫不及待地问：“毛师长在哪里？”

一个同志指着人群中一位身材魁梧、满脸笑容的人对他说：“这就是毛师长！”

毛泽东和站在他旁边的师党代表何挺颖走上前来与大家握手，并热情地说着欢迎的话语。毛泽东详细地向萧克询问了独立营的情况，并告诉他说：“朱德同志的队伍向东转移了，我们在这里迎接你们一起上井冈山。”

大家听了萧克的传达，知道毛泽东在部队里，都很高兴。因为我们早已听到过关于毛师长的许多传说，现在见到这位传奇人物，并在他的麾下战斗了，心情特别兴奋！

二、朱毛会师庆祝大会

在宜章独立营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龙溪洞会师的时候，朱德等正率湘南农军第一师、第四师转战安仁、茶陵等地，并向酃县沔渡靠拢。4月26日，朱德率部到达宁冈砦市。4月28日，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在宁冈砦市胜利会师。5月4日召开了庆祝大会。

这一天，天高气爽，雄伟的井冈山满山青翠，山明水秀的砦市，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新明丽。只见到处都是红旗、红臂章、红缨枪，闪烁耀眼，真是满眼一片红啊！威武

整齐的部队和湘南农军一万多人，同簇拥的井冈山乡亲，汇聚成了人山、旗海，歌声笑语如同春雷震荡。

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都来到了设在南边草坪的会场。上午10时，由党、政、军、工农各界组成的主席团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主席台是用门板和竹竿搭起的，虽然简陋，但被两旁的红旗和标语板簇拥着，也很成气象。

大会司仪高声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从树顶直垂地面的长挂鞭炮，刹时炸响，硝烟腾腾，经久不息。排列在主席台前的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嘹亮，山应谷鸣，撩拨得人群热血沸腾。

军乐一停，大会执行主席陈毅首先宣布：两军会合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教导大队长。

朱德接着讲话。他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他们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根据地。

“现在，请毛党代表讲话！”陈毅声若洪钟，回荡山谷。

这时，毛泽东站了起来，千万双眼睛注视着他。他身材高大，目光炯炯，长长的头发背向脑后，显得风度不凡。他的讲话，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他在讲完会师的意义后，

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

他还形象贴切地讲了孙悟空与如来佛的故事。他说，敌人没有孙悟空的本领，即使有的话，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领，他们逃不出我们的手掌。他还讲了战术问题，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强弱之分的，“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只要我们抓住弱的猛揍它一顿，打胜了立即分散，等强的来了，我们就同它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可以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啦。

他生动的讲话，激起了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朱、毛两军的会师，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军事史上都意义非凡。这保存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坚定了边界党政军民建立和发展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信心与决心。

三、我当了宣传队员

上井冈山后，我在教导队的学员队受了一段时间的训练。教导队队长是萧克。这是培养红军下级军官和赤卫队指挥官的学校。学员每天早晨练操，上午上课或学习，下午以班或组为单位开会、讨论，晚上多半是三五人

在一起讨论自己的心得体会。学习的内容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分析政治时事形势，同时也学习党的文件和自己印发的材料；军事上主要是学习军事技术，红军的战略战术等。每天都安排得很紧张，就像后来的培训班一样，突击培训我们这些新入伍的战士。

短时间受训后，我被分到了二十九团宣传队。宣传队长是伍若兰，队员有我和欧阳侃、欧阳选、彭儒等。我们每天提着石灰桶到处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还配合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工会、农会，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我们的队长伍若兰是朱德的夫人。她是湖南耒阳人。1926年冬，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到耒阳从事农民运动，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县委宣传部长，干得有声有色。1928年2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军队夺取了耒阳县城，成立县苏维埃政府，伍若兰负责妇女部的工作。不久，与朱德结为革命伴侣。有一首山歌就是唱的她的事迹：

红军队里多英雄，
双枪女将建奇功。
横扫敌人如卷席，
英雄威震七溪岭。

有一次，伍若兰带着我们到一个与敌人交界的村子去宣传。我们正在墙上写标语，被十多个敌人发现了，见我们人少，端着长枪冲过来扬言要抓活的。伍若兰命令我们赶快撤离，她却镇静地放下手中的石灰桶，从腰间抽出

两支短枪，叭！叭！两声枪响，冲在前面的敌人应声倒下，后面的敌人脚步犹豫了。伍若兰掉转身跑了，很快追上了我们。幸亏我们跑得快，没有人员伤亡。

四、担任二十九团党委和军委秘书

不久，我被调到二十九团少共青年团委当秘书，不久即任中共团党委书记。

我这团党委书记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作记录，起草会议决议；写通知、布告；刻写钢板，油印材料；搜集报纸，整理情报等军中文案工作。

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由秘密交通员送到井冈山的，用药水写在白手巾上。当时，由宋任穷用药水冲洗出来，我与三十一团党委书记谭政刻写蜡板，油印后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员讨论。我和谭政列席了会议，作记录。曾记得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总的是肯定六大的决议不错，只是关于富农问题的条款有缺陷。

我在二十九团当团党委书记时间不长，陈毅把我调到军士兵委员会当秘书。他后来又任军委书记，我也成了军委秘书。军士兵委员会有两个秘书，曾日三和我。我俩的分工是曾日三负责记录会议要点，我负责详细记录，有闻必录。行军时写布告，写号房子的字条，也是我的差事。我虽然没有学过速记，但记录很快，陈毅很满意。

我有幸在陈毅的亲自指导下做秘书工作，一段时间

里接触频繁，耳濡目染，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受益匪浅。

五、惨痛的“八月失败”

井冈山的“八月惨败”，要从永新联席会议谈起。

1928年6月23日的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毛泽东、朱德趁热打铁，派出红二十八团开往安福，二十九团开往莲花，三十一团驻扎永新的石灰桥、吉安的天河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正在井冈山军民撒大网抓大鱼的高兴劲头上，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浇一盆冷水过来。

1928年6月下旬，湖南省委先后派袁德生、杜修经，分别带了《中共湖南省委对湘赣特委和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和6月19日、6月26日的两封指示信到达永新。决议案和指示信指责边界党有“保守主义”的观念，存在对敌人力量估计过低、对革命力量估计过高的“左”倾冒险思想，要红四军主力攻打永新敌军后，杀出一条血路，打回湘南，解决经济给养问题，要毛泽东担任赴湘南作战的前敌委员会书记，随军出发。

毛泽东对于错误指示当然不会“毫不犹豫”地执行。6月30日晚，他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研究湖南省委的决议案和指示信。毛泽东分析道：现在是统治阶级政权相对稳

定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推进的，波浪式推进的，决不能分兵冒进，不应改变“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的正确策略。会议赞同毛泽东的分析，一致通过不执行湖南省委错误意见的决定，部队不去湘南，继续留在井冈山作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工作，并向省委写了报告。袁德生、杜修经当时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会上他俩并无异议，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会后，杜修经却利用二十九团部分官兵家乡观念浓厚的情绪，诱导他们并力主打回湘南，动摇了军心，为二十九团的溃散埋下祸根。

1928年7月初，敌人开始对根据地实行又一次联合“会剿”。湖南敌人吴尚部从酃县、茶陵进攻永新；赣敌胡文斗、王均、金汉鼎部由吉安、安福进攻永新，两敌夹击永新，妄图达到“清剿”目的。

7月12日，为打破湘赣两敌的会合，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按计划攻克了酃县县城。向永新进攻的湘敌大吃一惊，随即调头回救。当赣敌赶到永新时，湘敌已经离开19个小时了。如果红军大队此时能进攻茶陵，然后返回永新夹击赣敌，粉碎敌人“会剿”是手到擒来的事。

事实却让人伤心，问题就出在二十九团的溃散上。

二十九团是由湘南农军组建的，普遍存在浓厚的家乡观念。部队打到酃县后，湘南近在咫尺，战士们的回乡观念变成了无纪律行动。他们不通知上级官长和党代表，自发召开士兵委员会，提出了极有诱惑力的口号：“打回

老家去，回家割稻子！”甚至连向导都找好了，准备7月13日擅自回湘南。

朱德、陈毅得知此情，立即召开了军委扩大会和士兵代表会，千方百计解释劝阻，但没有效果。陈毅将酃县发生的情况迅速报告了在永新的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立即回信告诉部队，赣敌已驻永新，并准备进攻宁冈，要求部队不能去湘南，应挥戈东指，援救永新，解宁冈之困。陈毅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信，劝说部队先回去解宁冈之围，再考虑开往湘南事。这才勉强调动部队，开到沔渡。到了沔渡，二十九团又变卦，坚持回湘南家乡。二十八团虽然反对去湘南，却也不愿回永新，而要去赣南。

7月15日，军委扩大会又在沔渡召开，讨论部队行动计划。会上，杜修经跳到前台，坚持部队要开往湘南，强调这是省委指示。会议议而难决，部队情绪严重混乱。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直吵到水口，各支部又派代表开会。会上，当二十八团团团长王尔琢激烈地发表意见反对去湘南时，杜修经竟指责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也是赞成回湘南的，他在暗中鼓动，与杜修经串通一气，使部队情绪更难掌握。

在支部讨论时，我发言反对回湘南，也遭到围攻。主张回家乡的人骂我“怕死”，“家乡都不要了，没有良心！”

我反驳他们说：“不是怕死，但不能无谓地去送死。湘南的反动势力强大，我们都有体会，中途回去的同志差不多被杀光。毛委员讲了，建立根据地要波浪式发展嘛，发展到湘南的时候再回去不迟。现在留在井冈山革命最

好。”

他们反驳说：“我们要回到湘南去革命，不在这里革命！”

农军回乡情绪太普遍，太可怕，不赞成回乡的遭到孤立。

由于杜修经的坚持，军心已散，军委只好同意二十九团回湘南，先打彬州。考虑到二十九团孤军行动危险，二十八团也跟随掩护。

打郴州，二十九团是前卫，士气很高，每天行军一百多里。二十八团是不赞成打郴州的。二十九团虽打得勇敢，但守敌范石生部队的武器装备好，没有打进去。二十八团增援上去，才打垮敌人，占领郴州，缴获不少武器。黄昏，敌人就反攻合围上来了，敌我力量悬殊，只好撤军。

撤军的场面可惨了，不是撤军而是溃散。二十八团一听到敌人的枪声，各部都蜂拥到了街上，没有命令，没有指挥，官不管兵，兵不问官，建制混乱，不集合就向南跑。南面是湘南，就是往家乡跑。谁也制止不住。胡少海团长试图集合，由于没有来得及打扫战场，少数敌人散兵还躲在暗处对集合的队伍放冷枪，给二十九团集合撤退带来很大麻烦，几次集合好了，冷枪一响，又被敌人打散了，溃不成军。最后胡少海团长下了严厉命令，士兵才跟着走。但有些意志薄弱的就落伍掉队了，有的干脆溜掉了。胡少海又派人回去找。由于队伍散了，人心乱了，东奔西逃，找不回几个人来。和我同村出来的几个人都不见了。

只有萧克采取连长抓排长，排长抓班长，班长抓士兵

“层层节制”的办法控制了一百多人的队伍。胡少海带回团部和特务连、通讯排八九十人。这样，一个一千多人的二十九团只剩下不到两百人回到井冈山。二十九团溃散的指战员，一部分跑到广东乐昌被土匪胡凤璋消灭；一部分星散在郴宜地区，多数被消灭。

幸亏二十八团损失不大，还能打回井冈山，但在回井冈山的途中，也出了事：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投敌。

袁崇全当时带领几个连和军部的机枪连、五连打前卫。8月25日，当部队到达崇义新地圩时，他突然改变行军路线，伙同副营长向敌刘士毅部投降。开始得到这个消息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就商量对策。我参加了会议，作记录。我清楚地记得，朱德主张派部队把袁崇全“打”回来，王尔琢则主张“喊”回来。朱、陈考虑到袁崇全崇拜个人，对王尔琢原来很崇敬，遂决定派王尔琢带领军部警卫排去追。那时被袁裹胁的叛变部队已登山了，准备打仗，一听到王团长高声喊话，没有任何抵抗就回来了。当时袁崇全正在庙里打麻将，听到喊话，一出来就碰上王尔琢，二话没说，拿着驳壳枪对准王尔琢一连打了几枪，正打中胸部。王尔琢当场牺牲了。袁崇全只带着几个人投敌了。

听到王尔琢牺牲的消息，干部战士非常悲痛。第二天，朱德为他主持追悼大会时流下了眼泪。陈毅也悲痛地讲了话。当时，我们就把王尔琢埋在上犹县附近的一个地方。

经过郴州受挫、王尔琢牺牲之后，部队情绪很低落，

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途中休息时，朱德讲话，勉励部队，鼓舞士气。陈毅也讲了话。他的诗人气质使他的讲话不同凡响，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他高喉敞嗓地说：我们革命是要经过艰难困苦的，在困难的斗争中，有些同志英勇壮烈牺牲了。我们永远怀念他们！但不管怎样，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打个败仗要什么紧！再干就是。打到只剩下一个团，朱德当团长，我当团党代表；剩下一个连，朱德当连长，我当连党代表；剩下一个班，朱德当班长，我当班党代表。打到没有枪的时候，就用刀砍，刀没有，还有拳头，还有牙齿嘛！总之，一句话：革命到底！

他把失败讲到头了！他号召大家要经得住失败的考验，要敢于当失败的英雄。朱德、陈毅的讲话，对部队士气是极大的鼓舞。部队到了桂东打了一个胜仗。

在我们下山后，毛泽东很不放心，一直惦着我们的消息。当听说二十八、二十九团在湘南吃了败仗后，立即亲率三十一团一个营到桂东接应我们。

一天，我和文书李兆魁正在吃饭，看到窗外有部队走过，赶紧出来，一问，原来是毛委员派来的，心里格外高兴。大家嚷嚷着：“这下有办法啦。”

经历劫难，我们又回到了井冈山。二十九团只剩下一百多人，已不成“团”，被取消编制，所有人员编入二十八团。团长胡少海到二十八团当了一营营长。我到二十八团任党委秘书。

一天，我正在路上走，迎面碰见毛泽东，他亲切地问我：“你也回来了？”

我说：“毛委员，我回来了！那时我就不同意去湘南的。我是拥护建立根据地的思想的，也曾同他们争辩过。他们骂我怕死，连家乡都不要了。”

“好啊，好啊！”毛泽东又很关心地问我工作分配没有，当我告他已分配了时，他很高兴，嘱我要好好工作。

六、失败后更显英雄本色

我们从湘南失败回来，听到了井冈山守山胜利的传奇故事。

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开赴湘南后，留守井冈山的红军只有一个营。不久，敌人以数倍于我的兵力来进攻。部队采用毛泽东“以少胜多”的战术，在黄洋界上英勇抗敌，激战一整天，打得敌人狼狈逃窜。赣敌被击伤营长一名，士兵数十名；湘敌伤亡更重，死伤数百。黄洋界保卫战挫杀了湘赣两敌“会剿”的威风，振奋了井冈山军民的士气，挽救了“八月失败”。毛泽东得知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的消息，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歌颂了人民战争的胜利。

最有趣的是，部队中的几个秀才仿照京剧“空城计”的唱腔编了一段“空山计”，把毛泽东比喻成孔明。“空山计”很快在部队传唱开来，有几句唱词我至今还记得：“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众三军！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这几句唱词，在部队流传甚广。我也喜欢哼唱。

杜修经对“八月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看到他时，狠狠批评了他。可他认识并不深刻。毛泽东给中央、湖南省委的信中建议给他处分，并请以后不要再派像杜修经这样不懂事的“学生娃子”来。不久，杜修经搞地方工作去了。

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教训，部队有了很大发展，一些规章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了，如：“进一步宣布革命军队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小组建在班排”，“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在军事斗争上，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这些举措和经验，都闪烁着毛泽东、朱德的智慧。

毛泽东在讲解“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的军事斗争原则时，形象比喻说：“这就像渔翁打鱼一样，撒网就是将部队分散下去，收网就是将部队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干什么？抓鱼！”

生动幽默的比喻，辅以手势，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对于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毛泽东提出采取波浪式前进，不搞同时开花，以免群众受到损失。

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既是我们尊敬的师长，又是普通一兵。他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模范。有次开会时，毛泽东和他的弟弟毛泽覃有了意见分歧，毛泽覃生气地走

出去了。毛泽东有些火了，追上去吼一声：“站住！”

毛泽覃边走边嘟囔：“共产党不是家长制！”

听了这话，毛泽东停住了脚步，有些后悔。事后，毛泽东为此多次做自我批评，说：“我得罪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弟弟毛泽覃。”

这件事，对大家教育很大。

毛泽东有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深深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认为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发动农民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毛泽东创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些思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后来革命的发展很重要，可以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就是从这里升起的。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

穆 欣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伟大的新闻战士。他最善于运用报纸团结人民，指导工作。他的新闻实践，他对新闻事业的关注，都给新闻工作者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不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建国以后的建设年代，毛泽东对新闻工作的谆谆教导，始终是指导我们前进的指南针。1957年开始，我在《光明日报》工作十年。这个报纸经常得到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尽管时间过了很久，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一）

1959年2月，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索取2月1日的《光明日报》。给他找来的报纸还没有来得及送走，接连又接到其他许多同志打来同样意思的电话。原来，这天报纸的《哲学》专刊第174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曹家铸写的一篇文章：《黑旋

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好，在一次会议上推荐给大家看。因为前来索取的人数多，报社发行部门将留存的报纸全拿出来还不够，最后把印刷厂挑拣出来的、印刷质量不合格的“残报”也都送出去了。

这篇文章是曹家铸下放农村锻炼后，在一个普及哲学知识现场会议上的讲话稿。文章借《水浒传》第38回《黑旋风斗浪里白条》的故事，从哲学上说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明显地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对条件的依赖性。同时指出，我们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去积极地创造条件，“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促进事物的转化和发展”。

在此以前，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刮起了一阵“共产风”。有些领导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许多混乱现象。1958年12月10日结束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

这篇文章就是联系当时出现的“共产风”，以黑旋风和浪里白条打斗的事例，谈到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受一定

条件的约束和限制。“在条件还不成熟时，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只能在将来，在另一条件下才能实现的事。”当时“共产风”正是忽视了这一点，这样弄出来的不可能是共产主义，“倒是使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庸俗化。”“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条件的重要性，以及事物对条件依赖的客观性。”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转化要有一定的条件，没有这一定的条件，事物的转化便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尊重这些条件，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像李逵一样，注定是要碰壁的。”

因为这篇文章富于创见，文笔生动，发表又很适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另一方面，毛泽东一向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他看到一位大学生经过一个时期的实际锻炼，能够写出这样生动活泼，深受农民欢迎的哲学文章，自然会非常高兴。

(二)

1960年11月25日，《哲学》专刊上发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所写的《从计划“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提交会议的文章中，有一批是结合当时技术革新的发展写出的。“蚂蚁啃骨头”（小机床加工大机床），“积木式机床”，是当时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成果。这篇文章就是其

中的一篇。

毛泽东看过后,非常赞赏,就让《红旗》杂志加以转载(载于1960年第24期上),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一封信,约请作者就此问题再为《红旗》杂志撰写一篇内容更为详尽的文章。原信如下: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知道多一些,如果你们能够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激之至。

信末原署“毛泽东、1960年11月26日”。可见毛泽东是此文一发表就看过,第二天就写了这封信的;后来在发表时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1960年12月6日”。这封信当然给作者们很大鼓舞,他们按照信中要求写了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红旗》在1961年第9、10期上发表了。

(三)

《光明日报》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学术与文化问题都是它的宣传重点。毛泽东倡导百家争鸣，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自由讨论，认为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遵照毛泽东的倡导，《光明日报》编辑部比较注意在版面上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先后多次有计划地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也都得到毛泽东的关注，他尤其关心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讨论。

建国初期，因受苏联李森科发动的对摩尔根学派粗暴批判的影响，我国有关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也曾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这个学派的一些教授、学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毛泽东曾多次亲自纠正这方面的错误，批评了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1956年8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建议下，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主持，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各个学派的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取长补短。8月下旬至9月初，《光明日报》对会议作了报道，并且发表了与会学者发言的详细摘要。

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的。1956年4月，毛泽东看到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谈话纪录中，谈到东德不少科学工作者对苏联批判摩尔根及东德也跟着批判的情况表示不满。4月18日，他在这份谈话纪录上给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写了

几句话：“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同志参加。”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述《论十大关系》，谈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强调对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对苏联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他说：“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并说，“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学习苏联李森科那一套，就被举出作为盲目学人家短处的一个例子。5月2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学说，有那么多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在全党和整个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4月18日的批示，建议召开了青岛会议，邀请我国遗传学的各派学者坐在一起展开讨论。因此，毛泽东对这次会议非常关切。

青岛会议后，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谈家桢等来到北京。毛泽东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谈家桢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他一边注意地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说：“应该取长补短。”同时鼓励谈家桢：“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摩尔根学派

的著名学者李汝祺教授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他以亲身体会,从本学科出发,阐述了百家争鸣方针对于鼓励独立思考,促进科学家的团结以及推动科学研究所起到的作用,得出了唯有争辩才能将学术上的是非曲直加以澄清的结论。作者回顾建国以来遗传学界出现的不正常的现象,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在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犯了一点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那就是只许一家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的最为突出,其后果如何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家独鸣只能引起思想僵化。大家都学会引经据典,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他在文章中还强调科学家要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

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第二天写信给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他把文章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编辑部拟了一个按语: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当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青岛会议促成遗传学界不同学派之间进一步了解,出现了可喜的团结现象。以后大学里恢复了摩尔根学派开的课。但是有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门户之见仍

严重存在,许多地方摩尔根学派依旧受到压抑,1957年有的单位还有人企图把他们都划到右派里去。有人说,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路线,摩尔根学派是资产阶级的科学路线,还出现了“粉碎”摩尔根学派的说法。

1959至1960年间,我们派记者接连访问了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许多专家学者,调查研究了青岛会议后几年间两个学派继续争论的情况,重温毛泽东对李汝祺文章写的按语,于1961年2月至8月间,在报上组织关于遗传学的讨论。这次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发表了文章,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较少针锋相对的“较劲”,也未发现乱扣帽子的现象。8月24日,谈家桢向本报记者表示,对讨论比较满意,认为对活跃青年人的思想有显著的效果。还说,目前要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应该切实地做些实验室工作。

在此前后,毛泽东曾在北京、上海等地多次会见谈家桢。1958年1月4日深夜,毛泽东派他的专机把谈家桢、赵超构、周谷城接到杭州去聊天,同他们三人一起聊了一个通宵。毛泽东每次同谈家桢见面,都先询问遗传学发展的情况。当他得知遗传学研究还遇到很多阻碍时,就用坚定的口气对谈家桢说:“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这些亲切的会见,谈家桢本人和摩尔根派学者都受到极大鼓舞。

(四)

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使得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损害。1959年初,为了打破反右斗争以来学术界的沉闷空气,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我们选定曹操评价问题作为突破口,在报纸上组织了一场学术争鸣。

为曹操翻案问题,是1959年1月间郭沫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曾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决定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后,2月19日在《史学》专刊第152期首先发表了翦伯赞撰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同时还发表了希望学术界人士和读者参加讨论的《编者按》。其后,这场讨论就相当热烈地从我们报纸上展开了,以后还逐步地扩展到其他报刊上。

毛泽东对曹操这个在历史上争论较大的人物饶有兴趣,在他读过的历史书籍上,有关曹操部分都作了不少圈划和批注。他主张对曹操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此,这场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立即引起毛泽东的注视。他看过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曾同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谈论这篇文章。

翦伯赞文中讲到曹操“一贯地把统一中国当作自己的政治使命”和他的征讨对于以后西晋统一所产生的作

用。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毛泽东看了翦伯赞的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翦伯赞在文章中写道：“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作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

毛泽东对此作了更为深刻的分析。他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①

这场讨论展开后，郭沫若、吴晗、王昆仑等发表文章，为曹操翻案。有一天，毛泽东又在北戴河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

^① 林克：《忆毛泽东学英语》，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51页。

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敢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①

(五)

毛泽东特别爱看研讨哲学问题的文章,尤其关注逻辑学研究的进展。50年代末期开始的关于逻辑学的讨论,就曾得到他的关切。

周谷城回忆说:“有一天主席用长途电话要上海市委用飞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谈至深夜。”^②实际上,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和杭州,毛泽东曾多次找周谷城谈过逻辑问题。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讨论文章,绝大部分都不同意周谷城的意见,使他不无顾虑。毛泽东在见面时总是鼓励他:不要怕,积极写文章,继续讨论。毛泽东还曾多次找来包括赞同和反对周谷城观点的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王方名、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费孝通、胡绳等,到中南海和周谷城聚会,共同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周谷城先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多篇谈论逻辑的文章。这个报纸同时也发表过不

^①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1页。

^② 周谷城:《我所感受的团结》,《文史文萃》第1辑。

少持有不同意见、同周谷城“商榷”的文章。据我听到，所有这些周谷城所写的文章以及同他争论的文章，毛泽东是很留心看的。有时刊有这些文章的报纸刚一出版，有关同志一早就接到毛泽东的电话，邀约前去交谈有关这些文章争论的问题。当周谷城将他就此问题写的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出版的时候，曾写信请毛泽东作序。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复信周谷城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①信中所说“对逻辑无多研究”，自然是谦逊的话，猜想所以不愿“插入一手”，还是坚持百家争鸣方针，怕会影响争论双方充分地发表意见。

1957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且大有《对于探讨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这篇文章认为，近几年来苏联和我国学术界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迄至目前为止，仍然束缚于恩格斯的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相互关系的比喻，没有多大的进展。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本身的问题没有弄明白，就来谈二者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受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文章就讨论中涉及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谈了个人的意见：一、辩证逻辑必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把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4页。

的辩证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看作辩证逻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把关于思维的一般学说和辩证逻辑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与形式(概念、判断、推理等)的学说等同起来,实质上否认辩证逻辑这个科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否认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二、辩证逻辑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并列的哲学科学。二者的区别在于:(一)科学对象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一般的客观辩证法,研究对象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个领域,是研究其中的一般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辩证逻辑研究的是主观辩证法,是研究思维领域中的特殊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二)认识范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适用于人类认识的全部领域,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历程;而辩证逻辑仅适用于理性认识的范围。(三)阶级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阶级性的;辩证逻辑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它是探讨思维领域的具体科学之一,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三、辩证逻辑是而且也只能是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和形式的具体科学。它是研究思维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和形式的辩证思维。四、辩证逻辑不仅研究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还应研究思维规律,还要探讨一些逻辑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方法,至于证明、假设和类推的问题,也有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来加以探讨的必要。

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表示赞赏,曾于10月11日批

示：

送陈伯达同志。这里辩证逻辑一文可以一阅。此人有些新颖见解。

1965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朱波《形式逻辑同一律客观基础的探索》一文。毛泽东看了，当天上午就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既不同意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与客观事物规律等同起来，又不同意把它与客观事物完全割裂开来，而认为它反映的是思维的确定性，它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的确定性。这种观点是动脑筋思考了的，比那些把形式逻辑“规律”等同于事物规律的庸俗化做法前进了一步。

在谈话中，毛泽东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党员研究哲学，就是不研究逻辑。

《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的文章，毛泽东也常有批示。1961年10月6日发表了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张巨青写的《论假说——谈谈假说的一般特征和它的形成》一文。文章共分“什么是假说”、“假说是科学发展的形式”、“假说的内容结构”、“假说与世界观”、“形成假说的步骤”、“假说产生的根源”和“形成假说应该注意的事项”七个部分。

10月9日，毛泽东看后批给陈伯达说：

此文可以一阅，阅后还我。请调查一下，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何处。

1963年8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章凡的文章《列宁批判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学习〈唯物主义与

经验批判主义)札记》。这篇文章讲了三个问题：一、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对立；二、科学发展同相对主义的对立；三、相对主义必然导致唯心主义。

毛泽东看后，8月19日批交康生说：

这篇文章可以一阅。你谈的一个美国教授写的那篇哲学文章，我已看了一遍，觉得他是一个完全不懂列宁哲学思想的人。

(六)

1962年末，周谷城在《新建设》月刊第12期发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这篇文章提出的“无差别境界”说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在美学界引起争论。汝信、朱光潜、王子野、陆贵山、孟伟哉等许多人，都在《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和周谷城商榷。

关于“时代精神”讨论，从1963至1964年延续了两年。许多人撰文和周谷城讨论究竟什么是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究竟是不是各阶级意识的“汇合”？各方来稿踊跃，仅1964年夏、秋3个月，就收到290篇（批评周谷城的259篇，赞成他的31篇）。其间姚文元和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1964年5月10日，姚文元就此问题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中，重述他对时代精神的看法：“时代精神就只能是推进历史前进的精神，而不是阻碍历史前进或拉历史倒退的精神。”

金为民、李云初看了姚文元这篇文章，采取给《光明

日报》编辑部写信的形式，寄来一篇文章：《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文章写道：“我们认为：时代精神，也就是在一个时代主要的阶级矛盾统一体中起主导作用、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所体现的，事实上也就是这个时代大量存在的，统治的生活方式、精神状况，也就是该时代最富特征的生活与思想样式。”同时批评姚文元说：“他的关于时代精神的立论，实质上缺乏历史具体性和革命的辩证法精神，却只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公式。”

毛泽东重视这场讨论，看过周谷城、姚文元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的有关文章。有的文章，他还在发表以前看过报社排印的清样。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就是这样。7月6日，他在看过报社排印的这篇文章清样以后，就叫中共中央宣传部把它和姚文元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并即挥笔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它的序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评文章都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编者 7月6日

我在当天得知此事，为免我们报纸发表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迟于小册子出版的时间，与中央宣传部有关同志商定，我们即将金为民、李云初的文章在7月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请他们把序言标示的日期往后移一天。

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即将这两篇文章辑印成书，书名定为《关于文艺理论的两篇文章》，同时将毛泽东所写序言的日期改为“7月7日”。

这时毛泽东正对文艺、科学理论问题抓得很紧。报刊上有关李秀成评价、“合二而一”批判以及“时代精神”的讨论，他都十分重视，而且都发表过意见。

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常有通宵不眠的情形。当时听说，他在7月5日夜里又是通宵不寐。看完上述姚文元反驳周谷城的文章和金为民、李云初批评姚文元文章的清样稿，写完这个《按语》已经天亮，随后写了“7月6日”。因为当时正在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各地参加会演的剧团汇聚在北京，一面参加演出，一面学习文艺理论，总结经验。所以毛泽东写下这个按语，送交中央宣传部速印成书，分发给各剧团和文艺界学习。他对文艺理论如此重视，令人感奋。

毛泽东一直非常注意党报的理论、学术宣传工作。1964年1月8日，他和《人民日报》负责同志谈话时曾经指出：《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的文章，注意发表哲学、历史方面的文章，发表哲学文章要宣传活哲学。2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1月30日关于加强学术宣传的报告上批示：“人民日报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形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这个批示，对《人民日报》的理论、学术宣传提出了严

格要求,充分说明了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与关切。实际上,《人民日报》的学术宣传并不比批示中提到的这些报刊做得差,只因这些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宣传文教政策为重点的报纸和学术性刊物,能以比较多的篇幅和版面开展学术讨论,推动百家争鸣,从而在这方面引起学术界的欢迎和重视。单就《光明日报》的情况来看,它所以能够在这方面做出些微成绩,如前所述,也是同毛泽东的关注、鼓励和指导分不开的。而且对照批示检查我们报纸上的学术宣传,深知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缺陷。毛泽东和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人民日报》乃是全国各报学习的楷模,此后《人民日报》逐步加强并且办得精彩的理论学术宣传,尤为各报作出了榜样。可是由于毛泽东一向关切、支持我们报纸的学术宣传,这次在批示里又提到《光明日报》,所以编辑部的同志们得知此事,都把它们看作对于我们报纸的鞭策,感到特别亲切,从中受到鼓舞。

(七)

1965年从《光明日报》上开始的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是我国书法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书法帖。相传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3月3日,书法家王羲之与当时名士41人会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作诗,并由王羲之作序。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

书法帖相传之本，共有 28 行，324 字。《兰亭序》自被唐太宗李世民断定为王羲之的真迹，经过历代帝王重臣的推崇和士大夫的宣扬，视作不可侵犯的“神物”。但是，历史上仍然不断有人提出疑义，谈论它的真伪。由于积重难返，每次提出，必遭反对，当时没有条件展开争辩。因此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争论，在我国书法史上将近千年从来没有解决过，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老问题。

1965 年 5 月，郭沫若经过考证，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认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部文字，兴感无端，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和思想感情，“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半真半假）的作品；它的书体也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同，认为是唐人所伪托的赝品。

1965 年 6 月 10 日及 11 日，郭沫若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同年第 6 期）同时发表。当时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读了，不同意此文看法，写了一篇《〈兰亭〉的真伪驳议》，与郭沫若辩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还多处讲到“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总之，《兰亭》而有真贋，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高的文稿写成后，曾先寄给章士钊看过。经过章氏指点、加以修改后，又于 7 月 14 日寄给章士钊，请他推荐给毛泽东“评鉴”。（章士钊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在他当时编撰的《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而斥持反对说者为“以一定万，以偶冒常”，“持论诡譎，不中于实”。）

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将此文连同作者高二适给他的信一起附送，希望此文能够发表。7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毛泽东还把有关信函、文稿以及回复章士钊的信，一起送给郭沫若。他在给郭的信中写道：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郭沫若接到此信，非常高兴。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并准备写文章同他讨论。当天就约我和报社的有关同志前去寓中商谈，建议《光明日报》本着百家争鸣方针，在报纸上组织这场讨论；希望早日发表高文。

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二适的文章。8月12日，郭沫若写了同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郭沫若在反驳高二适的时候，摘引了清代名书画家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方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者，姑妄言之。”其后郭沫若说：“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

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高二适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毛泽东一直关注这场讨论。8月17日，他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会议的部队干部时，曾经问起“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郭沫若得知此事，当天就把所写《〈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稿。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样稿时写信给郭沫若说：

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代还不乏其人，有所批评，即成为“非圣无法”，是要准备对付的。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8月21日，郭沫若这篇《〈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场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上展开。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对于这场讨论表现了极大兴趣。著名书法家启功、赵万里、徐森玉，考古学家商承祚等都撰写了文章，也得到林枫、陈叔通、老舍等的关切。有的写信给郭沫若或《光明日报》编辑部，无不赞成就此问题展开“争鸣”。

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卓著，向为国人尊敬。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尤为公认的权威。只是有的时候，他在

学术讨论中不够冷静，有些文章往往火气太大，“火药味”浓。在这次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中，尽管高二适的文章比较武断尖刻，章士钊给毛泽东的信和高文中，都不乏明显挖苦讽刺的话语，但郭沫若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一直比较冷静沉着，平心静气。郭沫若在他驳复高二适的文章发表后，有一天见到我报记者，曾经诙谐地说：“《〈驳议〉的商讨》是花两天时间写出来的。这篇答文，经过了这些日子，又在北戴河洗了一阵雨，总算把火气压下了，要是早些日子，一定写不出这样来。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写过这样没有火气的答文。当然，后面有些句子，人家说是刺也可以。高文也的确太不成话了。皇帝过目，就不会是假的。金‘目’不二嘛。我从来不写什么指正之类的客套文字，为了高二适，我只好‘变节’了。”郭沫若所采取的冷静态度，十分有利于这场讨论的展开。除了郭老本人的克制精神充分发扬，恐怕也是同毛泽东的关注、鼓励不无关系的。

这场讨论延续六七个月，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后来，文物出版社曾将这次讨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编为《兰亭论辩》一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说：“这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将会有所启发。”

(八)

1958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头条地位转载《世界知识》杂志辑录的题为《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一组论述(我报事先商得该刊编辑部同意,与这天出版的《世界知识》第20期同日见报)。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后,就批送给吴冷西,让《人民日报》转载。

《人民日报》于10月31日转载此文时,补充了一些材料,在编排上作了一些调整,并改题为《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重要文字:“这些文章、讲演和谈话,虽然多数是发表过的,没有发表过的只占少数,时间前后相距20年之久,又是采取集纳的形式;但是看起来却使人感觉好像是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论文。其原因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各国人民为另一方,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美帝国主义又特别张牙舞爪,以原子战争威胁世界和平,被压迫受威胁的人民的心思被这种紧张局势所吸引,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矛盾,故尔使得读者对毛泽东同志关于论述解决这个矛盾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首先和主要的问题,纸老虎还是并非纸老虎的问题,自然感觉兴趣。”

毛泽东看报非常仔细,有时甚至注意到我们报纸上发表的资料性质的文章。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中

的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3月23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开始了平息西藏武装叛乱的作战。毛泽东十分重视报刊上对此事件的宣传报道。

《光明日报》于4月29日发表一篇本报资料室编写的资料：《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西藏社会制度》。这篇资料从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形式、领主对农奴的高利贷剥削和劳动人民的悲惨境况3个方面反映了西藏的社会制度。毛泽东看过这篇资料，当天批送给胡乔木说：“此件可看。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应发表此项资料，还可说得详细一点，中外皆需要。”第二天，《人民日报》就照他的批示发表了该报国内资料组编写的资料：《黑暗、落后、残酷的西藏农奴制度》。

对于报纸上发表的有关评论，毛泽东更加重视。4月24日，首都各报刊登了印度反华分子“示威”侮辱我国领袖的新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短评：《原来如此》、《此地无银三百两》；《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评论。

毛泽东看了这些评论，第二天（4月25日上午6时）即就“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写了批语给乔木、冷西、彭真同志，其中谈到整个事件的宣传方针，也谈到对这些评论的意见：“‘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

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 18 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讲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的评论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廿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两天发表。”

（九）

根据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我国报纸的传统，《光明日报》创办了几种学术性专刊，成为它的特点之一。《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等主要专刊，都是报纸创刊后很快办起来的，以后又创办了《经济学》，都受到知识界的支持和读者的欢迎。1958 年元旦创刊综合性的《东风》副刊，由于它集学术性、知识性、艺术性于一体，也逐渐地成为具有特色的副刊之一。

除《东风》副刊外，《光明日报》的专刊，分别邀请社外学术界人士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专刊的编辑工作。文、史、哲、经几个主要专刊的编委会成员都是学有专长的专

家学者,而且都有一支学术界知名人士为骨干的作者队伍。专刊、副刊都联系了广泛的作者,拥有众多的读者。当时由于国家纸张困难,报纸限量发行,供不应求,专刊曾经经过邮局单张订售,以满足读者需要。

毛泽东比较爱看《光明日报》,尤其爱看几个专刊。大概是因为这些专刊经常发表学术、理论文章,能够反映较多的学术思想的信息。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记得有相当多的次数,每逢这个报纸发表了比较重要的学术文章,常在文章见报的当天午前,就听说毛泽东已经看过,并且告诉别的同志看看,由于有的同志手边没有报纸,临时打电话索取当天的报纸,就把这些令人鼓舞的信息带给我们了。如前所述,他还特别注意我们报纸的学术讨论,爱看勇于探索,具有新意的文章。他所注意的这些文章的作者,虽然不乏誉满全国的老年学者,也有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1965年9月22日,《史学》专刊第315期发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助教孙达人的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文中强调:“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夺得的这种自由,重新束缚农民。”同时认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表现在推翻和改造了封建王朝,削弱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没有什么根据说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非要透过“让步政策”不可。毛泽东看了,十分赞赏。这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哲学工作者谈

话时，说到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现在出了个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没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1959年3月1日，《文学遗产》登载马茂元的一篇短文：《柳宗元的诗》（是作者所写的《读书札记》）。毛泽东看了，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曾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的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同年12月27日，《文学遗产》发表了晏震亚写的《如何评价〈文赋〉？》。作者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进步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观点。毛泽东曾把这篇文章批转给一位同志看，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

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谈到学术讨论问题的时候，曾说：

《光明日报》批评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评的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这是清朝末年的小说，是暴露黑暗的。总之，所谓谴责小说，给人家的印象是不好的，是反对革命的，是反孙中山一派的，赞成

保皇的，要地主继续专政，但要修理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阶级，是保皇党。

在几个专刊中，《文学遗产》是毛泽东特别喜爱的。当时这个专刊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何其芳）领导、陈翔鹤主编，每周见报一次，每月4期只能发表5万字左右。而各方来稿特多，最多的一个月曾达90万字。为使好稿得有发表机会，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专刊而外又不定期地编印《文学遗产增刊》，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新华书店发行。1958年6月1日《文学遗产》专刊第211期有《文学遗产增刊》第6辑的目录。增刊第6辑有马克垚、麦朝枢、樊星等论述李白思想及有关其生平和诗的文章，徐嘉瑞、陈朝壁、金德厚等评论屈原《离骚》等的文章。他看到了，就在这期专刊边旁批写给秘书：“林克：请将《第6辑》买一部给我为盼。毛泽东，6月4日。”

当时《光明日报》出版的《情况汇编》，毛泽东也很注意其中所反映的有关文化、学术界的情况。1963年8月，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不顾李秀成的全部革命实践，说他被俘后写的《自述》是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此文遭到史学界的普遍反对，但得到江青的支持。江青找戚本禹谈话，说他曾将此文送毛泽东看过，毛就其内容作了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以后中央宣传部决定在报刊上就此问题展开讨论，1964年7月25日，《光明日报》继《人民日报》之后重新发表了戚本禹此文，引起学术界就此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社《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

的反映(10)》上,选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蔡尚思说,我基本上同意戚本禹的意见,可和他的看法又不完全相同。他的有些看法比较片面,比如在分析李秀成投降原因的时候,说李秀成盖忠王府太奢华浪费,是为了个人享受;又说李秀成早就有了投降的念头。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吴泽说,目前报纸讨论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容易把问题简单化。有人说,李秀成的投降是因为怕死。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李秀成的投降,只是一根线上的一个点,我们要想了解这个点,就需要把它放在一根线上来考察,而要了解这根线,又不能不把它和整个面联系起来,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这里的线,指的是李秀成的一生;这里的面,指的是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李秀成的投降和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是有关系的。本来,农民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农民是要分化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最后不是走向失败,就是向封建转化。太平天国也是这样。它后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际上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逐步走向封建化的道路。既然太平天国后期已经逐渐封建化,李秀成的阶级界限当然也就日益模糊了。所以等到李秀成被俘以后,这时的李秀成已经不是当年起来闹革命的李秀成了。加上被俘以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认为“天数”已定,以至对曾国藩抱有幻想,写下了《自述》。这就是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8月间，毛泽东看了这些反映，就在上面写了批语：
江青阅，此文有道理。

(十)

在专刊问题上我们有过失误，是经毛泽东指点才得以迅速纠正的。开头几年，这些专刊学院气比较浓，有些读者不满意，报社编辑部未能及时协同这些专刊的编委会研究改进。到了1958年，“大跃进”一来，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报社来稿猛增，版面紧张，报社内外都有停办专刊的意见。当时，我到报社不久，对有关情况不甚了了，对此问题也未慎重考虑，认真研究，加之受到当时学术研究中“左”倾思潮影响，这年10月编委会一度决定停办全部专刊，并于10月25日在报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

当时毛泽东正在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他看到这个启事，就要《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写了一封信把他的意见告诉我：

毛主席在昨天谈话中曾指出：《光明日报》的副刊如《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他说，他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副刊的。他要我把这意见转告您。

收到这封信后，我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进行了讨论，认识到原来匆忙作出的这个决定是不慎重、不严肃的，因而是错误的（我们还收到有些读者来信，也都不

赞成这些专刊停刊)。当即决定:由报社编辑部一面向各专刊编委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作自我批评,同时商谈专刊继续出版的有关问题;一面指定专人草拟一份纠正上述错误决定的新启事,告诉读者。11月2日,又在报刊上登出《本报〈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继续出刊启事》。

随后我们进一步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制定了改进计划,逐步采取措施,在报社编辑部内增设机构,建立了专管学术、理论宣传的学术部,除同有些专刊的社外编委共谋改进和协助组稿外,并将《哲学》、《文学遗产》两个专刊改由报社学术部主编。与此同时,学术讨论除在各个专刊上进行外,还扩大范围到正版,即在正版上也刊登学术文章,组织学术讨论。有时,还把写给专刊有分量的又为广大读者关心的学术文章,移到正版刊登。并在正版显著地位增辟《学术简报》专栏,及时反映全国各地学术界活动情况,摘要介绍其他报刊重要学术文章的内容,以增强有关学术信息的报道。这样,报纸逐渐成为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学术文化的阵地。

(十一)

毛泽东对《东风》副刊也比较爱看,尤其爱看上面发表的写得好的诗词。

1962年1月,毛泽东曾把《东风》发表的诗词,批作文件印发给“七千人大会”。当时,主要由于党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中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地

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有些人被吓倒了,动摇了信心。1961年12月28日,《东风》刊登了民主人士吴研因、钱昌照写的4首七绝:

赏 菊 吴研因

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竞吐奇。
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篱。

嫩红老紫百千盆,蟠错如虬况有根。
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

芦台农场 钱昌照

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
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

藁城农村 钱昌照

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
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诗人们兴致勃勃,描绘出一派兴旺景象,乐观情绪跃然纸上。毛泽东看到这些诗篇,十分欣赏。“七千人大会”开幕前夕,就用铅笔在刊登这些诗的《光明日报》上批示:“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九日。”随后又批示给机要秘书徐业夫:“请即印这几首诗发给各同志。”大会秘书处即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

1965年10月16日,《东风》发表了叶剑英写的一首

律诗《望远》：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这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2岁生日。这天，毛岸青、邵华夫妇前往看望，毛泽东高兴地为他们亲笔写了这首诗。书写时把题目改成《远望》，并在诗末写上“10月16日光明日报”。毛岸青、邵华一直珍藏着这份手迹。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4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份手迹，同时发表了《叶剑英同志关于毛主席手书〈远望〉诗的说明》：

《远望》一诗，为刺责“北极熊”蜕化变修而作，时在一九六五年秋。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收到毛岸青、邵华两同志信，信云：

“叶伯伯，记得一九六六年元旦前，我们去看望父亲，父亲挥笔写了伯伯的《远望》诗一首，以教育、鼓励我们革命。”

随信惠我影印件一份。我特借得原件，请王冶秋同志加工制版，以为永久珍藏的纪念。

叶 剑 英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

同时该报还发表毛岸青、邵华为此手迹发表所写的

《重读〈远望〉志更坚》，文中说：“我们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首诗，他老人家不仅可以记忆十分清楚地背诵出来，而且连什么时间刊登在哪家报纸上，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光明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这些手迹、《说明》和文章。

1963年元旦，《东风》上发表了郭沫若的《满江红》词：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郭老这首词引发了毛泽东的唱和。1月9日他作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末注明“郭词见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镞。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1962年春，当时还在英国牛津大学教书的红学家吴世昌，在新加坡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文有新意，我们曾在

报社的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全文转载，4月14日及21日又在《东风》副刊上选登了其中的两节：《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并在文尾加以注明。毛泽东看到了，饶有兴趣地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登此文的两节，一定有其全文，并叫人打电话来，我们当即送去刊登吴著全文的《情况汇编》和《红楼梦探原》一书的英文版。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20多个年头，他的音容笑貌，时刻闪耀在眼前。他对《光明日报》的亲切关注，深深铭刻在脑际，铸成牢固的记忆。时光的流逝，丝毫不会磨灭他的光辉。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迎面袭来的不论是惊涛骇浪，或者是凛冽寒风，只要想起毛泽东的关切和教诲，心里就会感到无限温暖，倍增同一切困难拼搏的勇气。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毛泽东的教导和关注，将继续激励着我们前进。

“四清”记

李 新

(一)

1964年的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忽然接到通知，第二天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不得缺席。第二天我按时前往，会场不大，坐满了人。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心想，是谁作报告呢？这么严肃。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向旁边的人问了一句话后，对大家说：今天是请少奇同志给大家讲话。

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声音一时大，一时小，听起来挺费劲儿，但人们都很安静地听着。

他讲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规定吗？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下去呢？呆在北京，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光会在上面发空头指示，怎么不产生官僚主义呢？下面的情况千变万化，新鲜事物多得很，只有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

题,才能想出新对策,才能领导。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

周总理大概也没有想到刘少奇的讲话如此简短,所以当刘的讲话结束时他感到突然。但仅是略一迟疑,就马上起来圆场。他很温和地对大家说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赶快下去参加“四清”,执行中央的决定。又说,王光美的报告中央即将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并转身向刘少奇说:我看可以让光美到各单位去作报告嘛。然后对台下大家说:各单位都可以请王光美同志去作报告,口头报告比书面报告会更生动些、丰富些。随即宣布散会。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也说了些难听的话。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随后王光美即到各机关讲“桃园经验”。虽然几次发票给我,但我一次也没去。不但没听报告,连中央转发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文件,我也根本没有看。这也好,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说我吹捧刘少奇、王光美,吹捧“桃园经验”,顾亚立即起来更正,说“四清”时他给我当

秘书，“桃园经验”的文件一直放在他那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眼、提过一句。于是，关于吹捧“桃园经验”这条罪状，便从我的许多“三反”^① 罪行中取消了。

（二）

听了刘少奇的报告后，各单位立即组织工作队下去“四清”。近代史研究所参加“四清”的地方，最后决定在甘肃省的张掖县（古甘州）。

黎澍和我都没有参加去张掖的筹备工作。黎澍因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让青春发出光辉》，遭到全国性的批判；我则因1963年到四川讲学，也被批判了一番，因此我们俩人都被排斥了。主持筹备工作的是刘大年、张崇山和祁式潜。

一天，近代史研究所要我到会议室参加“四清”动员会，我去了。会上发的“四清纪律”真严格，其中有一条是“四清”期间不许谈恋爱。我看了以后觉得好笑，便信口说道：“中央说‘四清’要分期分批地搞，要搞好多年。不许谈恋爱，行吗？我们这些年近五旬的人，倒也没有什么，不过也难说，也许还有人憋不住呢。至于年轻人，要等到‘四清’完了，恋爱才开禁，这样的规定合适、合法吗？行得通吗？”本来会场空气十分紧张，我这几句话倒把大家都逗乐了。大家叽叽喳喳地纷纷议论起来。当讨论得莫衷一

^① “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是的时候，刘大年忽地向我问道：“李新，你说怎么办？”我满不在乎地答道：“很好办嘛，到甘肃去，听甘肃省委的不就得了吗？何必另搞一套，多此一举。”我的话一说完，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所里自订的那许多条纪律便被搁置起来了。

刚过了国庆节，我们就启程赴甘肃了。在这之前，我和黎澍送陈旭麓回上海，在车站遇雨，北京的天气顿时冷了下来。时值黄昏，一种凄凉的感觉袭上心头，很不是滋味。我们去甘肃时，是大队人马共同“开路”，送行的人也不少，倒很热闹。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大家都不肯多说话，人们的心头都很压抑，那种滋味也很令人难受。汽笛高鸣，火车缓缓开动，车上车下的人挥手舞巾，我听见孩子们在高声喊叫“爸爸再见”时，心中感到无限的凄楚。我一生中经过多少次别离啊，但那些都是壮别，只有这次与家人离别和几天前与陈旭麓的送别，才使我领略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别离滋味。无怪江淹在《别赋》中说：“黯然魂销者，惟别而已矣。”

上车后我即倒卧铺上，想把情绪稳定下来。但天气是阴沉沉的，山是光秃秃的，田野是茫茫然的，我时卧时坐，心中仍是烦躁不堪。于是便想作诗词以解闷。开头还有些灵感，凑成了几句：

“挥手登车何处去？君往江南，我往河西路。冷落关河秋色暮，行行行过山无数。”

后来灵感不继，写不下去了。随着轧轧的机车声，我也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凭窗

一看，人眼俱是沙漠。于是又返身上铺，直至兰州才下来。

(三)

从北京到兰州，一路上都是祁式潜在那里指挥。大家都默默地听着，既不拥护，也不反对。在队伍即将从北京出发时，刘大年向大家宣布：这次参加“四清”的队伍由一个临时党支部领导，支部委员三人：刘大年、祁式潜、李新，刘大年任书记，祁式潜任副书记。由党支部直接向群众发号施令，根本不符合我党的建党原则和共和国的宪法，但从反右派以来，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而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党支部委员会，竟有一个支部书记和一个副书记，另以一个委员作陪衬，这种滑稽的做法，简直把党章糟蹋得不成样子！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我也不能说话，因为谁说话谁就要挨剋，被剋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总之，不是右派，也得是右倾。就因为这样，祁式潜才能趾高气扬地在那里瞎指挥，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到兰州后，祁竟然在一次大会上指责王思玉给陈铁健缝被子。陈和王是一对公开的恋人，怎么不可以互相帮助？即使是一般的男女同志互助，也是正当的，无可指责呀。我实在难以忍受，决定站出来说话了。尽管陈是我的研究生，我还是不避嫌，在支委会上对祁式潜提出了严厉批评。但他说是在“维护纪律”，我就质问道：“哪里有不许男女同志互助的纪律？”他回答说：“四清期间。”我说：“难道四清期间男女互助就犯了法？”他

说：“‘四清’期间是不许讲恋爱的”，我说：“这是谁的规定？谁作出这样荒唐的规定？”刘大年见我很生气，也很认真，便出来打圆场。他对祁式潜说：“所里那些规定暂不执行了，等着执行省里的规定好了”。我于是又问刘大年：“所里又有什么新规定吗？”他连忙说：“哪里，哪里，我是说等着省里的规定嘛。”随后他就把话题岔开了。

在兰州，我碰到了副省长王孝慈。抗战时期他和我在太行分局同事，他即将调离甘肃，向我介绍了不少甘肃的情况。他说：甘肃的灾情很严重，饿死的人不少。省里对你们来参加这里的“四清”很重视。李友九（省委书记）担任“四清”工作团总团长，汪锋（省委第一书记）也要去参加。现在大家的情绪都很紧张，凡事谨慎一点为好。好在你和老九（指李友九）很熟，有事可以找他。几天以后，王孝慈就离开了兰州，从此以后再未见面。

在兰州，决定我们“四清”的地方是张掖的乌江公社，由甘肃省永靖县的干部和我们近代史所的一帮人共同组成一个工作队，永靖县委书记担任工作队队长，刘大年参加领导。我被分配到乌江公社的东湖大队担任工作组组长，这个工作组也有永靖县的干部参加，他们的县委宣传部长担任工作组副组长。

（四）

从乌江公社到东湖大队不过十多里路，由于我们是吃了第二顿饭才起身，加之逆风而行，路又不熟，所以走

到东湖，已是掌灯时分了。根据工作团的规定，凡是地、富、反、坏、右和村干部以及他们的亲属的家，工作队员都不能住，结果能住的贫下中农家一时又很难找到，只好住进牛棚了。东湖大队（从前的乡）共有 12 个小队（从前的村），我们把工作组分成 4 个小组，分别住进 4 个小队。我带一个小组住在大队所在地东湖村，除女同志外，我们集中住进退伍军人李富祥家里。李家共有两间屋，外间不到 10 平方米，有一个小炕；里屋是灶房，没有墙，是临时搭起来的，能挡雨却不能挡风。李富祥光棍一人，住在这房子里倒很宽敞，我们去则显得太小了些。我们一到，李富祥就要把外屋让给我们，自己住灶房。我们也争着住灶房。最后决定大家一起挤住外屋，灶房不住人。这么一来，外屋炕上炕下都住上了人。刚安顿好，李富祥不知从哪里端来一盘油饼请我们吃。这油饼和北京的不一样，也不像南方的油条，因为那些都是油炸透了的。这里所谓的油饼，只是把一些粗面捏成团，在油锅里滚几下即捞出来，而且因为油少，外面全是黑糊糊的。即使是这样粗糙的东西，在当时当地也是美味呢。但我们因有严格的纪律，大家都坚辞不受。这样推来推去，李富祥很不高兴。我见此情景，觉得如果辜负了他的一片诚意，以后必不好相处，于是拿了两个油饼出来，分给每人一片，并对李富祥说：“你当过解放军，我是老八路，咱们军队的纪律你是知道的。何况我们今天是吃了饭来的，肚子并不饿，现在我们一人吃一口，领你的情，以后咱们就都是好同志。”大家全都笑起来，又谈又笑地挺欢畅。等李富祥端着盘子出门以

后,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可违犯纪律了,是不是要把这情况向上报告一下呢?”大家都说:“干吗要报告?一报告准会倒霉的。”我又说:“既不向上报告,那就谁也别往外说。”大家齐声说:“好!谁往外说谁就是混蛋。”人心如此一致,我也就放心了。

进村后我们就开始访贫问苦。其实这里的贫苦一看便知,何待访问?每个家庭都一无所有,床上有条破被就是比较富裕的了。太阳出来,北墙根就有一群“日光浴”者,老头、老太太光着上身,十二三岁以下的男女小孩,全是赤身裸体。为什么?没有衣服穿。还有两三个小队,十几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一家人合穿一条,谁出门谁穿。多么凄惨的景象呀!李友九、汪锋他们知道这种情况后,才把省里的救济物资集中往这里投放。但灾情太重,灾区太大,分到每家每户的东西也就少得可怜,哪家能分到一条被子、一两件衣物就是天大的幸运了。

经初步了解,这里受“大跃进”的灾难很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很多,几乎每户都有。中监委书记钱瑛曾于当时带领工作组来做过调查,并发了些救济品。群众对中央工作组印象很好,敬若天神。我们这次从北京来,而且也叫工作组,群众就以为中央工作组又来了,对我们的希望很高。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是来搞阶级斗争、搞“四清”的,是专门整那些“四不清”干部的呢?由于群众对我们多怀好意,所以我们了解情况比较容易,访贫问苦效果也很好。但我们对群众反映的情况并不满意,我们要的是村干部“懒、馋、占、贪”的材料,谁如果不反映这方面的材料,

我们就认为他是包庇村干部，受了村干部的收买。慢慢地，群众见我们爱听假报告，不听真情况，一些老实人就和我们疏远了。

（五）

参加“四清”的工作队员，必须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每天到一户贫下中农家吃饭。三餐都是稀的，一大盆粥里稀稀疏疏地只有几根面条。老乡们有经验，用勺子一搅，就能把面条和米粒捞上来；而我们这伙洋学生出身的干部却毫无本领，拿着勺子拼命地在盆里搅和，可盛到碗里时几乎全是清汤。老乡们肚子大，能吃三四大碗；我们男同志也能勉强吃上三碗，只可怜我们那些女同志，吃上两大碗就把肚子撑得鼓鼓的，但连续两三次小便后肚内就空空如也，饿得不行。当大家饥肠辘辘、唉声叹气时，我便把“大跃进”时期河南信阳地区关于公社食堂的一首顺口溜念给大家听：“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内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大家听了，开始笑了一阵，但随后还是打不起精神来。这首顺口溜是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舒天吼1959年参加人民公社考察团回来偷偷告诉我的，随后便是庐山会议、反右倾，这类顺口溜谁也不敢说了。我虽然爱说笑话，但还是能掌握分寸的。这次在大家情绪低落时，为了能安慰大家，我才说出这首顺口溜。谁知到“文化大革命”时，竟成了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污蔑“三面红旗”！

由于吃不饱，还要参加劳动，同志们很快都“掉磅”，体重普遍下降。女同志们全都变得很苗条，但绝不是秀美，而是面黄肌瘦。我常给她们开玩笑说：“你们可真是‘关山飘泊腰肢细呀’。”黎澍过去长期在白区大城市工作，没有经过小米加步枪的锻炼，哪能禁得住只喝稀粥的考验呢？于是他一天天瘦下来，连脸型都变了。姜克夫对我说：“老李，黎澍不像咱们是在解放区过来的，他的肚子没有经过革命，顶不住呀！你可否向总团反映一声，解决一下他的问题。”我就去找了李友九，不久总团就把黎澍调进张掖城，负责编写张掖新志，并且还把喻松青（女，黎的研究生）等人调去当助手。黎澍进城后，能吃饱饭，身体很快就恢复了。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看那里的地方志。现在黎澍在编新志，我便从他那里看到了许多旧志，例如《甘州志》、《张掖志》等，使我增加了不少河西地区的历史地理知识。河西是汉代为对付匈奴而开辟出来的，这一条通往西域的走廊，形势非常重要，张掖之名也是这样取来的。张掖后来又称甘州，由汉以至唐宋都很发达。隋炀帝曾经西巡到此，对西域使者大吹牛皮，说什么洛阳吃饭不要钱。范文澜写中国通史，正好在“大跃进”时期写到这里，他大胆地把隋炀帝好大喜功、爱吹牛说谎的真实情况都如实地写到书上了。这种敢于写真史、说真话、秉笔直书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从旧志书上，我看到甘州过去是个很美的城市，引雪山（祁连山）之水灌溉农田，城外农产丰富，城内市场繁

荣，难怪《八声甘州》成了著名的词牌。但现实的张掖却破败不堪，这使我心里感到很难受。张掖的景色也别具一格，尤其晚上的月亮，显得特别高，特别清明，从而使我对高适的诗句“高高秋月照长城”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同时，对杜甫的“月是故乡明”的理解也更深刻了。它不仅是感情使然，事实也是如此，因为一般说来，河南的月亮确实比四川的要明亮些。在张掖，我还领略过一次黑旋风的奇特景象，那可真是大开眼界。黑色的旋风自西而来，先沿走廊的南北两面山麓向前飞奔，如同两路大军包抄一样，形势逼人。老乡们都拼命往家跑，边跑边喊：黑旋风来了，快回家呀！这时两股风合围在一处，其势之猛，不但能摧枯拉朽，更会使房倒屋塌。没来得及跑到家的人，必须马上就势卧倒，否则风会把人卷得很远很远。有的小羊被风刮到河滩，摔死在石头上。有了这次亲身经历，我才明白用黑旋风来形容李逵的性格，是再贴切不过了。

（六）

“四清”像历次运动一样，一开始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对所有的村干部都要大胆怀疑，用各种方法搜集材料来开展斗争。尽管是捕风捉影来的材料，也都信以为真。还在北京的时候，中央文件就已指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党手中。到了张掖以后，各处传来的情况更为严重，似乎绝大部分的村干部都烂掉了。例如西北局的试点长安，北京的通县，还有安子文在山西某县的经验介

绍，都是按照《桃园经验》的看法，把农村看成一团漆黑。这和1947年“搬石头”的情况颇为相似，只是对区以上的干部没有包括进去罢了。而对付干部却看得比“石头”还不如，正因如此，“四清”以桃园经验为榜样，不但不相信村干部，而且也不相信群众，进村的时候不开群众会，先搞秘密串联，搞得很神秘，竟像在白区工作一样。工作组因为先入为主，所以看见村干部就不顺眼，总以为他们都是四不清干部，偏听偏信，只要得到一点四不清的材料就穷追不舍，已成了工作方法。这样也就自然会产生逼、供、信的错误。和历次运动一样，开始不防“左”，只怕右，一定要等到出了无数乱子以后再回来纠偏。工作组的权力很大，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的村干部是不少的。即以乌江公社而论，人命案不下十余起，我们东湖大队也死了一个人。我身为工作组组长，未能阻止这种惨痛事件发生，心中确有愧疚。但仔细想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个人又怎能阻止得了呢？附近有的大队已突破大案，一天之内全村主要干部都已交待，虽然我听了不相信，但总团已作为经验通报表扬了。我们有的工作队员为此加紧逼供，因而发生了惨案。我当时分工负责对支部书记进行审查，我曾到他家看过，根据观察所得，我认为多吃多占，他肯定有；但若说有多大数量的贪污，则很不像。因为除炕上有一领席子一床被子外，他也是家徒四壁。我跟他谈话多次，都是说明政策，鼓励他交待，并希望他能动员全支部的党员，特别是村干

部中的党员交待问题。他问我还可以由他召集党员开会吗？我不敢答应。我心里很明白，现在已有人说我右了，若答应他召集党员开会，我必定是个“大右倾”无疑。但若以党章论，他是党员选举出来的支部书记，现在又没有撤消他的职务，他怎么不能召集党员开会呢？可是历次运动形成了一种惯例：只要运动一来，什么党章，什么国法，全都不要。这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四清”和“三反”、“五反”、“反右派”等运动一样，死人是寻常事，不足为怪。至于在张掖，“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现在“四清”死几个人，更没什么稀罕了。但是对东湖大队死人事件，我还是认真追问了一番，并要大家引以为教训。尽管永靖的干部比我们近代史所的人更“左”一些，但我对本所的干部要求更严，我要他们未经向我报告不得隔离审查村干部，更不得任意设法逼供、诱供，要调查研究，注重事实。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逼供的现象少些了。当然，因此战果也就不那么辉煌，也不能得到表扬。但等到后期进行甄别时，我们的工作也就比较好做了。

对待村干部如此，对待“民主补课”也是如此。所谓“民主补课”，就是找出漏划的地主富农来斗，或是对斗得不彻底的地富分子再拉出来斗争。我们没找出一户漏划的地富分子，只得把对贫下中农不服的一家地主又斗一次。事前准备诉苦时就宣布我们的政策不许打人，所以斗争会上，只动口，未动手，斗争对象认了错并保证以后“口服心服”了，也就完事。现在回想起来，这样做也很滑稽。

但当时若不如此是怎么样也过不去的。

因为“四清”的具体过程多是一些无聊之作，写出来也没有多大的意思，所以不想再赘述。

(七)

我每次进城开会，都要去看黎澍，因为在他那里可以知道“四清”全局的消息，也可以知道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文教方面的指示。特别是有关历史研究方面的指示，我是更为关注的。例如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反攻倒算’”。这分明是批评范文澜和翦伯赞的。因为范老和翦老都认为农民大起义之后，封建统治者以史为鉴，被迫要对农民让步，总要采取一些轻徭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社会向前进步。汉唐初期的盛世就是这样来的。毛主席根据解放区土改后逃亡地主组织“还乡团”的事实，认为地主与农民之间乃至一切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都只有仇恨和斗争，不可能有让步和妥协。这是他 1957 年特别是 1962 年以来强调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必然发展。再往后就更发展到“阶级斗争就在党内”，从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黎澍我和谈到这个问题时，不住地摇头，大声说道：“他老人家为什么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要去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呢？没有让步能有统一战线吗？”我也说道：“‘大跃进’饿死了人，农民有意见，他老人家还是让步了，连食

堂也不坚持了。看来世界上天天都有斗争，天天都有让步，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呀！谁也无法否认。”我们俩对毛主席的这些思想既感到迷惑，更感到忧虑，因为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够紧了，如果再绷紧一些，岂不要绷断了吗？我们当时已预感到要出什么事情，但谁能想到后来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运动呢？接着刘大年从北京回来，又传达了毛主席要求历史研究者搞“四史”，并严厉批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指示。刘大年对主席的指示很崇敬，更欣赏，但对如何搞“四史”也很茫然。因为在张掖，虽然接触到不少贫下中农的家史以及村史和公社史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怎样写进书里去呢？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可是现在看到的都是贫穷、落后，“四清”中查出的种种材料能如实地写出来吗？“四史”中还有工厂史，对我们近代史来说就更生疏，难度也就更大了。所以对于搞“四史”，大家除表示完全拥护外，只能空议论一阵。当然，我私下里和黎澍、蔡美彪等人还是要说真话的。即使对毛主席的指示并不以为然，但谁能有回天之力？最后仍只有叹息而已。

在黎澍那里，总还是比较轻松些。因为还有人可以开玩笑。喻松青这位女才子，博学多识，就是一个爱开玩笑的好对象。他们在修张掖新志，自然要研究乌江的地理和历史。一次，她颇有心得似地说道：“乌江即黑河，我看这黑河就是《木兰辞》里的黑水，‘朝辞黄河去，暮宿黑水头’，这黑水不是离黄河很近吗？”我听罢不觉好笑，这才

女竟然把诗词作为考古的依据，因而随即回答她：“这黑水离燕山更近呢，‘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能听见马叫，当不会有一天骑马的路吧？”这一下把她难倒了。但她始终不服。她这人很聪明，才思敏捷，但不够踏实。多年不见了，据说后来大有长进，而今已是很有成就的女学者，对道教的研究更为著名。

同志间的谈笑纵能带来短时间的欢愉，终不能消除人们心中无限的惆怅。一天下午，黎澍对我说，咱们到外面走走吧，何必老呆在家里耍贫嘴。于是我们便登上了甘州著名的定远楼。登楼远眺，与华北平原相比，别有一番景色。我不是文学家，无法描绘出这景色有多么迷人，多么别致。不知怎么的，我们在城楼上徘徊许久，自薄暮至黄昏以至皓月升起，既不多说话，又不忍离去，有时相视苦笑，但更多的时间是各人想各人的心思。直到夜色渐深，天气凉了，才缓步回去。回住所后，我忽有所得，便伏案提笔，写下了一首《水龙吟》，记下这次登临的感慨：

“甘州南北皆山，祁连山上千年雪。
长城何在？残垣废垒，若连还缺。
更上层楼，临风极目，地长天阔。
望胭脂山麓，黑河水曲，斜阳里，如凝血。

又是西风萧瑟，望高高一轮秋月。
阳关千里，黄河九曲，寒光四射。

雁渡红楼，鱼通黄浦^①，莫伤离别。

但君心耿耿，余怀渺渺，视浮云白。”

第二天，我把这首词放到黎澍的书案上，便匆匆地回东湖去了。

(八)

时光迅速地流逝，很快便到了1965年的春节。节日前夕，总团把所有的老干部都召集进城，名为开会，实际是改善生活，让这些老干部增加点营养，借以恢复日渐瘦弱的身体。我当然与会了，但到年三十那天，我感到自己在城里过年，却把工作组的同志们丢在乡下，于心不安。于是便到商店里买了许多肉食、糖果、烟酒，不顾旁人的挽留，搭车回到乌江。从乌江到东湖只能步行。尽管天色已晚，我还是顶着西风赶路。谁知半路上又下起了大雪。我背着沉重的东西，冒着迎面而来的大风雪，奋力前行，身上不住流汗，终于在晚10点过后赶到了住处。当我推门而入时，大家都很吃惊，谁也没有想到我此刻会回来。他们都知道老干部们在城里过年，所以在吃晚饭时，虽也念叨我一声，但随即也就过去。大家围坐在炕上“守岁”，因为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枯坐着颇觉得无聊。正在此时我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带回来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他们怎么能不兴奋呢？曹大个儿（振中）赶快把东西从我背上

^① 当时黎澍和我住的地方，前面都冠红楼之名，陈旭麓住上海，故称黄浦。

解下、打开，女同志们连忙把烧鸡、熟肉拿到厨房切好、放进盆里，然后和花生瓜子等一齐摆在炕上。酒瓶业已打开，酒香肉香同时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大家兴高采烈，高声喊道：我们要趁“四清”过个好年啊！

这个“四清”过得真不错，开始是举杯庆祝，随即行令饮酒，划拳之后，继以猜谜。人们酒酣耳热，激发出各种天才。唱歌的声音特别好听，跳舞的腰肢也特别灵活，猜谜语的更是各显所能，自己编出许多独出心裁的诗谜、灯谜。我也兴致勃勃，用同志们的姓名编成谜语，惹得大家捧腹大笑。我记得一个谜语是“宋太祖贪财，唐明皇好色”，前者射赵喜宝，后者射李瑚，他们俩人都很老实，听了这个谜语也笑弯了腰。我针对钟碧容和姚宝珠的谜语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她们被我逗得又乐又恼，假装要打我，被邻座的人给止住了。我还记得吕景琳打的谜语又多又好，他真是个出谜语的奇才，可惜现在一个也记不起来了。吕景琳是一个很好学的书生，来搞“四清”还背着一部《辞源》。他的教条主义味道因之也较重。一天，大家谈论起胡麻，因为我们当时吃的都是胡麻油。吕一听便高声说道：“胡麻有什么奇怪，不就是芝麻吗？”大家都笑话他，他不服，赶快取出《辞源》，翻到胡麻那一条，指着向大家说：“你们看，这里明明白白地写着‘胡麻即芝麻’呀，有什么错？”我把书拿来一看，果然是这样写的，而且还附着一幅小图。很显然，《辞源》的这一条错了。于是我对吕景琳说：“回头吃饭的时候，你拿几根胡麻杆看一看，看这里的胡麻杆和你们山东的芝麻杆一样不一样？”饭后他走来对

我说：“胡麻和芝麻很像，但不是一个东西，仅仅是同科的植物，《辞源》的编者大概没有亲眼见过胡麻，所以搞错了。我呢，也跟着错了。”我通过这件事对大家说：“一个人应该发奋多读书，但多读书不能全信书，书不一定都可靠，只有符合实际的才是真理。”吕景琳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学习不错，而且从此以后，既注意读书，又注意实际，在研究工作中进步很快。

继猜谜语之后，我们还做了各种游戏。做游戏时，有人故意把灯吹灭了，然后把碗中的酒点燃，在酒光下，人们的脸呈蓝色，有如鬼脸一般，有的女同志吓得叫起来，大家乐不可支，一直狂欢到黎明。

这个“四清年”过得如此欢快，至今难以忘怀。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却有人据此贴了我的大字报，说我把青年们引错了方向。我想，过了这么多年后的今天，这个贴大字报的人总会有新的认识了吧。

（九）

旧历大年初一，永靖县的同志请我去吃抓羊肉。把一只羊砍成几大块，煮在锅里，等煮得差不多了，每人抓出一块拿着就吃。这里的羊肉很嫩，不用煮多长时间就熟了，看着好似还很生，可放到嘴里一咬就烂，而且没有膻味，实在鲜美得很呐。我是第一次吃抓羊肉，开始还有些犹豫，吃了几口以后，兴致高涨，和大家谈笑风生，居然把一大块肉给消灭了。很快，几个人便把一只羊吃得干干净

净。他们有人还带来了糌粑和酥油，糌粑我凑合能吃两口；一闻酥油的腥味我就反胃，只好辞谢了。糌粑是青稞麦面做成的，很耐消化，是藏民的主要食品。藏民所以能耐寒，能登山，据说与吃糌粑和酥油很有关系。酥油是牛羊的脂肪制成，但制作不精细，虽然营养价值很高，初吃却让人难以下咽。他们还带来很多酒，其中也有青稞酒，味道倒还不错。酒兴一来，划拳声如雷震，好不热闹。我直到傍晚才尽兴而归。

大年初二雪停了，天气放晴。我清晨出去“蹲点”的时候，那朝阳中的雪景，令人眩目。什么是“蹲点”？就是出去大便。张掖的农村没有厕所，人烟稀少，所以男同志都到野外去解手，因时间长、要蹲着，便戏称为“蹲点”。那个时期，许多领导同志下农村，找一个村庄长驻，叫“蹲点”，同志们把大便叫蹲点，颇有调侃之意，实在是大不敬。可见无论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多么紧，人们有牢骚，总是要发泄出来的。

“蹲点”时四望，景色实在迷人，那雪落满枝头，宛若梨花，而春天的梨花哪能满林皆是？眼前确如“千树万树梨花开”呀。尤其是远望南面耸入天际的祁连山，在浮云的掩映下，一个个高峰相连，时隐时现，幻如琼楼玉宇，把阳光化为异彩，反射到大地上来，其美妙之处实非文字可表述。我看呆了，忽然想起去年10月起程来甘时，还有一首词没有写完呢。一时灵感所至，便把那首词的下阙拼凑成功。

原来的上阙是：

“挥手登车何处去？
君往江南，我往河西路。
冷落关河秋色暮，行行行过山无数。”

现在凑成下阙是：

“雪后边城如画幅，
山拥琼楼，林拥梨花树。
欲步岑高才力蹇，斯人不在何人赋？”

我这时确实想起岑参、高适来了，他们的边塞诗写得是多么好啊！想想陈旭麓不在此地，他若在，一定能写出好诗来，因为在我的好友中数他的诗最有唐人风味，但他现在情况如何呢？不禁心向往之。

（十）

1965年的春节，虽然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过得还是挺高兴的。就在节日期间，传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也就是《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

我们东湖大队工作组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争论非常热烈。永靖县的同志们多数思想不通，认为我们原来那一套搞法，也是根据中央指示办的，因而成绩很大。现在中央来了新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用不着大张旗鼓，大肆宣扬。近代史所的多数同志则认为《二十三条》有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

园经验”中的某些做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的做法，就受到了批评。更重要的是对干部情况的估计，《二十三条》没有提多大比例的干部烂掉了，而说“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样一来，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村干部一律打倒的做法显然就错了。《二十三条》中还明确规定“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实事求是”，“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而我们实际上与此相反，违背了这些规定。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明确正确和错误的界线，勇于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我们便不能使东湖的“四清”工作得到较好的收场。

因为我是工作组组长，不便于和永靖的同志们在会场上公开争论，便推举了两三个同志根据《二十三条》的明文规定，针对永靖县个别同志明显的错误言论展开严肃的批评。永靖县的干部大都是农民或小知识分子出身，哪里顶得住近代史所这些人的攻势？何况发言者上有中央指示，下有村里的事实，有理有据，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我们的曹大个儿，平常并不大爱说话，在这次辩论中却大出风头，他几次发言，都是长篇大论，讲得有声有色，并能抓住要害，使对方无言以对。我为了缓和会场空气，常常在适当时机，出来总结一下，让大家取得一致的意见就停止争论了，所以讨论的结果还不错，思想上基本上按《二十三条》统一起来了，同志之间又没有伤了和气。

经过深入的讨论后，我们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比较顺利，隔离审查的村干部都放回了家。为了定案，进行细

致的调查了解，然后根据事实，为所有被审查的干部做了结论。凡是没有证据的条款都取消，只把证据确凿的一条一条地定下来。这样，真正有贪污行为的干部只是少数，多吃多占的虽然比较多，但数目字大大地减少，不但比原来搜集到的数少，而且比本人承认的也要少，可见有些数字是逼供出来的。根据《二十三条》的规定，我们让每个确有问题的干部，自己作出了退赔的计划，经审定后按计划退赔。在我们离开以前，退赔计划大部分实现了，有些则暂缓到以后退赔。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这些事情仍记得清清楚楚。为了写这段回忆录，我特地把《二十三条》的文件借来重温了一遍。文件把这次“四清运动”的性质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走社会主义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且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看来，问题很清楚，这是毛主席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强调抓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但我们当时还把它当做反“左”的文件来欢呼，可见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之低，也可见“左”倾病毒深入我党的机体已多么严重了。无怪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终于降临全国大地。

（十一）

在张掖“四清”末期，近代史的工作队暴露出一条桃色丑闻，而且这丑闻的主角竟是以极“左”面目出现、主张“四清”期间不得谈恋爱的祁式潜。在“四清”之前不久，从

历史所调来一位姓张的女同志。此人生得娇小玲珑，惹人喜爱。她与丈夫的关系本来很好，只因一件偶然的事情俩人闹了别扭。丈夫一气之下和另一女人好了起来，张为了报复，也去找了一个男人。后来俩人都很后悔，觉得这样做太无聊，便又重归于好。为了避免风言风语，张被调到近代史所，并随大家到张掖参加“四清”。祁式潜是近代史所“四清”工作队的副支书，对这些情况非常了解。“四清”开始时形势很紧张，他是最出风头的领导成员之一，当然要装出一副正经模样，只是对张表示“同情”和“理解”而已，并因此获得了张的好感。等到“四清”后期，形势松了，祁式潜便利用领导之便，经常和张纠缠，几度向张“猛烈进攻”。张本是纯洁的女学生出身，结婚后虽一度偶然失足，但她正为此悔恨不已，哪能再次下水？而且她对祁式潜那种满口党性的两面派态度，感到十分恶心，因此坚决抗拒，绝不顺从。这样闹了一阵，丑闻就暴露了出来。而这时，刘大年正好有事要回北京。一天，在乌江公社开完会后，刘大年找我谈话，他说：“我回北京后，近代史所支部的事就请你管起来吧。”我说：“应该由祁式潜管嘛。”他说：“你明明知道他不行了，何必再说什么呢？”后来，他又承认无知人之明，不该重用祁，希望我顾大局，把责任承担起来，无论如何不要让近代史所在甘肃留下不好的名声。他谈得很多，也谈得很诚恳，我终于勉强地答应了。

刘大年回北京后再未返甘肃。不久“四清”就要结束，他和张崇山（近代史所负责行政的副所长）来信说，凡有劳动锻炼任务的青年研究人员都留在乌江劳动一年，其

余的人由李新负责带领回所。我接信后，即找姜克夫并一同到张掖城里去和黎澍商量。我们都认为甘肃太苦，青年同志们在这里才只有半年多，身体就已经瘦弱不堪了，若再在这里劳动一年，谁还受得了？非把大家的身体拖垮不可。于是决定由我回信，让大家都回京，青年们可到山东劳动去。但所里的回答是：青年们就是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这件事要我不必管，我的任务只是把其余的人带回北京。

要青年们在张掖继续劳动的消息，我们虽然还在保密，但被所里的青年人传出来了。于是，一个个青年人来找我谈，希望我把他们带回去，他们保证以后到山东锻炼时一定好好干。听了这些年轻人的要求，我心里很难受。这些人大部分是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都是我们所里派人到各大学挑选来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地学习做研究工作，而一定要把他们赶到乡下去受折磨呢？什么“滚泥巴”、“劳动锻炼”，根据我个人亲身体会，对于研究工作并无多大益处。但这些话是无法说出来的。怎么办呢？我又去找姜克夫，他是一位经历丰富并看透了世情的老同志。他坚决对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老李，对青年人行行好吧！不管所里怎么说，我们还是把所有的人统统带回去，看他们怎么办！谁有权让年轻人在这里挨饿？”于是，我便请黎澍出面（因为他有副所长的名义）向有关方面辞行，然后把全体人员一齐带回了北京。

(十二)

在离开张掖城之前,我和黎澍、姜克夫商定,近代史所内部的事情不必向甘肃省“四清”总团报告,只把我们在乌江“四清”了解到的情况向总团报告就行了。这样,就使家丑不致外扬,也为祁式潜保全了面子。但祁并不满意,还说什么“李新擅自行动”,并提出质问:黎澍凭什么能代表近代史所在甘肃出面活动?为此,回到北京后,在我的提议下,召开了“四清”支部的扩大会议来总结这次“四清”工作。除“四清”支部的全体支委和十三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参加会议外,所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的人员也都参加了。同时,凡参加“四清”的同志,也都分小组总结工作。

在会上,刘大年、张崇山批评我不执行所里的指示,擅自把该劳动锻炼的青年全部带回了北京。姜克夫站起来对刘大年说:“你在乌江一共待了多久?一会儿北京,一会儿张掖,就这样你还不是常在公社里病歪歪地躺着吗?青年同志们也是人呀!是人就要吃饭,‘食不饱,力不足’,饿着肚子干活儿,这叫什么锻炼?山东有我们的劳动基地,到那里去锻炼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叫青年们在乌江锻炼饿饭?这次让青年们回来是我向李新建议的,有错误我愿承担责任。”这时各小组、尤其是青年们都提出意见,对要把他们留在乌江劳动非常不满,于是刘张只好把此事放下不提了。

这次会议的高潮是对祁式潜的批评。因为他在“四清”中表现极左，对人狂妄无礼，犯了众怒，大家不约而同地向他展开了进攻。不仅批评了他现在的表现，而且揭露了他的历史，说他是公子哥儿投机革命，以后又背叛革命，解放战争期间又投机回来，因而解放后在运动中故意极左，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历史，并且巴结领导往上爬。祁这个人历史上也确有错误，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是应该的。但说他“一二九”时期参加抗日运动是投机，抗战期间离开新四军后成了叛徒，以后再回到革命阵营也是投机，则未免过分了。我当时对这种批评不仅未加以纠正，而且推波助澜，现在分析起来，确有报复思想的因素。“文化大革命”掀起后，祁式潜立即跟着造反派来整我们，这又是对那次总结会的报复。可是不久，他也被当做叛徒揪了出来，随即自杀身亡。多么残酷的斗争啊！以阶级斗争为纲害死了多少人？跟着这条纲走的人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这又是谁之过？这难道不应该深长思之吗？现在想来，当时我也是盲目的，因而也犯了错误，也有一定的责任。人老了，应该把过去的事情想明白，才能对现在的事情看明白，不然糊里糊涂地在世上走一场，岂不可惜？为此，特地把这次“四清”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以为后来者之鉴。

十月革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

——访吴恩远

陈 夕

在21世纪行将来临之际,回眸历史,人们不禁要问,在刚刚过去的一百年中,究竟哪些历史事件永久地载入了世界文明的史册?

历史的发展已经表明,十月革命是20世纪最主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之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对后来整个世界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由于最近10年出现了各种复杂的戏剧性和悲剧性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给人类历史向新的文明发展阶段,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造成了困难,从而也模糊了人们对这一事件历史价值判断的视线。那么,究竟应当怎样来评价和认识十月革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十月革命逢80周年之日,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吴恩远同志。

记 者:吴先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界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重新评价十月革命是否已成为研究中的主要倾向?

吴恩远:是的。苏联剧变后,在对苏联历史和人物的评价方面很多观点已发生了变化。首当其冲的是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一些人把十月革命视为原罪,“使俄国走入歧途,造成悲剧性后果”。必须指出,今天一些正直的、客观的俄罗斯学者对这种全盘否定十月革命必然性和历史意义的态度也是不满的。

记 者: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解体,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那么,我们

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一 20 世纪的最重大事件？十月革命对苏联的“兴”和“亡”到底有什么影响？

吴恩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使我们必须更深入地研究十月革命。我认为应从两方面看这个问题：第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即必须从 1917 年俄国社会发展具体情况来分析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不能以今天苏联的解体否认当年十月革命的必然性。第二是要有联系的观点。要把十月革命对苏联 70 年历史的影响、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过程”的影响联系起来分析，才能较全面、较准确地把握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同时也可看到苏联解体深层次因素。

记者：那请您先谈谈第一方面的问题，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

吴恩远：20 世纪的俄国是各种矛盾的集中点，主要表现在广大受压迫的俄国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及其代表沙皇专制的阶级矛盾，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引发的民族矛盾，其他帝国主义试图使俄国成为原料输出地并肢解俄国产生的矛盾。加之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国内经济几近崩溃的影响，俄国社会矛盾尖锐到空前程度。“下层”人民不愿照原样生活下去，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革命一触即发，甚至俄国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右派、警察局、包括克伦斯基、米留可夫、罗将科这样一些著名的杜马领袖当时都向沙皇发出警告：国家充满了大革命的气氛，很快就会发生动乱。苏联剧变后有人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少数人搞的“阴谋”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记者：这些是对十月革命发生必然性的传统认识。今天是否还有一些新的理解？

吴恩远：虽然是传统的观点，但却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更广的角度来分析，即俄国现代化进程对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这样看问题或许能更深入了解十月革命的必然性。

从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迈上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已取得一定程度发展,其工业总产值已占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苏联剧变后一些史学家据此断言,如果不发生十月革命,俄国社会也将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道路”和“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这表明他们对“社会现代化”的内涵缺乏认识。在早期现代化理论中,往往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或看成纯粹经济的增长。以后人们逐步认识到单纯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等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甚至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现象,过分追求工业发展指标,不惜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阻碍了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按照公认的标准,现代化进程除经济指标外,至少还包括社会结构、生活质量、人口素质、社会环境、秩序及经济效益等各个方面一系列综合的指标,用单纯经济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已属过时概念。在 20 世纪初,俄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状况如何呢?目前国内外对此尚无专门研究,我仅举几个较重要的和有代表性的指标为例:

1913 年俄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比较

国别	城市人口 占总人口 比重 %	第三产业 就业人员 比重 %	每千人 口拥有 医生数	占世界工 业总产值 比重 %	每千居民 受过普通 教育人数	婴儿死亡 率(逆指 标‰)
俄国	18	16	0.18	5.3	66.5	260
美国	45.7	36.9	1.44	35.8	197	162
德国	64.8	24.8	0.5	15.7	157.4	207
英国	75.8	—	—	14.0	142.3	145
法国	44.1	28.8	0.5	6.4	176	149
日本	18.1	25.8	0.78	—	143.6	151

记者:从这些数据看出当时俄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几乎每项指标都居末位,最后一项逆指标是指

什么？

吴恩远：婴儿死亡率表示在一千名出生婴儿中夭折数量。逆指标即数值越大，婴儿死亡率越高。

工业发展要求更大的国内市场 and 更多劳动力，而俄国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工役制仍要求农民为地主无偿劳动，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主富农采用高利贷手段剥削农民，农民一贫如洗，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沙皇政府卵翼的俄国资产阶级采用残酷手段剥削工人，工人心身受到极大摧残。以至在 20 世纪初俄国居民平均寿命仅 32 岁；由于缺乏受教育条件，俄国居民中文盲占多数，识字的人仅有 21.1%，无法为工业革命提供更熟练的技术队伍；为了维护反动专制，沙皇政府限制地方自治机构权力，取缔部分选举权，扼杀一切进步读物，广大人民在政治上毫无权利。专制政府种种倒行逆施与俄国现代化进程产生尖锐冲突，我们前面提到的，俄国国内种种不可调和矛盾则是这种冲突的具体体现，必然会引发大的变革。这就是说，旨在推翻沙皇专制的十月革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要求的。

记者：您前面说到当时俄国各阶层、各党派、甚至包括沙皇官吏中的很多人似乎都看到面临变革的形势。那么，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样的变革，与十月革命有何不同？

吴恩远：一种指由沙皇总理大臣斯托雷平所实行的土地改革。面对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及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他采取了以破坏俄国传统村社，加速土地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即通过资本主义农场的改良发展方式实现农业集约化生产，走上文明发展道路。近年来一些人把这看成是当时存在着的另一种“绿色革命”形势，“然而这个过程却被布尔什维克的‘红色革命’破坏了”。应当如何评价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必须指出过去的苏联历史著作中，把这些措施一味称之为“反动的”，当然过于片面。其改革由于建立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人土地所有制的田庄，由于部分农民离开村社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同时移民政策也有利于西伯利亚的开发。然而斯托雷平的改革整个来说是不成功的：改革目的是维护沙皇专制制度，造就一批忠于沙皇的农场主，其政策必然不敢根本触动沙皇专制的基础——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苦农民在重分土地中遭到极大剥夺。1907—1914年，农民反抗次数逐年增加，达到一年上千起，就是对斯托雷平的回答；改革指导思想也是形而上学的，把农庄和田庄这种私人土地所有制理想化，似乎非此就不能发展农业生产，甚至不顾区域、气候条件不同强行推广一种生产模式。在整个改革期间，从村社退出的农户在1909年达到高潮——579400户，此后退出的农户数字直线下降。到1916年1月，总共才约300万农户退出村社，不及农户总数的1/3，划出的份地也仅占村社土地面积的22%，实际上在革命爆发前斯托雷平的改革已经停滞。可见那种认为如果不是“红色革命”，“绿色革命”也会发展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记者：显然1917年二月革命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的选择。他们也看到斯托雷平改良道路行不通，革命不可避免，利用俄国人民反对沙皇统治的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推翻沙皇专制，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最近俄罗斯一些人对临时政府评价颇高，如前苏联总统顾问雅柯夫列夫就说道：“如果停留在拥有自由的二月革命，而不将国家推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是否更理智些？”您对此如何评价？

吴恩远：雅柯夫列夫或许不了解历史研究的一条基本准则：只能就已发生的事实研究历史，而不能“设想”历史会怎样发生。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临时政府成立后宣布政治大赦，准备召开立宪会议，宣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取消民族限制，这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措施无疑是一个进步。然而，关键是他们能否真正沿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走，并能够解决俄国人民迫切关心的和平、面包、土地诸问题。

最初在临时政府居领导地位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

益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1917年4月18日,临时政府给各盟国发出照会,向他们保证:“全体人民愿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彻底胜利”,并继续命令前线的军队投入战斗,这就根本违背了早已厌倦战争的俄罗斯人民意愿;在土地问题上,临时政府通令采取一切措施直至“调动军队”镇压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行动;对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对生产监督的要求则置之不理;竭力阻挠被压迫民族自治的最起码要求……临时政府的这些行动是由其本性所决定:俄国大资产阶级与沙皇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总理李沃夫公爵曾任沙皇统治下的城市联合会军需供应总委员会领导人,该委员会并不想根本改变沙皇的内外政策,“顶多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所以在不到半年内就经历了四月、六月和七月三次危机,受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这个临时政府,又何以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继续下去?

记者:七月危机后政权转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手中,他们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许多相似之处,其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发展的不成熟,决定了他们“既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又缺乏承担责任的能力”。所以,革命发展的历史重任只能落在布尔什维克党身上?

吴恩远:是这样。20世纪初期俄国大约有50多个党派。其中较大的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我们已经分析了前三个党派失利原因,正如你所说,俄国革命发展的历史重任落在了布尔什维克党身上。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1)有以列宁为首的党的领导。新型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由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最先进分子组成,俄国无产阶级由于其所受的残酷压迫而最富革命性,“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成为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和动摇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并能抓住历史机遇,要求革命突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如工厂社会化,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等),使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

自己的方向发展；布尔什维克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党为革命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确立了工农联盟的政策和从争取革命和平发展到武装起义的方针，规划了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形式。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2)解决了俄国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农民有权分得土地；通过了和平法令，宣布俄国退出世界大战，使饱受战争之苦的俄官兵听到了自己的心声；宣布俄国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承认了芬兰、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国家的独立，为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措施大大提高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使得苏维埃政权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凯歌行进”。3)能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与俄国实践结合，并吸收了人类最先进思想和最优秀的科学成就。当时俄国许多革命者曾流亡国外，能详尽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了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运动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列宁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而是大胆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能否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列宁当年和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激烈争辩而且时至今日史学界仍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记者：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列宁的这一思想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请谈谈您的理解。

吴恩远：我认为列宁的主要思想是：十月革命虽然并不意味着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它所要解决的仍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但由于俄国所处特殊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它可以而且应当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社会主义一些最初步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正在于此。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回顾这段历史，列宁作了经典性总结：“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在我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或者

说社会主义的工作，可以归纳为三大项：(1)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揭露两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强盗集团的大厮杀并使这场战争打不下去……(2)建立苏维埃制度这一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3)从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这方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就是说在俄国这样落后国家是可以而且应当毫不拖延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革命需要解决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基础，而这个工作则是长期的。这就是关于落后国家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意义。列宁的思想既和那些认为“俄国只能搞资产阶级革命”的右倾思想划清界线，又和认为“俄国当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左”倾思想划清界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这些先进理论武装下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记者：既然十月革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那么，它对后来苏联社会的发展，特别苏联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什么作用？

吴恩远：其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第一次摆脱被奴役被剥削地位，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从经济地位看，革命以前贫富差距极大，12家银行控制全国银行资本的80%，达几十亿卢布，而工人平均月工资不足16卢布；平均每户地主拥有300俄亩土地，普通农户只有8俄亩。革命以后，仅从1940年工资水平看，全国各部门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3卢布，其中工业生产部门工人为32.3，建筑工人为33.9，运输工人31.7，农场职工为21.9，文教部门职工为32.3，科研机构46.7，而国家各级管理机关于部为38.8卢布。在俄国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社会公正、平等的原则。

其次，保持了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正如俄共1995年1月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指出：十月革命是俄国当时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崩溃，领土被肢解，执政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联盟完全丧失能力的情况下保存民族国家唯一现实的机会。1941年，当法西斯

德国入侵苏联,使占人口 45%、工业总产值 33%、耕地面积 47% 的领土沦入敌手、苏联面临灭亡之时,由十月革命而激发巨大热情的苏联工人、农民和士兵依靠国家强大的工业和国防能力,在苏共领导下英勇奋战,终于把德军赶出苏联,不仅为世界人民最终消灭希特勒德国作出贡献,并且再次捍卫了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三,短期内使俄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向实现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列宁在驳斥第二国际一些人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时曾提出一个著名论点:为什么不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革命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加快了工业化步伐,在较短时期内,即在 1937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1913 年俄国农业总产值为 240.43 亿卢布,占国民收入的 34.8%,工业和运输业仅为 133.83 亿卢布,占国民收入 19.3%,到 1937 年苏联农业生产值为 262 亿卢布,工业总产值已达 955 亿卢布,已占国民收入 80% 以上。1938 年与 1913 年相比较,苏联工业产值增长了近 7 倍,年均增长率为 7.8%,同期美国年增长率为 1.4,英国为 0.7,法国为 0.6,日本为 2.7,德国为 1.6。苏联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进程。而且此时苏联工业总产值已占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不仅在工业生产方面,在其他社会指标发展方面也取得某些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以往史学家对此是注意不够的。我们试借用社会学和统计学方法,把苏联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作一比较:

1940年前后苏联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状况比较

国 别	城市人口 占总人口 比重 %	第三产业 就业人员 比重 %	每千人 口拥有 医生数	每千居民 受过普通 教育人数	婴儿死亡 率(逆指 标%)
苏 联	33	23	0.8	245	81
美 国	58.5	51.8	1.33	220	33
德 国	75	34.3	0.69	133.7	55
英 国	80.4	42.7	0.42	122	33
法 国	52.0	35.0	0.68	131.7	53
日 本	37.9	29.8	0.9	166.1	60

记 者:从您介绍的情况表明,与1913年俄国社会发展各方面指标全面落后相比,在识字率和医疗保障方面苏联已跃居前列。

吴恩远:如果从发展速度看,把各项指标与前面1913年对应指标比较,计算出每一项指标从1940--1913年发展指数和年平均增长速度,我们还可看到另一幅图画。

记 者:具体怎么计算?

吴恩远:计算方法如下:

指数计算方法为 $Kq = \frac{q_1}{q_0}$ 。Kq表示发展指数, q_1 表示报告期指标, q_0 表示基期数量指标。

年平均增长率计算方法为 $\bar{X} = \sqrt[n]{R}$ 。其中X代表年平均增长速度, n代表环比发展速度次数,即发展时期数, R表示发展总速度。

1940—1913年苏联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指数比较

	苏联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发展指数	年均增长率	发展指数	年均增长率	发展指数	年均增长率	发展指数	年均增长率	发展指数	年均增长率	发展指数	年均增长率
每千居民受过普教人数	368.4	5.1	111.7	0.4	84.9	-0.3	98.7	-0.1	74.8	-1.6	115.7	0.7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率	43.8	1.4	140.4	1.1	138.3	1.0	--	--	124.6	0.7	115.5	0.5
每千人口拥有医生数	444.4	5.7	92.4	-0.3	138	1.2	--	--	136	1.1	115.4	0.5
城市人口比重	183.3	2.3	123.6	0.7	118.2	0.3	106.1	0.2	117.9	0.7	209.4	3.8
婴儿死亡率 (逆指标用倒算法计算)	321	2.4	490.9	3.2	376.4	2.7	439.4	3.0	281.1	2.1	251.7	1.9

表中清楚地反映出苏联在识字率、医生数、第三产业的发展指数和平均增长速度都高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城市化(仅次于日本)和减少婴儿死亡率(次于美国、德国、英国)方面也有较大发展。虽然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指标作参考,不足以概括全貌,但仍可以证明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各方面取得了令人不容否认的成绩。必须强调指出:此时的俄国,除工业产值外,从社会的全面发展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不能说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可惜当时苏联领导人并未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记者:十月革命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吴恩远: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消灭人剥削人现象,工农当家作主,体现社会公正的制度为一战后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打开第一个缺口。一战结束后一些国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整个欧洲在1920—1921年间制造业下降9.5%,英国失业率达11%,美国产量下降20%,失业率达11.5%,德国同期物价上涨15倍。每个国家都为巨大的社会不稳定震撼。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德国、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被压迫者爆发一系列革命,从根本上

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世界上从此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既竞争，又共处的新格局。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变成了实践，证明了其强大生命力。我们说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新纪元”意义就在于此。

十月革命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在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经验的情况下艰难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其无论是成功或失败的范式都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是为人类文明进程积累的一笔宝贵财富。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加速了已日益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桎梏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灭亡。

在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苏联在加强国家对经济计划和调控、消除失业、抑制通货膨胀、实行社会保障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全新面貌，这也是社会主义苏联对人类文明发展所作的贡献。资本主义国家一定程度上也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经验才得以摆脱了战后危机。前美国总统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也承认资本主义“与此同时已针对和适应某些社会主义关切的问题作为它本身的社会政策”。

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既是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又使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得到升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收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并结合中国实践。毛泽东曾与俄国革命逐一对照，指出这些经验的重要性，如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关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因而有革命胜利可能性；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及制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等问题，由此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又正是吸取了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

第三代领导集体正继续高举这面旗帜,使中国在苏东剧变情况下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升到一个崭新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将会更加显示出来。单此一点,十月革命也功莫大焉。

记者:现在我们应当谈谈第二方面的问题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说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问题,这与十月革命道路有否联系,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吴恩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建设是社会主义革命密不可分的两个阶段。正如我们分析十月革命的意义必须联系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总结十月革命教训自然也应联系苏联几十年历经的曲折过程。因为苏联后期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乃至国家最终解体很大程度上也是苏共领导逐步背离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和列宁所开创的十月革命道路的后果。可简要归纳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把马列主义理论僵化、凝固化方面的教训。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最大问题是如何结合本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照搬马克思的个别词句,在俄国能否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从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等等问题上列宁都与党内外那些“自命马克思主义者”、“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但却“学究气十足及迂腐到极点”的人进行了坚决斗争。“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列宁不断告诫全党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变化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此后的苏共领导人,则是从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出发,或过分强调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过早取缔新经济政策,消灭一切非公有制经济;或固守“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原则,致使国民经济结构长期失衡;或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推进世界革命、加速军备竞赛,最后也搞垮了苏联经济。最近俄国历史学家总结十月革命教训时深刻指出:“列宁以后的共产党以及领袖们对党的政治与思想理论方向的遗产贡献甚少……”。创造性

的革命变革理论被变成了某种教条主义的宗教信仰和变种”，这是造成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长期停滞的思想根源。

第二，未能加快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教训。

十月革命爆发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俄国现代化进程的矛盾引起。沙皇专制以及随后的资产阶级政府均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加速俄国社会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必须承认苏联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与发达国家有差距。60年代以后，以适应战时需要为核心的苏联经济体制已日益丧失发展潜力，而执政者又不能或不愿对其加以根本改革，这是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逐年下降的根本因素。从第七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1961—1981年）国民收入年增长速度从6.5%下降到4.2%，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从8.6%降到4.2%，农业从12.3%降至8.3%。到80年代中叶，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1—3%，扣除涨价的石油收入实际增长率几乎为零。我尚未全面统计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发达国家差距，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但苏联长期以来农业落后，轻工产品匮乏，生产效益不高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必然影响苏联社会现代化进程，影响苏联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及经济效益，这就背离了十月革命初衷。

第三，未能更好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教训。

布尔什维克党早期领导人吸收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人类文化优秀成果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列宁曾反复强调学习资本主义生产管理方式（如泰罗制），学习资本主义经商方式，起用资产阶级军事、管理人才等等。但此后苏联领导人由于固步自封，使苏联日益脱离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如关于“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及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的影响。特别是二战后世界掀起新技术革命浪潮，引起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生产力布局的巨大变化，促进了生产力巨大发展。科技革命要求管理体制相应变化：1）建立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的机构；2)针对新技术产品多样、多变的特点实行灵活的经营体制；3)适应于高技术人员流动的体制。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显然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发展要求。时代呼唤改革和开放。苏联虽几经改革却由于思想束缚未能触动旧体制根基。即使按苏联统计数字从1965—1984年苏联劳动生产率始终只及美国的40%。实际上，从70年代至80年代，苏联劳动生产率已下降一半多，从6%到3%。苏联科技人员已从占全世界科技人才总数21%下降到17%，美国则从23%上升到31%。

第四，在防止共产党腐败变质脱离群众方面的教训。

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是十月革命成功最根本原因。工农当家作主，廉洁政府，社会公正曾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对世界最富吸引力的因素。但列宁晚年已深切感受到对党和国家官员实行监督以杜绝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防止个人专断问题的重要性，可惜列宁逝世过早并未找到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此后苏联领导人则逐步背离了十月革命为建设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民主的原则，党内民主空气缺乏，严格的等级制度，领袖个人专权常常导致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缺乏有效监督使党内特权阶层产生，引起党群关系的恶化；僵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常使国有财产被视为“无主人财产”；生产成果分配的不合理使群众丧失发展生产的兴趣；工农的主人地位仅仅成为宣传中的口号……苏共的演变不仅逐渐失去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为后来反对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借口。

十月革命迄今已80周年了。十月革命历经血与火的考验，鲜花与掌声的拥戴，痛苦和眼泪的洗涤……它的成功和挫折都曾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启示。当今俄罗斯政府已签署命令把11月7日作为民族和谐和解日，意味着在俄罗斯各派无论政治观点如何，谁也不能漠视十月革命的存在。作为20世纪最重大事件之一的十月革命将永载史册。

马林来华与国共合作

王德京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下,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的。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三次来华,对推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马林第一次来华与国共合作的提出

1921年6月3日,马林到达上海,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他在谈到这次来华的任务时说: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①。马林在到达上海之前,对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多少了解。共产国际领导对他的任务也没有作过具体的交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当他启程赴华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没有给我什么专门指示。我仅有的事前准备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全球代表大会的讨论和提纲。之所以没有专门指示,是由于没有什么专门指示可给的”^②。

马林来华之前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② 《马林赴华回忆》,《“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4页。

议》。决议明确提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①。马林来华后，直接帮助准备并亲自参加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然而奇怪的是，大会期间代表们对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似乎一无所知，“一大”决议中竟然规定，中共“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②。马林究竟有没有给中共“一大”代表传达共产国际“二大”的上述指示呢？包惠僧在有关回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马林是在大会闭幕后，才向中共中央建议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这是由于中共“一大”开幕后，“第一天的会议马林出席做报告，谈的是第三国际的使命，国际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都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第四天的会议马林到会准备谈当时民主运动与政治斗争的问题。刚一开会，法国巡捕房有一个侦探闯入我们的会场，我们发现了马上散会。第五天的会我们是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的，马林不便参加，所以马林的这个意见（即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意见——引者）一直到会后一个多月才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来。”^③这是中共“一大”参加者对此问题作出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马林到中国不久即参加了中共“一大”，那时他对中国的政治情况还了解不多，也不大可能很快提出同国民党联合的问题。来上海后，马林除了与共产主义者密切联系外，还广泛地接触了其他各种比较进步的政治势力。当时，总部设在上海的国民党自然是他了解的重点。在马林档案中保存下来不少关于国民党的调查记录手稿。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马林了解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是一个民主革命派的政党，于是他在陈独秀由广州返回上海后，就向中共中央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③ 包惠僧，《回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二大”和“三大”》，第590页。

恰巧这时，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远东民族会议，要马林负责邀请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为此事亲自寻求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联系”，11月21日，马林与当时上海国民党总部的负责人张继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国民党决定派一名代表去俄国参加远东民族会议，同时邀请马林于12月“到孙中山设于桂林的大本营去，并同国民党在广州的领袖建立进一步的联系”^①。

1921年12月10日，马林带着翻译张太雷经武汉、长沙前往广西，12月23日到达桂林。他们在那里停留了大约半个多月^②。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以及俄共和红军的组织建设等情况，引起孙中山的浓厚兴趣。孙认为新经济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不谋而合”。

马林同孙中山就承认并联合苏俄的可能性问题进行过三次长谈。孙中山表示，“北伐后，他立即同俄国公开结盟”，“但是，只要他的北伐还未完成，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过早地联俄会立即引起列强的干预。”因此，他现在“只有同俄国建立非正式联系”^③。

马林同孙中山就联共问题也举行过会谈。马林在他的报告中没有具体介绍，只提到“孙中山向我抱怨说，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感兴趣，成立了一些小的集团和派别，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④会谈时曾经在座的当时广西地区国民党负责人邓家彦却有明确的记载。他写道：在会谈中，马林“宣布第三国际意旨，力促国民党与之联盟”。孙中山回答说：“吾侪革命党人也，诃不同

^①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3页。

^② 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他们在桂林呆了9天。在他的赴华回忆中，又说“在桂林同孙中山一起渡过了两周”。在马林档案中，有他在桂林起草的一份文件标明日期是1922年1月10日，据此判断可能在桂林停留了两至三周。

^③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3页。

^④ 同上，第72页。

情革命？顾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扞格而不通，故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①看来，孙中山当时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不赞成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而只要求青年们积极参加国民党。

大约在1922年1月10日后，马林与张太雷离开桂林，1月23日抵达广州。他们在那里呆了10天左右，同当地国共两党的负责人继续探讨了国共合作问题。据陈公博回忆，马林到广州后，“张继先生和他约我在长堤的西濠酒店谈话。张继先生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问题，当时他们所谈的还不是国民党容共问题”^②。在广州，马林还同陈炯明长谈了三次。当时陈与孙中山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认为陈炯明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孙中山“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在马林从上海动身前往桂林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甚至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公然鼓吹中国共产主义者应联合包括陈炯明在内的“共产主义者”组成强大的共产党^③。马林却认为陈炯明虽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说完全站在俄国革命一边，但“俄国的发展却又使他向右转”，“至今未实行任何社会主义的改革”^④。实践证明，马林对陈炯明的这种观察是正确的。

2月3日以后，马林又到广东汕头等地了解农民和工人的状况，3月7日才回到上海。3月19日至29日，马林去过北京一次，通过驻在那里的苏俄外交使团负责人裴克斯向莫斯科提交了两份报告，一份是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要介绍中共和国民党的情况；另一份是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建议苏俄政府向中国南方派驻一位使者，同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这时，正好少共国际代表

① 邓家彦：《马丁阁总理实纪》，《革命文献》第9辑，第1410—1411页。

②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二大”和“三大”》，第571页。

③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428页。

④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3—74页。

达林来到中国，苏俄政府便委派他为全权代表与孙中山进行会谈。4月，达林到达广州会见孙中山。在会谈中，除中苏关系外，达林也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两党建立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问题，并建议“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①。据陈独秀说，对达林关于联合战线的建议，“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②。由此可见，孙中山不会同意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加入国民党或者两党合并之类的建议。

通过近三个月的南方之行，马林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由知识分子、华侨资本家、南方的士兵和工人4类成员组成，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说，马林对国民党同工人和农民的联系，估计得高了一些，他说的国民党能够沿着现在的方向“发展成一个士兵和工人的党”^③，是不符合实际的。此外，马林也了解到国民党的多数领导人，包括孙中山在内，曾在国外接触过社会主义，不少人对俄国革命和红军组织感兴趣；国民党党纲的写法使社会主义者能够加入该党，孙中山也允许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这样，马林返回上海之后，就向中共中央建议，通过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行国共合作。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共中央及其大多数地方党组织的反对。他们只同意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即建立两党并立的民主联合战线，而不同意加入国民党。马林无奈，只好去寻求共产国际领导的支持，于是在4月24日从上海动身绕道欧洲前往莫斯科。

在第一次来华期间，马林除直接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

①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二大”和“三大”》，第251页。

③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427页。

立外,还选择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联合的主要对象,并提出了国共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这些意见都是他独立提出的。马林在回忆中说:“我在提出这些意见时,哪时哪刻也不存在什么来自莫斯科的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并没有带着指示离莫斯科。我只是以自己在爪哇运动即泛回教联盟的经验为依据。”^①可以说,马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共产国际“二大”的精神,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初步地结合起来,为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指出了正确方向。

二、马林第二次来华与国共合作的开始

1922年6月,马林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书面和口头报告,详细汇报了他所了解的中国情况。在此之前,共产国际主要从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了解中国情况。他们的意见是:“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②。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则明确提出共产国际和苏俄应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他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马林认为,“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③。他还提议共产国际在广州设立办事处,负责与远东各国的联系,并建议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也迁到广州,在那里进行公开的活动。

① 《马林赴华回忆》,《“二大”和“三大”》,第548页。

② 同上,第545页。

③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5页。

马林的报告和建议受到共产国际的赞赏和重视。《国际新闻通讯》曾报导,在7月17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马林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通过透彻的研究,他对这个大国的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有了一个很深入的了解”^①。7月1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决定,中共中央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非力浦同志(即马林——引者)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②同时,共产国际和红色职工国际正式委任马林为驻中国南方的代表,代表它们同中共中央及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联系和合作。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作出《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靠这些小组去宣传“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思想”^③。

8月12日,马林带着上述指示返回上海。这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开过。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仍然坚持国共党外联合的形式。马林认为这是孙中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因而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左”倾决议。他向中共中央通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建议举行一次特别会议,重新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杭州西湖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马林和张太雷。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和通过的决定没有留下正式的文献。有关当事人事后的追述或回忆颇有出入。

1922年12月29日,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中谈到中共中央西湖会议时说:“会上讨论了莫斯科委员会的指示”,“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员——引者)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

①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②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8页。

③ 同上,第80页。

组织,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①。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却说:中共二大散会后不久,“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即李大钊,他当时不是中央委员——引者)、张特立(即张国焘——引者)、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②。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则谈到了会议讨论中各人的具体意见:

“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他的论点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決定,我们应当服从”。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0页。

^② 《“二大”和“三大”》,第521页。

“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①。

从以上各人在会议前后的政治表现看，张国焘的上述回忆应该是大致可信的，不过他说会议决定只是党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加入国民党，这点却未必可靠。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在7年之后，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他身上，并被开除出党的情况下，满怀怨愤写的，自然充满着偏激之词。与此相比，1923年6月，他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到西湖会议时，态度要客观冷静得多。他指出，中共“二大”以后，“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②。陈独秀的这席话，是距西湖会议不过一年，面对包括马林在内的许多直接当事人讲的，应该是真实可靠的。由此看来，1922年底，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西湖会议在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没有遇到激烈反对”，似乎“一致认为”应该这样做，显然是有意淡化矛盾，以便使共产国际领导更加坚定地支持国共党内合作的政策，真可谓用心良苦。平心而论，马林在西湖会议上的作用，应该给予肯定。由于他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使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采取了新的政策。正如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讲到西湖会议时所说：“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41—243页。

② 《“二大”和“三大”》，第170页。

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①。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些党的负责人首先加入了国民党。这是孙中山采取容共政策的明确表示,也是马林极力推动的国共党内合作的开始实现。

在马林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着手改进国民党的组织和工作。1922年9月,他召集在沪的各省国民党负责人开会,商谈如何改进国民党问题,马林和陈独秀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孙中山还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拟定国民党的纲领和章程草案。在此期间,马林曾向国民党的中央干部讲话,建议他们在全国的工人和农民中积极进行宣传工作。1923年元旦,经孙中山审定的《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正式发表,它不仅对三民主义作了某些新的解释,并据此提出了一些较为进步的政治主张。接着,国民党又召集在沪党员开会,正式宣布党纲和总章。会后,孙中山陆续任命了国民党总部各机构的负责人员,共产党员陈独秀被委任为参事,林伯渠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担任宣传部干事。这些都为国民党彻底改组作了初步准备。

在这次来华期间,马林还大力推进苏俄政府和国民党的合作。苏俄对华谈判全权代表越飞通过马林与孙中山保持了密切联系。但是,越飞在实践中不能不执行其政府的既定方针,同吴佩孚进行联系,并要求孙中山也和吴佩孚密切合作,甚至幻想建立一个孙吴联合的政权^②。越飞和马林之间因此出现了不一致,1922年底越飞委托马林回莫斯科请示。

在第二次来华期间,马林依靠共产国际领导的支持,成功地使中共中央改变了不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为国共合作的实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① 《“二大”和“三大”》，第170页。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107页。

三、马林第三次来华与国共合作的确立

1922年12月23日,马林离开中国去莫斯科。在马林到达莫斯科之前,1922年11月初至12月初,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最后通过的由拉狄克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中国目前还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准备时期。这种发展的中心任务是联合中国人民和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国共产党人要提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为实现同唯一不追求帝国主义目标的大国——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而斗争”。决议认为吴佩孚与美国有联系,张作霖则是日本的附庸,孙中山支持张作霖实际也是支持日本,因而没有明确提出国共合作问题,只强调,“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①。

马林到达莫斯科后,12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马林和维经斯基列席。马林汇报了中国形势和革命运动情况,并坚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革命的策略。这与共产国际四大决议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会后,布哈林综合共产国际四大的决议及马林汇报的情况,起草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初稿。1923年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讨论此决议初稿时,马林继续为执行他在中国的策略辩护,与维经斯基发生了争论。马林强调国共合作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维经斯基则强调建立群众性工人政党和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共产国际执委会让马林和维经斯基商量修改决议初稿^②。

几天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通过了修改后的《关于中国共产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162、163页。

^② 同上,第188—192页。

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既肯定了“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又提出，“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此外，还强调在同国民党合作进行民族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这比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前进了一大步。

1923年1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任命马林同志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的第三名委员”，“以前对马林同志的委任予以撤销”，“马林同志今后的工作由东方部决定”，“主席团认为，马林和维经斯基同志参加下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是适宜的”^①。

1月11日，马林离开莫斯科赴中国，2月3日，抵达北京。不久即发生“二七”惨案，吴佩孚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华北和华中的工人运动遭到严重损失。马林主张中共中央迁往广州，致力于国民革命，但维经斯基不赞成马林的意见。他在3月9日致马林的信中说：“据中国报端揭载的内容，显然目前仍笼罩着罢工的气氛，最近的将来华中和华北地区也许会成为发生新罢工的区域，很难设想你将如何从广州给与指导和安排联络。”^②

共产国际内部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复杂的意见分歧。中共“三大”前的4、5月间，张国焘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情况。他返回中国后曾谈到在中国问题上共产国际分为三派：维经斯基、萨法罗夫、拉狄克是左派；布哈林是中派；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10页。

^② 同上，第132页。

马林和越飞是右派^①。这种分法虽然不够科学,但表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倾向。“二七”惨案后,俄共中央由于明确了支持孙中山的态度,坚决要求支持吴佩孚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共产党内对国共合作也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西湖会议上虽然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不过,当时党内多数人尚未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所以除少数领导人外,多数党员并未加入国民党。“二七”惨案后许多党员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工人阶级独立的争斗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必要有各阶级的援助”^②。这就使大多数党员对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加之此时孙中山对联俄容共表示了很大热情,国民党的党务开始有所改进,中共党内对国民党的轻视心理也在逐渐改变。由于上述原因,共产党员中赞成加入国民党的日渐增多,“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只有陈公博、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几人及一部分广东与湖北的同志。”^③

1923年1月,滇桂联军打败陈炯明并占领广州后,邀请孙中山回粤。2月,孙中山应邀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此后,他一面为巩固广州革命政权,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而斗争;一面为扩大国共合作,彻底改组国民党而努力。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二七”惨案后由北京迁回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根据马林的建议,又于4月底迁至广州,马林也同时来到广州。

为了促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和政治宣传,马林用孙铎的笔名,在《向导》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敦促国民党放弃单纯依靠武力的做法,而以主要力量去宣传和发动群众。他指出,“我们首先要紧的责务就是成立一个全国国民革命分子之强有力的组织”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4页。

②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③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79页。

一个真正强有力的群众党”^①。为此，国民党必须“抓住民众”，并“站在指导民众地位”^②。在此期间，应孙中山的要求，马林和陈独秀一起制定了一个国民党改组计划草案，并与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领导成员进行了讨论。孙中山还要马林参加国民党，“直接代他从事党的改组工作”^③。但是，马林感到，此事如果没有取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如果他不能仍然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那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另外一个人就会带着建立中国群众性政党的美梦前来，这种谬论将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得到宣传，我的处境就会非常尴尬。”“如果因此可能导致我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脱离关系，那我是不会同意的。”^④这样，马林没有参加国民党。

在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同时，马林还大力协助中共中央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举行。共产国际原决定派马林和维经斯基二人代表国际参加，但维经斯基因故未能来华，马林便成为参加大会的唯一国际代表。然而，张国焘由于得到维经斯基等人的支持，并不买马林的账。他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任意散布马林是“右派”，说他“崇拜国民党”，“想把共产党搞垮”等等。在大会讨论中，张国焘意以“左派”自居，公然说：“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希望这次会议将通过略左一点的决定。”^⑤

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争论的具体情况，由于会议的正式记录没有保存下来，我们不可能作全面准确的介绍。不过在马林档案中有几份“三大”期间的笔记以及大会前后写的有关此次会议的一些报告和信件，其中记载了若干代表在会上发言的要点。尽

① 孙铎：《吴佩孚与国民党》，《向导》第24期。

② 孙铎：《第二次世界大战》，《向导》第25期。

③④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95页。

⑤ 同上，第242页。

管这些记载由于经过多次翻译,可能有不够准确全面之处,但作为主要当事人的记载,对于研究中共“三大”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原始资料。再参照张国焘、蔡和森等其他当事人后来写的报告与回忆,“三大”期间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情况大致还是清楚的。

中共“三大”上争论的焦点,同共产国际中的分歧一样,集中在中共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个问题上。用马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党员是应通过加入这个国民党去完成共产党的任务抑或是应将我党人力集中起来去为尚未分化成完全独立的力量的工人阶级建立一个工人党”^①。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了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派以马林、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另一派以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为代表。会议开始时,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精神起草了一个详细提纲,其中强调,“我们的任务是把国民党发展到全国去”,“要批评国民党内的封建主义策略”,“迫使国民党走上革命宣传的道路”,“为此必须建立由工农组成的国民党左派”;他认为,“工人的政治利益首先就是国民运动的利益”,“我们党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组织继续存在,它同样主张在全中国各地做国民运动。”^②马林则依据共产国际一月决议中关于中国的中心任务等内容,强调“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我们要把国民运动作为中心任务”^③,“为了开展政治活动,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做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④他认为,所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应该贯彻国际的指令,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运动,而且要发动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以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翼。

与此相反,张国焘却提出“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工人阶级虽然“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是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29页。

② 同上,第247页。

③ 同上,第232页。

④ 同上,第245页。

相当力量”；他认为共产国际一月决议中关于中共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只是想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同志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并未要求所有共产党员都加入，“这项工作不是压倒一切的”^①；他强调“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② 蔡和森也指责陈独秀“把工人置于国民党旗帜下”，强调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③。

经过热烈的讨论，大会最后通过了陈独秀提出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因此，应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决议还指出，“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④。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表决陈独秀提出的上述决议草案之前，大会曾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其进行审议。张国焘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并在会上提出一项修正案，大意是要求在草案中增加如下内容：“工人中的中共党员，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国民党”。“不应采取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项修正

① 《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二大”和“三大”》，第 221—223 页。

②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42 页。

③ 同上，第 239—240 页。

④ 《“二大”和“三大”》，第 182 页。

案最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①。马林在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报告中也曾说,陈独秀“提纲中有一项在决议〔起草〕委员会中受到攻击,对这一项作出决议时,陈独秀的意见以 21 票赞成 16 票反对获得通过”^②。不知两人讲的是否同一件事。

总之,中共“三大”围绕着国共合作问题进行的大辩论中,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派意见基本上被否定。在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时,张国焘也落选了。大会通过的决议把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运动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同时,要求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党的独立性。这就表明,在如何理解共产国际一月决议的问题上,大会基本上接受了马林的意见,而与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萨法罗夫、维经斯基等人的意见大相径庭。

在中共“三大”会议结束的当天,马林在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汇报了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讨论情况^③。他不仅严厉抨击了张国焘在政治上的错误主张和组织上的破坏活动,也指责共产国际中的“反对派”和一些俄国同志“曾娓娓动听地阐述过一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趋向”,并指名批评拉狄克在共产国际四大上“根据不真实的情报”,强调中共应“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要求“尽快有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他还揭发共产国际东方部内有人当着张国焘的面谈论在中国问题上共产国际中存在着左、中、右三派,指出“这样的情况本不该发生。”

应该说,马林在为自己的策略辩护时,确实讲了一些过头的话,如他在批评对中国的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过高的意见时,曾说过:“党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中国工人阶级“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说,他们都不是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好材料”,在工会的宣传中“绝对不要为此目标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等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册,第 295 页。

②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48 页。原文〔起草〕二字可能为译者所加。“三大”并未设决议起草委员会,疑为决议〔审查〕委员会。

③ 同上,第 242—251 页。

等。这些提法不能不说是极端片面的、错误的，因而被“反对派”抓住，攻击他要“解散共产党”。实际上，当时工人群众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二七”惨案后，部分工人产生了畏惧共产党的心理，党和工会中也发生了不少矛盾。这使马林一时过于悲观。实事求是地说，他并没有搞垮共产党的想法。就在上述信中，他表示同意陈独秀的看法，认为党在“一大”时还“悬在半空”，到“二大”时，“就脚踏实地了”，“最近一年的情况表明，党在组织工人加入工会方面有了进步”。他一直致力于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总是争取从苏联援助国民党的经费中，多拨一些给中国共产党。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把中共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只是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单纯依靠独立地发展工人运动，不可能很快出现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而只有通过加入国民党，努力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中共才能更快地发展壮大，为建设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至于说他“崇拜国民党”，这也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如果说他在第一次来华期间，还没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对国民党“曾有相当好的印象”，那么随着了解的加深，他对国民党的弱点和问题曾经多次提出严厉的批评。在他最后离华前致廖仲恺的一封信中，就直率地指出，“虽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然而在实际行动上却日益封建化”，“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各封建军阀为伍”。还说，如果党不改变方向，着手党的改组，“党的前途就肯定是暗淡的”^①。这怎么能说是“崇拜国民党”呢？

马林坚信国共合作的策略是正确的，因而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坚决的斗争。中共“三大”以后，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及大批工农群众纷纷加入国民党，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他离开中国不久，国民党即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并以此为起点，逐步掀起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中共“三大”以后，经过短短3年多的时间，中共党员

^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01—305页。

即由 420 人发展到近 6 万人。实践证明，马林倡导并积极推动的国共合作策略，既符合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也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可以说这是中国革命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马林对中国革命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

应该指出，马林在华期间的工作也有缺点和不足之处，主要是对统一战线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坚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得不够。在统一战线正式建成之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宗派主义的条件下，马林的上述缺点和不足，对当时的革命工作尚未造成什么实际的损害。至于 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那是由于包括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内的各种主客观因素造成的。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在 1926 年底以后才形成的。这同 3 年多前早已离开中国的马林是没有多少关系的。

尽管实践越来越有力地证明马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创议的国共合作方向直到 1927 年国民党叛变之前，一直被坚持下来，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反对他的人依然不肯认输，并且一直把右派的帽子加在他的头上。马林作为参加中共“三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在“三大”结束后，只好于 1923 年 8 月中旬离华赴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挂名任职。莫斯科当时正弥漫着“左”倾情绪，张国焘也向共产国际告状，攻击马林右倾。在这种情况下，马林不能不陷于孤立。8 月，联共中央决定派鲍罗廷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顾问，11 月，共产国际又委任维经斯基为驻华代表。这使马林争取重新以国际代表身份来华工作的努力完全落空。1924 年 3 月，他只好辞去东方部的工作，返回自己的祖国荷兰。1927 年后同共产国际完全决裂。

1925—1926年胡汉民的莫斯科之行

李 玉 贞

1925年廖仲恺遇刺后胡汉民险些被捕，在广州失去了立足之地，被“放逐”到了苏联。在莫斯科他会见了苏联党政军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打算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为一个支部以取代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

(一)

胡汉民自190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后，一直跟随孙中山，辛亥革命后被任命为秘书长，参与国民党的决策。1922年，孙中山作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策，胡汉民虽然当时表示“有保留的支持”^①，但他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共关系的问题，“彻底甩开”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胡汉民作为外交部部长，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被放逐到苏联。1925年10月2日，胡汉民携女儿胡木兰，与朱和中、李文范、杜成志一起乘俄国轮船赴苏联。

胡汉民赴苏时，汪精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介绍信，称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导人就有意派员赴俄，因各领导均不得脱身，“兹者胡汉民同志以政务繁冗，身体不适，有转地疗养之必要，本党托其来俄一行，既有益于疗养，又得趁此机会与诸先生会晤”，信中介绍了胡的身分：“现为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治会议委员，又兼政府委员及外交部长

^①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的重要史绩及其影响》，《传记文学》第28卷，第6—9页。

等要职”；关于胡的使命，信中说胡将与莫斯科诸位先生商榷“为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关于党的组织、宣传各种问题，及中国国民革命时代所应采取之策略等等”；关于胡的职权范围，信中明确：“本党已授权与汉民同志，俾得与诸先生详细接洽，报告于本党斟酌执行”^①。简言之，胡汉民需要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商谈的一是关于国民党的党章党纲，二是涉及“中国国民革命时代所应采取之策略”，这就势必接触国共关系的处理，具体到国民党的“策略”则又出现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

(二)

1925年10月18日一个晴朗的星期日的早晨^②，胡汉民一行到达莫斯科火车站，受到了优厚礼遇。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长麦利尼科夫进入车厢，陪胡一起下车。仪仗队列于站台上，就地举行了欢迎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片山潜、农民国际代表、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相继发言，称胡为“兄弟的广州政府的代表”。

维护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是胡汉民在莫斯科扮演的角色之一。为制定国民党党章，胡汉民在他“工作计划”中的“国民党的策略与组织问题”部分里首先强调的是国民党的领导地位^③。为了说明国民党面临的任务，他认为应该明确以下三个问题：一，如何看待三民主义；二，如何实施三民主义；三，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④。为达到预期的目的，他煞费心机，搜索枯肠，动用了种种手法。

1、力图把国民党打扮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以证明中国

^① 吴相淑：《胡汉民先生年谱》，《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册，第218页。

^② 苏联《真理报》1925年10月20日记载，胡汉民一行到达莫斯科的时间为10月18日。

^③ 《胡汉民在莫斯科的工作计划》，《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670—671页。

^④ 同上，第671页。

共产党没有必要存在。胡汉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说广州的工人运动是国民党领导的，上海无产阶级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因那里国民党的力量相对小一些^①。他几次或著文或讲演驳斥“中国国民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的说法，认为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植基于工农阶级而为全民的利益”。很清楚这一切的潜台词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存在。然而胡汉民非常巧妙地表述了自己的意思，话到嘴边留半句：“老实说，国共关系的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现在跨党共产党人的策略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讳莫如深。应该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我向鲍罗廷说过这层意思，他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中共党员反对中国共产党公开活动”^②。为了说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非国民党莫属，胡汉民强调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际，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胡汉民还巧妙地把孙中山推崇的美国亨利·乔治的“民有、民治、民享”同苏式共产主义相比拟，甚至说这样做下去，“人民对于国家不止是共产，什么事都可以共的”^③。经过一番讨论，拉菲斯也不得不承认，关于国民党的纲领，应该写明的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即“民生主义”^④。

2、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同拉菲斯正面交锋。尽管胡汉民躲躲闪闪，拉菲斯还是听出胡汉民上面那些话的根本意图，并且反复向胡说明：

“国民党的使命，是为建立统一独立的中国和革命民主政权而

①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二次谈话》（1925年12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78页。

②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一次谈话》（1925年11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76—677页。

③ 胡汉民：《中国国民党的真解》，1925年10月。

④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二次谈话》（1925年12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82页。

奋斗,由这个政权去满足亿万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低社会要求。革命知识分子、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应该是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在制定党纲时,必须予以考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阶级性的政党,其使命是团结无产阶级,由这个阶级去完成其历史使命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中共最终的政治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当然力争把广大的农民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胜利而奋斗是党近期的政治任务。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任务近似,这就是共同战斗和互相联合的基础。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党。这个党的社会基础比之于国民党的社会基础要狭窄些,可中共的终极目标却比国民党的终极目标远大得多”^①。

胡汉民不愧为谈判高手,他根本不理睬拉菲斯说的国共两党当前目标与终极目标的异同,却使用了一个“顾左右而言他”的手法,说国民党“是接近共产国际的”^②。

听到这里,拉菲斯不相让了,他一针见血地点破胡的要害:

“我们还是有很多模糊的东西……如果照您的说法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否定它独立的社会基础,那么这个党的存在对中国革命来说就有害无益,而将其解散则为上策了。”

胡汉民反驳拉菲斯道:“如果您从我的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我们就很难谈下去了。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完全不该解散。”接着胡摊出了底牌:“国民党这方面,则应当力争加入共产国际”^③。

3、采取“以攻为守”、貌似左倾的策略,声称要把那些不能“正确理解三民主义”的人开除出国民党,以维护国民党的“纯洁性”。胡汉民对被冠以“左”字头衔非常得意。他站在“左”的立场上指责国民党内一些人不能正确理解三民主义,说他们不是革命队伍中

①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三次谈话》(1925年12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79-680页。

②③ 同上,第680页。

的人,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对这些人要采取严厉立场,要把他们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甚至要“清党”^①。胡汉民也指出小资产阶级“不理解”国民党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国民党应该制定一个“革命的党纲”,其立意和文字应该“清楚、确切”,以保证国民党“把全国所有的革命分子吸收”进来,并从理论上保证三民主义的实施,而不致把国民党“变为一个机会主义政党”。拉菲斯觉察到了胡汉民的“左倾”而提出了不同看法,建议国民党把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部分农民阶层团结在周围,而不要实行过左的政策,以免“吓跑小资产阶级”^②。

4、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正式向共产国际摊牌。胡汉民做了上述姿态后,一则取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任,维持着左派封号,二则为他承担的使命开辟道路,创造资本。他到苏联后提出的此行6个任务之一就是:“国民党要开展国际宣传和建立国际联络”^③。胡汉民谈到“不能正确理解三民主义”时也暗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他同拉菲斯谈论国共关系时说,只有“正确理解和实行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才能成立”^④。他几次提到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即他们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但“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或者是他们赞成联俄但“反共”^⑤。胡汉民表面上批评这些右派,实际上是赞成他们的主张——不许共产党人宣传共产主义或“曲解”三民主义。

1925年12月7日,胡汉民利用同拉菲斯第二次谈话之机说据三民主义的实质特别是其民生主义的实质来看,国民党更加接

①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一次谈话》(1925年11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76-677页。

② 同上,第676、677、683、684页。

③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三次谈话》(1925年12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74页。

④ 同上,第676页。

⑤ 《拉菲斯与胡汉民关于中东铁路冲突一事的谈话记录》(1926年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莫斯科1996年版,第31页。

近共产国际，所以要力争达到这个目标^①。

胡汉民提出此建议后，莫斯科一直没有正式回答，直到1926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6次扩大全会之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才致函斯大林，请斯大林安排与胡的会晤^②。但是斯大林的回答至今没有找到。胡汉民在莫斯科期间得知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采取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计策。胡汉民不满意这两派人用中国问题当焦点进行角逐，认为“拿别一民族革命的事情来作自己权利之争，这就是最不革命”，所以他利用了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间的矛盾，以期“把中国问题公开放在第三国际里面，而不要斯大林暗中偷偷摸摸地搅”。胡汉民觉得国民党公开加入了共产国际后，就能知道它“里面的一切情形……一切事情都要国民党自己负责，这完全是为国民党自己打算”，使国民党“有自己的地位，可以不受共产党的操纵与愚弄”^③。

1926年2月8日，胡汉民会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胡汉民依然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的观点与季氏谈话。季诺维也夫向胡强调，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各派革命力量团结在革命统一战线之中；中国必须同苏联友好；中国革命必须“欧化”，这一点是国民党过去忽视了的，它今后要加强与英法等国劳动群众的国际联系，否则便得不到世界无产阶级支持，中国革命不能成功；国民党要进一步加强同日本无产阶级的联系，要看清在国际范围内真正支持中国革命的只有共产国际，第二国际不想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联合，中国工人阶级

① 《拉菲斯同胡汉民的第二次谈话》（1925年12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80页。

② 《契切林致斯大林的信》（1926年1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28页。

③ 胡汉民：《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胡汉民全集》第3卷，第1397、1401页。

应该明辨敌友^①。这一席话使胡汉民正中下怀，他“高度评价”了季诺维也夫的话并且就每一点做了说明。更使胡汉民喜出望外的是，季诺维也夫主动提出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一事：

“我认为，国民党不仅应该了解中国情况，而且要了解全世界的局势，不仅要了解当前情况，还要了解过去的情况。所以国民党应该同全世界最革命的团体联合起来并且看清本党的力量所在。故此我想，我必须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同您，胡汉民同志讨论，这就是国民党同第三国际结合的问题，这种结合不仅仅只是名义上的，还应该是实质上的”。

胡汉民对季氏建议“发自内心地同意”，甚至不惜违心地说：“国民党应当……像第三国际一样关心共产主义”。最后，胡汉民还应季诺维也夫之邀请，同意在即将开幕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6次扩大全会上发言^②。

经过一番试探，胡汉民确切掌握了共产国际内部的情况，也为自己制造了相当的资本，1926年2月13日他正式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提要全文如下：

胡汉民就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事致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函提纲

(1926年2月13日，莫斯科)

中国革命为摆脱资本与帝国主义统治而斗争，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国民党经过1924年1月改组后把本党政策植基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之上。国民党致力于完成30年来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使命——从国民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① 《胡汉民与季诺维也夫的谈论记录》(1926年2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38—39页。

^② 同上，第40页。

当前苏俄是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人民同苏俄人民的联合感到深深的恐惧，故不惜一切手段阻挠之。但是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却不能长久容忍帝国主义的压迫，资本与帝国主义的末日已经到了。国民党要想完成自己的革命事业，就要把本党的革命运动同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所以要同他们联合起来。共产国际关于世界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是这场反帝斗争唯一正确的口号。

鉴于世界革命阵线的集中化会壮大革命运动的力量，如果共产国际把各国运动领导起来，这场革命运动定会所向无敌；鉴于反对资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应该步调一致，国民党认为本党应该加入共产国际。

我作为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并受党的委托函请共产国际接受国民党为成员^①。

一般来说，像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这样重要的问题，必须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内的重要人物拍板，季诺维也夫固然主动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可是在此次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扩大全会上由于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斗争，季诺维也夫不再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他已经无权决定，于是胡汉民便同更高一层的领导人斯大林正式讨论这件事。斯大林很巧妙地表示异议说：“你这一个主张是站在国民党左派立场上提出来的，国民党的右派是否同意你这一个主张呢？如果不同意，那你这个主张根本没有得到国民党本身的同意。况且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都注意中国问题，你们把中国问题公开放在第三国际里面，恐怕弄巧成拙，事情反而弄不好了”。

^① 《胡汉民与季诺维也夫的谈话》（1926年2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80—81页。

胡汉民很不客气地反驳说：“我以为你们如果承认国民党是同志，就应该正正式式联络，断断不可用暗昧的手段。因为用暗昧的手段就不是同志，这种暗昧的手段无异是暗中去弄他。我们国民党仍旧是国民党，如果要联合，那我们只有直接参加第三国际”。一阵唇枪舌剑竟延续长达6个小时。之后，斯大林采取了过回的办法：“……凡事不能过于求速，……且留他做一个缓冲；今回你所提的案子，我想请你保留半年！”胡同意了^①。

1926年2月17日，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第6次扩大全会开幕之日，共产国际的实际决策机关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要求参加此次全会的代表团讨论这个问题，季诺维也夫向会议报告了胡汉民的要求，会议决定：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出（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第17条）吸收国民党以同情党的资格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②。同一日，胡汉民根据此次会议让中国国共两党代表向大会致贺词的决定登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讲坛。胡向大会的祝贺词要点有三，即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三国际在中国的影响迅速扩大，第二国际得不到人们的信任；中国工农已经投身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③。胡汉民关于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基本内容相同的话令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不高兴，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博得与会者暴风雨般的掌声。会议将近结束时，季诺维也夫在主席台上向胡汉民透露，关于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一事请等候一段时间^④。

2月1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开会，与会者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

^① 胡汉民：《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胡汉民全集》第3卷，第1397—1398页。

^② 《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6次扩大全会的俄共（布）代表团会议记录第1号》（1926年2月1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128—129页。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116页。

^④ 胡汉民：《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胡汉民全集》第3卷，第1400页。

主席团委员共 32 人，季诺维也夫和吴廷康作了报告。他们二人向与会者报告了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情况，会议决议“认为，鉴于广州政府的国际地位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前景，务必说服国民党代表不要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①。2 月 2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正式致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方面肯定了国民党及其广州政府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共图中国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把国民党视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直接盟友。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以同情党的名义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当不会有任何异议”，但“帝国主义世界把国民党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倘该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则只能刺激帝国主义者去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广州政府和整个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②。此信并没有斩钉截铁地拒绝国民党的要求，而是留有充分的余地，希望国民党认真讨论，如果依然坚持本党要求，还可以派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第 6 次代表大会，以解决这个“重要问题”^③。然而事态的发展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自行解决，国民党既没有以同情党的名义加入共产国际，更没有再派代表团参加 1928 年的共产国际第 6 次代表大会。胡汉民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 1926 年 3 月回国。他没有赢得与共产国际的这场较量，1927 年夏秋之后中国共产党也不仅没有被胡汉民代表的国民党人士排斥出共产国际，反而密切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并在其指导下更加坚决地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①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第 11 号》(1926 年 2 月 1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2 卷，第 130 页。

② 胡汉民，《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胡汉民全集》第 3 卷，第 1401 页。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信》(1926 年 2 月 25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2 卷，第 131 - 132 页。

苏联、共产国际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郭 红 婴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中国东北地区一直是苏日斗争的一个焦点。因此,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从一开始就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并在政治上、军事上、物资上、干部培养上、特别是战略策略的制定上,给予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以有力的支持。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东北进行工作的渠道很多,如党的系统、外交机构、中东铁路、军事情报部门等,但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指导、支持和援助,主要是通过设在海参崴的太平洋职工秘书处^①(早期)、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期)和苏联远东军(后期)来进行的。根据共产国际的策略变化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发展,苏联、共产国际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

第一个时期从1931年9月至1934年7月。在这一时期,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双重领导,以中共中央领导为主。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通过太平洋职工秘书处来联系和指导东北工作,基本的指导性文件是1933年1月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

^① 太平洋职工秘书处,又称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太平洋劳动职工会秘书处,设在中国上海。1930年初,为了加强对中国(主要是东北)、朝鲜、日本等国的工作和对这几个国家在苏联远东做工的工人的教育,太平洋职工秘书处在海参崴设立了分局。这里说的太平洋职工秘书处实际上是指这个分局。

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 and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实际起草的、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

在这个时期的开始阶段,由于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东北的政策尚处调整时期,总的来说是支持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事业,不但拒不引渡退入苏境的李杜、王德林、马占山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而且还通过太平洋职工秘书处等组织继续九一八事变前已进行的为东北党组织培养和输送政治、军事干部。此外,苏联和共产国际还特别注意东北的工人运动,太平洋职工秘书处曾于1932年4月和1933年5月先后两次向东北发来指示信,促成了满洲总工会筹备处的建立,促进了东北工人运动的发展。

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由于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但有机会从高层及时洞悉共产国际政策的变化,而且能够通过各种渠道随时掌握东北抗日斗争战场上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加之他们远离国内阶级斗争硝烟弥漫的战场,能更冷静更全面地思考问题,使他们较早地认识到“目前东三省的特点,则在于:第一,东三省已为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所占领,全东三省人民已遭受亡国奴的命运;第二,目前在东三省,极广大的民众都抱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情绪。因此,现在便形成了一个可以实行广大的反日统一战线的环境”^①。1932年底,中共代表团召集一些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共同讨论东北问题,最后由王明起草一封给东北党组织的指示信,经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于1933年1月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这就是“一·二六”指示信。

“一·二六”指示信在分析东北沦陷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变化和4种抗日武装部队的阶级性质、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方针。同时,还提出对王德林救国军等抗日武装部队,“除

^① 王明:《东北情形与抗日统一战线策略》,1933年1月。

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①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次明确提出的突破了下层统一战线框框的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尽管“一·二六”指示信有很多历史局限性,但是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它首次指出,在这个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内,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并在这一政策的基础上提出统一战线的基本口号:建立统一战线的政府——民众革命政权,以替代过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建立统一战线的军队——民众革命军,以替代过去建立红军的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财产,以替代过去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建立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满洲反日会等等。

1933年春,中共代表团派李耀奎到东北传达贯彻“一·二六”指示信,但这封信是通过海参崴太平洋职工秘书处,由正在那里的中共满洲省委绥宁巡视员孙广英带到满洲省委的。满洲省委接到指示信后,经初步讨论,于4月16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接受该指示信的简要报告。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再次召开会议讨论“一·二六”指示信,作出接受这一指示信的决议,从而放弃了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极“左”路线。东北各地在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和省委决议过程中,陆续将赤色游击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或反日同盟军,并联合反日义勇军、山林队组成“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一·二六”指示信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生了由挫折走向蓬勃发展的历史性变化。

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由于地处北满腹地,日伪统治严密,又正值战事频繁,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十分不便。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想在靠近中苏国境的东满或吉东建立一个组织严密、有权威、固定的联络地点,以加强与东北党组织的联系。恰在这时,中共满洲省委派到绥宁巡视工作的孙广英也因日伪检查严密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60页。

和战争等原因与省委失去联系，他便借助过去的老关系（他是不久前由苏联派回东北工作的）与在海参崴的太平洋职工秘书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不但从那里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率先在绥宁地区加以贯彻，而且根据太平洋职工秘书处的授意，向中共满洲省委提议在吉东“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党委员会”，“名为吉东特委或满洲省委吉东局”^①。1933年5月1日，吉东局正式成立。吉东局及以后建立的吉东特委、吉东省委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指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3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十三次全会。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反法西斯斗争问题，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结束后，中共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和王明在会议上的发言，决定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满洲发一封指示信。这封信很快就写出来了。不久，共产国际在筹备“七大”过程中开始转变策略。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共产国际的策略转变不断深化，中共代表团结合共产国际“七大”的准备工作，又曾多次讨论“满洲问题”，对这封信也数次进行修改，几易其稿。1934年6月稿与初稿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形势还在继续发展，该信没有发出。中共代表团在继续讨论修改补充这封信的同时，又在酝酿用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二）

第二个时期从1934年8月至1936年8月。在这一时期，东北与中共中央断绝联系，东北工作主要由中共代表团通过其派驻海参崴的联络站来领导，工作重点是贯彻共产国际“七大”路线，基本

^① 《孙××关于东满政治局势、党的活动及有关要求建议的巡视报告》（1932年12月9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435页。

的指导性文件是中共代表团1935年6月根据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发出的《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即“六三”指示信)。

1933年下半年和1934年上半年,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①据说由于秘密工作受到破坏,共产国际怕引起国际交涉,撤销了太平洋职工秘书处;②上海的中央局屡遭破坏,无法正常实施对满洲省委的领导;③中共代表团发现中共中央发给东北的一些文件(主要是1931年2月22日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在重要策略问题上,常与代表团有不一致的意见,给东北工作带来困难;④代表团认为满洲省委的主要领导人是由上海中央局派来的,有奸细嫌疑;⑤代表团越来越认识到东北问题的重要,已把东北列为其工作重点之一(另一个是西北)。因此,1934年8月,中共代表团决定进一步加强东北工作的领导。从这时到1936年8月,代表团对东北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

第一,派杨春山(斯达干诺夫、石大纲)到海参崴建立联络站。这个联络站是中共代表团的派出机关,对东北工作负有领导责任。它除及时向东北传达贯彻代表团的文件、指示,送达东北各地给代表团的请示、报告,招收、派遣学生,转送出入境人员,为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外,还把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东北抗日前线的实际情况及时上报,有时还就东北问题向代表团提出意见和建议,必要时也直接向东北发出指示信。

第二,派杨松(化名吴平)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身分到东北工作。吴平来到吉东地区后,先后向密山、穆棱、宁安县委传达了中共代表团关于“动员党的和群众组织的一切力量,联合一切反日队伍,巩固和扩大反日统一战线”^①等指示,同时还写信向满洲省委、东满特委和饶河中心县委传达了这一精神。吴平根据中共代

^① 《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致饶河中心县委的信》(1934年10月1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2,第157、168页。

东北抗日斗争史话

表团的这些指示,纠正了密山、穆稜、宁安几个县委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改组了密山、穆稜县委和勃利区委,重新建立了中共吉东特委,组建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

第三,向东北发出《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即“六三”指示信)。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在吴平 1934 年 9 月来东北之前,这封信起码已经写出了第三稿。1935 年 2 月稿的内容与“六三”指示信已相当接近,但仍未发出。1935 年初,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抗联三军前身)政委刘昆(赵毅敏)来到莫斯科,并在 3 月 15 日中共代表团讨论“满洲问题”的会议上详细汇报了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情况,特别是反日统一战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对其策略转变的理论准备工作也已基本完成。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六三”指示信的最后定稿提供了保证。1935 年 6 月 3 日,这封历时一年半五易其稿的指示信终于以上明、康生的名义发出。

1935 年 8 月中旬,“六三”指示信转送到吉东特委,9、10 月间又由吉东特委转给北满和南满党组织。这封信指出,日前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时期,而是准备群众的时期,准备争取最后胜利条件的时期”。所以我们现在的策略“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蓄积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的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的更大的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并提出在东北要“实行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六三”指示信对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认识和据此制定的策略以及提出的扩大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共产国际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完全一致,也符合东北抗日斗争的客观实际。

同年 11 月 26 日,已经返回莫斯科的吴平,根据《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吉东特委的名义起草了《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即《吉特补充信》),着重阐述了在东北建立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具

体内容和做法。《吉特补充信》实际上是“六三”指示信的补充指示。

第四，改组东北党组织，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中共代表团通过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实践感到，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日伪严密的军警宪特组织，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设在中心城市的中共满洲省委，很难有效地实施对各抗日游击区、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大约在1934年8月，中共代表团对改组东北党组织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改变“组织的结构”^①。吴平到吉东后，向满洲省委传达了中共代表团关于建立珠河、磐石、吉东、东满4个特委的决定，但是此决定并没有实行。这时，中共代表团虽然没有提出撤销满洲省委，但通过在海参崴设立联络站，派吴平到吉东坐阵，确有用另一个更精干的新机构来取代满洲省委的意图。这就出现了在东北同时存在两个领导机关的不正常局面：一个是满洲省委，领导南满特委、珠河和汤原中心县委及城市工作；另一个是海参崴联络站，领导吉东、东满和下江特委。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代表团决定撤销满洲省委，建立吉东、哈东、东满、南满4个省委和哈尔滨、奉天2个特委。此时提出这个问题，除上述种种因素外，也包括怀疑满洲省委领导人有“奸细”，但主要还是由于共产国际“七大”重新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关系，改变了以往过分集中的领导方法的原因。根据共产国际工作方式的这一新变化，中共代表团从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出发，以四大游击区为中心建立4个省委，解决了过去满洲省委因地域辽阔鞭长莫及的问题，便于直接领导抗日武装，便于根据各地的特点指挥游击战争。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代表团的决定和设想并未能全部付诸实践，东北实际上只成立了南满、吉东、北满3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中共代表团也没有按

^① 《王明、康生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照在省委和特委之上实行中央代表制的原计划往东北派中央代表^①，甚至出现了组织混乱问题。尤其是在代表团与东北断绝联系后，东北党组织失去了统一领导，给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中共代表团在“六三”指示信中曾提出准备召集全东北义勇军代表会议，建立全东北的军事领导机关——东北抗日联军（或抗日救国同盟军）总司令部，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1936年2月10日，中共代表团根据《八一宣言》关于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原则，制定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2月20日，中共代表团又以杨靖宇等东北抗日将领和汤原、海伦游击队及东北抗日救国总会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此后，东北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编成3个路军共11个军，总兵力最多时达3万余人。

第五，为东北培养输送干部。中共代表团在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比较注重培养干部，其主要途径是选派优秀干部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海参崴列宁学校等院校学习。1932至1936年，东北各地党组织共派150余人赴苏学习。1936年初，中共代表团一方面派干部回东北传达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精神，落实代表团关于改组东北党组织，改编东北抗日联军的决定；另一方面，为今后在东北更好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决定从东北招收200人到苏联学习，并派杨松去海参崴联络站协助杨春山做好“招收学生”的工作。东北各地选派到东方大学学习的学生很快达到56人。但是这一工作不久就处于半停顿状态，到1936年9月基本停止。究其原因，东北党组织是有责任的，如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未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批准将一些老弱伤病残人员送去苏联安置等等。此外，恐怕还有其他原因，一是受当时国际局势发展的影响，苏

① 据康生说：“日本占领满洲后便分成十一省（应该为10省——笔者），我们便感觉要改变组织形式，便改为四个省委，上面有中央代表领导。过去代表团执行了这一任务。”笔者认为，如确有中央代表，应该是吴平或杨春山。但王明多次否认存在或派过中央代表。

联极力要稳定东方边境,尽量减少因出现国际交涉而给日方提供制造事端的口实,以避免将来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二是受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把一些问题看得过重,将一些曾经被捕过的人员或犯过一般错误的人员怀疑为“奸细”,从而使选派学生的工作搁浅。由于“奸细”问题的误导,杨春山也因对满洲来的人员没有很好审查而受到代表团的批评。后来中共代表团撤销海参崴联络站似乎也与杨春山的“问题”有关。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环境异常艰苦,急切需要补充大批干部。但是,从1936年初以后,中共代表团再也没有给东北派干部。其中的原因与共产国际提出“联蒋抗日”政策密切相关。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重心转向“联蒋”,所以在苏联学习的东北干部被陆续派到关内,最后连王明这届中共代表团也受命回国。停止招收东北学生,撤销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与此也不无关系。

(三)

第三个时期从1936年9月至1937年12月。在这一时期,海参崴联络站被撤销,中共代表团虽然仍司领导东北工作之责,在政治、组织、军事上都提出一些新的设想和建议,但已无力实施,除开始转来一份“中央新政治路线”的文件外,与东北的联系基本断绝。

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东方牵制日本的策略重心已转向“联蒋”,中共代表团的工作重点也随之转向关内,转向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8月,康生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提出,在东北应提“抗日反满不并提”的口号。9月,杨松根据会议决定,分别给杨春山和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写信,传达“联蒋抗日”和“抗日反满不并提”的方针,同时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把海参崴联络站与海参崴国际交通局合并的决定通知杨春山。海参崴联络站正式撤销。10月2日,中共代表团通过吉东道

北特委和哈尔滨特委向东北发出“中央新政治路线”指示，指出我党要和南京国民党军队建立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目前东北党的工作也应该按这个总的政治路线来进行，着重更广大地去扩大和巩固抗日的、统一的民族战线，不要把抗日、反‘满’并提。”^①此后至11、12月间，中共代表团与东北的联系逐渐减少以至最后中断。

中共代表团虽与东北断绝了联系，但仍关心东北的工作，并随时准备恢复与东北的联系。为了了解和掌握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中共代表团与来苏联学习或汇报工作的东北负责干部逐一进行了谈话。1937年5月，中共代表团召集在莫斯科的原在东北工作的有关同志，连续召开3天会议，听取工作汇报。会议重申了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这次会议继中共代表团于1935年10月2日成立满洲问题委员会之后，再次提议组织吉东和北满2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开展这两个地区的抗日斗争工作。会后，中共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并征求有关同志意见，对东北工作提出了很多新的建议。

1937年2月，原海参崴联络站派到吉东担任联络员的于化南（化名“诵”）因与中共代表团无法取得联系而去苏联汇报工作，再也没有返回。此后，东北各个省委即各自为战，独立工作。实践证明，东北党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对开展抗日游击运动极为不利。对于这一点，东北党组织和中共代表团都有同感。因此，杨松在1937年12月25日写的《关于东北的干部及对于东北工作的意见》中再次提议在东北建立一个名为“中心省委”或其他名称的统一的领导机关，并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使东北党组织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使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与全国的军事行动协调一致。中

^① 《第五军党委会通告》（1936年11月1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6，第373—374页。

共代表团这些设想和建议是非常好的,但由于王明、康生等代表团成员自1937年11月以后陆续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贯彻“国际路线”,中共代表团对东北工作的意见都没有传达到东北,也没有具体实施。

(四)

第四个时期从1938年1月至1945年8月。在这一时期,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处境极为艰难,东北党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在与上级党的联系完全断绝的情况下,经与苏联远东军协商,在苏方不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双方建立了政治指导和工作援助的密切关系。在苏军的指导和援助下,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战斗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与中共代表团失去联系后,面对敌人的封锁、“讨伐”,处境非常艰难。为了打通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为了寻求苏联的援助,各省委和抗联各军不断派人赴苏,但都一去不返,杳无音信。从1937年12月起,抗联一些军的主要领导人亲自赴苏,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有的被长期监禁,有的被遣送新疆。

1938年1月,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为解决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存在的问题,受中共吉东省委的委派进入苏境,通过“大山”^①,寻找中共代表团远东负责人。周保中不知道海参崴联络站已撤销,在苏联边防拘留所等了一个月,才得到一“代春山写”的回信,被告之:“此地组织已取消,以后再不要派人来,新的关系将由国内方面来建立,在未建起新关系前,你们应独立工

^① “大山”是苏联边防军与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联系的机关的代号。此系于化南赴苏前留下的。

作”^①。周保中也没有达到解决问题和建立联系的目的。

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苏联远东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38年7月张鼓峰事件发生,苏日关系骤然紧张。1939年5月,又发生了诺门汗事件,苏日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在重视远东方面日军动向的同时,开始想到发挥东北抗日联军的作用。

1938年9月,“大山”主动给周保中写信,要周保中迅速赴苏,解决周保中过去要求解决的问题,“以及讨论我和你的工作联系最后解决办法”。可是由于敌情严重,交通受阻等原因,周保中直到1939年5月才看到这封信,同年8月1日才给“大山”回信。在这中间,“大山”已迫不及待地找“五、七军的个别干部同志”为他们工作^②。苏联远东军也解除了对抗联三军军长赵尚志,六军军长戴鸿宾,十一军军长祁致中长达一年半的拘禁,帮助他们武装了一支以赵尚志为首的由百余名进入苏联的抗联战士组成的队伍,于1939年6月下旬重返东北抗日战场。

1939年5、6月间,北满下江特委派交通员去苏,带回苏方信息:他们最近接到了中共中央来电,要他们转告东北党组织,目前主要是保存实力,并要求苏联供给东北抗日联军大批武器弹药,苏联准备迅速执行这一任务等^③。1939年9月,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到达苏联伯力,受到苏方欢迎。苏方建议在远东“召集一北满、吉东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吉、北党的统一合并,二、三路军的合并和统一。”^④冯仲云完全同意这一意见。

1940年1月24日,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亦称第一次伯力会议)在苏联伯力正式召开,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

① 《春山(代)给周保中同志的信》,1938年2月21日。

② 《周保中给大山同志的信》,1939年8月1日。

③ 《冯仲云给金策并转中共北满省委的报告》(1939年6月2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5,第351页。据考证,此时中共中央未给苏联远东军,也未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去过这样的电报。

④ 《冯仲云给金策并转北满省委及张寿篪的信》,1939年10月8日。

仲云和赵尚志出席了会议。会议第一阶段,形成了《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和《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两个文件,总结了吉东、北满党组织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游击运动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渐收缩的斗争方针和继续坚持执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确定了抗联部队实行整编的原则和番号。会议第二阶段,中苏代表共同商定,苏联远东边疆党组织和远东军在不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对东北抗日联军实行临时指导和适当援助;苏方指定王新林^①作为苏联远东边疆党和远东军代表,直接与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发生工作关系。会议还达成了一项关于抗联各部因战斗失利或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方便的协议。东北抗日联军在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领导,遭受严重挫折、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苏联远东军建立了临时指导关系,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它确实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得以继续发展的物质保证和可靠后方,使东北抗日游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在与苏联远东军建立了接受指导、援助的关系后,曾多次请苏联远东军代转他们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报告,恳请苏联远东军帮助他们接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但一直未能实现。1940年9月30日,王新林突然通知抗联各路军领导人:12月将召集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的东北党和抗联领导干部会议,研究解决东北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并说:“十二月初中央代表就可来到”^②。这个消息,对于翘首盼望早日回到党中央怀抱的东北同志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喜讯。1940年11

^① 王新林,系负责与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联络工作的苏联远东军的一军官的化名。此后苏联远东军担任这一职务的军官虽多次更换,但化名始终未变。

^② 《王新林为召开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给各军指挥的指令》(1940年9月3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9,第289页。从现有资料看,此时中共中央没有向苏联远东派代表的意图。

月初，抗联各部领导干部陆续进入苏境，12月上旬集中到伯力。可是12月16日，苏方通知他们：中共中央代表不能前来参加会议。但会议（亦称第二次伯力会议）还是按时召开了。在会议期间，王新林提出在东北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抗联无法生存，游击战争也难以坚持下去，因此抗联应编成以侦察敌情为主的小部队，实际上就是要改变东北抗日联军的性质，把抗联变成苏军的侦察部队，取消东北抗日联军。以周保中为首的绝大多数抗联领导干部坚决反对取消东北党组织、取消东北抗日联军的错误意见，并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东北抗日联军领导干部的正确立场，得到了苏军上级领导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赞同，使会议最终取得圆满结果。此后，两次伯力会议确定的在保持中共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独立性的前提下，接受苏联远东军的临时指导的原则，成为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相互关系的准则。

从1940年秋冬开始，部分遭受严重挫折的抗联部队陆续入苏休整，并成立了南、北两个野营。1941年4月，正当抗联各部领导干部准备率领整编好的部队返回东北的时候，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提出在苏抗联部队要停止大批派遣回国。为了顾全大局，抗联领导同意暂时不把主力派回东北。1942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正式成立教导旅，名义上接受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88旅的番号，但内部还保持抗联的组织系统。教导旅在政治、军事整训的同时，不断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继续执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任务和部分侦察敌情任务。除此以外，苏军还挑选部分抗联人员由他们直接调动，专门从事东北军事侦察任务，为苏军对日作战做准备。广大抗联指战员在侦察活动中，冒着生命危险收集了大量真实可靠而又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配合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的战略行动，从1945年7月下旬开始，抗联教导旅陆续抽调90名指战员组成若干先遣小分队，派到苏军各方面军担任向导。这些抗联指战员圆满地完成了配合苏军的任务。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到,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关系中,苏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东北党组织是三个重要方面。第一,苏联在这一关系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尽管苏联由于同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需要,由于苏联国家利益的需要,做了一些有违中国人民利益,不利于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事业的事情,给东北党组织的工作造成被动。比如,公开声明奉行不干涉政策,向国破家亡的东北人民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把大批过境的抗日义勇军将士遣送新疆,订立苏日中立条约等等。但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苏两国人民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在整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苏联对东北人民的援助是全面的、一贯的、真诚的,对东北人民夺取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中共代表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领导者,它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种种有利条件,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有效地沟通了东北党组织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特别是在制定东北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代表团在领导东北工作中,也有失误和不足,比如,“断断续续,断而不续”的领导方式,改组东北党组织所造成的组织混乱,提出“抗日反满不并提”口号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提出“党军一体化”,给地方党的工作造成损失等等。这些失误和不足,都有其不能忽视的客观原因,但力争使损失小一点,还是应该和能够做到的。第三,这场战争锻炼和提高了东北各级党组织,使其从幼稚走向成熟。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后期,周保中领导东北党组织和广大抗联将士顶住压力,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既保持了同苏联人民的友好关系,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维护了东北党组织的独立存在,并率领东北抗日联军胜利凯旋。这不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成熟,也表现了中民族不屈不挠,酷爱自由,独立的铮铮铁骨。

胡耀邦与青年团工作

陈 模

1952年8月,党中央从四川调胡耀邦到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在此任上,他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解决团的工作中的两个重大课题

我国青年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青年团怎样继承过去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胡耀邦到团中央后首先遇到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1952年8月下旬,也就是胡耀邦到团中央不久,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会议,两次讨论了青年团工作。毛主席提出两个题目要大家研究:一是党委如何领导青年团,二是青年团应如何工作。在讨论中,毛主席指出:“青年的特点是英勇积极,知识不足,面对着新的建设时期,学习是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刘少奇也说:“青年团在斗争中当党的助手,在实际斗争中教育青年,这是根本的东西。”

胡耀邦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几次召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从我国青年运动的实际出发,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道路问题。胡耀邦指出:“过去30年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归结起来争取的是两个字:解放。今后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的任务,归纳起来还是两个字:建设。青年运动从来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过去是为人民的解放而前仆后继,今后就要为建设祖国而英勇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党和

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也应该是我们青年团的奋斗目标，就应该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开展团的各项活动。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率领全国青年，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生力军。青年们不能离开这个目标而另搞一套，否则青年们就有可能重复历史上的‘青年主义’的错误，从而把青年运动领向歧路”。他的这个发言，得到团中央机关干部的一致赞同，经过大家讨论写成文件上报到党中央。

同年8月25日至9月4日，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在报告中强调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使全团上下明确树立这样的基本观念：“青年团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学习是青年团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并明确规定，“关于青年团如何协助党教育好青年一代的问题，正是青年团测验自己工作的标志。”

这次全会基本上明确了在党的领导下从思想上原则上认清青年团如何工作的问题。胡耀邦把它总结为4条：1、要经常地认真地研究党的方针政策；2、要绝对服从党委的整个部署和接受交给团的具体任务；3、要根据党委制定的中心任务，提出团的切实可行的计划；4、上级团委要经常监督下级团委切实贯彻党委的指示。

毛主席提出的第二个题目——青年团如何工作，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也从认识上基本解决了。胡耀邦提出各地团委在工作中必须遵守以下3条：1、不必过多强调团的系统领导，而要切实尊重、服从党委领导，上级团委予以督促；2、政治上、工作上要有积极性、主动性，不懂的东西向党委请示。发觉某些党组织或政府某个部门工作有缺点、错误时，要大胆地向党反映，但不可以向党闹独立性，搞先锋主义；3、每个团干部要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做出切切实实的工作成绩，来体现党的助手作用，要防止干部中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形式主义的倾向，防止干部中华而不实、骄傲自大的倾向。

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在毛主席亲切教导下，把青年工作更加推向前进》的长篇文章。正是由于胡耀邦如此高度重视党对团的领导，统一了全团的指导思

想,使团组织迅速地得到发展,使中国青年运动在新的航道上大踏步地前进。

1953年6月23日至7月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开幕时,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祝词,要求青年团发挥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站在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最前列。胡耀邦在大会上代表团中央作了《团结全国青年在建设伟大祖国的行列中奋勇前进》的报告,总结了过去4年来青年团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青年团的任务。

在青年团二大期间,毛主席接见了大会主席团,发表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的重要讲话,解答了党如何领导青年团,特别是青年团如何工作的问题。第一,指出了青年团的工作方针。他说:1952年我出的两个题目,“都包含了如何照顾青年的特点。”“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第二,提出“三好”作为青年团的工作方向。他说,新中国要为青年着想,要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他要求青年们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第三,指出了青年团工作的基本方法,这就是要从青年的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不照顾青年特点就会脱离群众,要照顾多数,密切联系广大青年群众,不要把圈子搞得太小;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

青年团二大不久,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文件根据毛主席在团的二大讲话的精神,就党如何领导青年团做了重要指示。

共产党、青年团、青年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我国青年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毛主席讲的“围绕党的中心,按照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从根本上解决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胡耀邦对团中央和各省、市、区团干部也多次讲过这个问题。

他说：“关于独立活动和独立性，有很多同志混淆不清，以为开展独立活动，就是闹独立性，因此不敢放手开展独立活动。我们开展独立活动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干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建设，有利青年受教育和身心健康，为什么不敢放手呢？”他还说：“在开展团的独立活动中，不少地方的活动内容和形式一般化，缺乏青年特点。这样搞热闹一阵，持久不了，因为缺乏吸引力。要多调查青年缺什么，喜欢什么？多开展那种能帮助青年解决思想问题，学到知识和本领，在工作中发挥作用，又能长身体的独立活动。这种独立活动现在不是多，而是太少了。”

经过团中央和各地团委的努力，团的独立活动逐渐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狠抓思想工作

胡耀邦到团中央以后，非常重视对青年的思想工作。1953年8月，他规定每个阴天的晚上，都邀请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央团校等单位的负责人，到他的住处开“碰头会”。“碰头会”没有确定的主题，胡耀邦总是让大家围绕着团的宣传工作和青年思想情况讲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或读者来信情况，他不时询问或插话。他解释问题明确且有深度，有时看来是一些海阔天空的议题，就像百川汇大海一样，都要归结到一点上：怎样提高青年的共产主义觉悟，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突击队的巨大作用。

胡耀邦抓青年团的思想宣传工作，不只是坐在家里听汇报，也常到团中央各直属单位去考察、指导工作。他去得最多的是《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他对《中国青年》杂志的同志多次强调，《中国青年》不是一般的刊物，而是充满思想性、战斗性的刊物。你们第一位的工作是抓思想，根据当前党的中心工作和党的路线政策谈思想，不仅抓个别青年的思想修养问题，还要抓更多人的思

想问题，也就是那个时期的思想问题。有一次，胡耀邦谈到《中国青年》的性质、任务、特点时说：“《中国青年》是一个政治思想教育综合性的刊物，那么它就应该有思想权威，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我们杂志从来是有这个历史特色的，不过有时这个特色表现得鲜明一些，有时表现得黯淡一点罢了。”

为了执行胡耀邦的指示，《中国青年》编辑部经常请胡乔木、陆定一、于光远、田家英、丁浩川、魏巍、温济泽等理论家、作家，给青年们写些论人生观及思想修养的文章。陆定一的《向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魏巍的散文诗《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等，都在青年中打得很响。《中国青年》还经常举行“问题讨论”，“什么是青年的远大理想”讨论后，收到1万多件来稿来信，可见影响之大。

胡耀邦经常到《中国青年报》去，每次都要听汇报、发表讲话。他认为办好团报，集中到一点是要不断革新，作战斗的号角和喉舌。他说，《人民日报》和各报都在进步，《中国青年报》也要革新。党中央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要开动脑筋想问题。我们的报纸既是号角，又是喉舌。我们的号召要根据群众的意愿。这充满着新与旧的斗争，前进与倒退的斗争，这需要勇敢、坚毅的战斗精神。报纸没有战斗性不行，一定要扯破脸、搞批评，不要怕。在前进中犯了错误的人，比起那些实际上躺着不动的人要高明一百倍。因为前一种人虽然犯了错误，但是还表明他正在成长，正在成熟，正在那里发掘和发现某种程度上的真理，而后一种人，实际上却是阻碍着社会的前进，拖住大家不动。

在胡耀邦的指导下，《中国青年报》突出地报道了抗美援朝中的罗盛教、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的事迹，报道了郝建秀、韦玉玺、王崇伦、向秀丽、徐建春、王培珍等工农业先进青年典型，在团员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连续批评了一些团基层组织在发展团员上的关门倾向，对团员漠不关心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小学中迫害儿童的“吕再生事件”，上海的《马小彦是怎样腐化堕落的？》等典型报道，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在思想宣传方面建树甚多，有4件事特别值得称道。

第一，开展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旧社会遗毒的影响，加之许多团组织不注意后进青年的工作，一些大、中城市的青年存在着纪律松弛、道德败坏、偷窃、拐骗、贪污、赌博等不良现象。对此，1954年5月团中央常委会作了认真研究，要求各地团组织加以重视。随后，一场“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展开。胡耀邦在他写的《中国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一文中说：“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影响，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革命思想是不会自发产生的。在青年的思想阵地上，不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白旗，真空地带是没有的。放松思想教育改造工作，必然会招致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这是不利于青年的健康成长，不利于我们的事业的。”

第二，号召并组织青年向科学进军。1956年1月，周总理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求“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向科学进军的问题上，胡耀邦把培养青年专家、带领青年向科学进军、努力普及文化工作作为青年团的重要任务。为了引导青年向科学进军，各地团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报刊、广播、讲座，树立青年的信心和正确的学习态度；组织青年制订个人进修规划，尊重个人志愿，帮助他们作出长期计划和近期安排；帮助青年创造较好的学习条件，满足青年学习、科研的要求，压缩会议，尽量不占青年业余时间。

第三，开展农村扫盲和文化活动。扫除文盲，普及文化，是我国文教事业一项紧迫的任务。建国初期，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的高潮。胡耀邦非常重视这件事，派人到几个省乡村调查青年文盲状况，发现在农村青年中，文盲半文盲

占70%左右,他们对学习文化有着迫切要求。为此,1955年12月团中央作出了《关于在七年内扫除全国农村青年文盲的决定》,决定用7年时间,即从1956年到1962年,依靠已有的3000多万农村知识青年,扫除全国7000多万农村青年文盲,使全国青年文盲的80%左右脱离文盲状态,使他们每人识字1500个左右。此后,各省、市、区的各级团组织,也都加强了对扫盲工作的领导,订出了扫盲规划,农村民校和识字班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55年冬到1956年春,全国有6000余万人入学,1956年这一年农村扫盲六七百万人。只可惜的是,由于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扫盲运动停顿下来。

第四,开展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1958年6月,青年团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组织广大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决议》,号召全国青年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此后,各地团组织通过举办毛泽东著作讲座、报告会,运用业余学校,成立青年学习小组等多种形式,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一年,全国有1000万团员青年参加学习,1959年继续坚持学习的有200万人。胡耀邦非常重视组织团员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他在1960年3月的青年团工作会议上说:“这是件带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抓好了可以提高团员青年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培养一支年轻的理论队伍,还可以带动团的各项工作。”1960年4月,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议”,推动了学习活动进一步发展。

关心青年的成长

胡耀邦非常重视青年工作。1955年春天,他在视察广东团的工作时向广州市的团干部讲话,讲到要积极、广泛地宣传青年工作重要性时,说:“我们的党和毛主席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全世界的共

产党也都重视青年工作，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革命的党，青年人总是最先响应革命的号召。我们信奉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特点之一是向前看。人不可以把眼睛放在脑袋后面，申公豹干坏事，他的眼睛是长在脑袋后面的。为什么要向前看？因为我们人民的事业，是长久的事业，不是短时期可以实现，需要后代来继承，事业越是艰巨，越需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青年工作在任何时候都重要，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是一支强大的突击队。他们能够打先锋，是社会力量最积极的一部分。青年是新生力量，旧思想、旧习惯沾染比较少，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青年还是祖国的未来。新鲜事物就其性质来说，是不可战胜的，把青年培养教育好了，祖国也就有光辉灿烂的明天。所以，做好青年工作，不仅是我们的党和团的大事，也是国家和社会的大事，都要关心我们的青年，都有责任做好青年工作。”

1957年5月15日，胡耀邦在青年团三大所作的《团结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报告中，谈到青年犯错误、闹事时，讲得更深刻全面了。

“对于一般青年的错误议论和行动，要进行具体分析。有些议论在一方面是错误的；在另一方面还有某些正确因素。至于本来是正确、但是因和某些流行的说法不大一样的议论，就更不应该当作错误的东西来反对了。

“我们一定要让青年敢于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应该让他们充分讲出来，不要害怕。把客观存在的矛盾暴露出来，只会帮助矛盾的解决。对待错误的意见，青年团员自然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也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充分说理的方法，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求得团结。对于有错误行动的群众，也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这些群众中也可能夹杂个别的坏分子，但这种情况只是极少数。这个方针也适用于所谓‘闹事’的青年。某些青年群众之所以‘闹事’，常常是由于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和思想政治工

作做得不够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协助党和政府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使‘闹事’的青年从中受到教育,以达到提高觉悟、增强团结的目的。”

1955年5月9日,胡耀邦在中央团校作《团的性质与任务》的演讲时,要求团干部按如下标准去教育青年:

一、热爱祖国。我们国家站起来了,我们要搞社会主义,敌人是不甘心的,千方百计来破坏,我们要提高警惕,坚决反抗侵略。

二、热爱人民。就是要分清敌友,对人民要有最高的情谊,对人民的敌人要有最大的仇恨,对个人爱好、兴趣不要限制,对破坏公共利益及腐败现象要坚决斗争。

三、热爱劳动。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也要靠劳动人民来创造。要安心于平凡的劳动,积极钻研技术,搞好革新创造。

四、热爱科学。要努力学习,相信真理,我们国家要搞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就得依靠科学技术,不好好学科学技术怎么行?

五、热爱公共财产。要与那些破坏公共财产的现象作斗争。尽力节省人力、财力、物力,节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四大因素之一。

六、热爱共产党。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胜利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巩固和发展,我们的事业就有了领导力量,有了根本的保证。没有党的领导,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失败。

在这个演讲中,胡耀邦也讲了团干部怎样去团结教育青年的问题。他指出:一、必须很好地关心青年。只有关心青年,才能团结教育青年。要信任青年,为群众利益奋斗,这样他们才会拥护你,跟你走;二、要把依靠党和依靠青年中的积极分子密切结合起来。我们要依靠党,党要依靠群众。不少团干部感到工作很吃力,原因就在没有依靠青年积极分子,就像走路没有腿一样;三、要把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发展青年的个人爱好、个人兴趣密切结合起来。共产主义道德是共同的,个人爱好、兴趣是每个人不同的。这是个长期的工作,坚持抓下去才能奏效。

胡耀邦不仅重视青年工作，也喜欢和青年交朋友，李德炎就是其中的一位。李德炎是全国闻名的小麦育种专家。1958年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时，认识了胡耀邦。1964年全国团代会时，胡耀邦又接见了。1975年，胡耀邦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时，特邀李德炎参加《小麦育种学》一书的编写。1976年，胡耀邦被打成科学院“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在一次千人批斗大会上，李德炎作为“农民代表”上台作重点发言，神态狂热。打倒“四人帮”以后，人们纷纷指责他忘本，他的党籍被开除，人也被撵出了科技站。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给胡耀邦写了检讨信。1977年10月4日，胡耀邦复信说：“去年，你在科学院那个大会上的发言，当然，缺点是有的，教训也是有的，但问题并不很大。至于对我个人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你说，那次你被人当枪使了，这个认识已经很深了，用不着再作什么检讨了。如有工作机会来京，欢迎你来我家谈谈。”不久，李德炎来到了北京。

胡耀邦听说李德炎来了，立刻接见了。对他问寒问暖，尽量避开那个老话题。李德炎沉痛地说：“你让我把心窝里的话倒出来吧！我不该在科学院那个会上面对面地……”胡耀邦接下来说：“在那种形势下，人家叫你批判发言，你能顶住不干吗？你一个农民能顶住吗？这件事，我在信中给你谈了，这于你没有多少责任，还要纠缠它干什么？……人，总不能让过去了的事缠住双腿不能走路，要向前面看，要往前面走！”两人整整谈了两小时。

李德炎回到家乡之后，并没有摆脱困境，科技站的工作也没有恢复。他万般无奈，只好另找土地去作育种试验。

1981年8月，胡耀邦责成国家科技局派专人来到偃师县，恢复了李德炎的工作，李德炎情不自禁地哭出声来。

胡耀邦在大学生和机关干部中，在文艺界和体育界，也有许多青年朋友。他与这些青年朋友经常有密切的交往，给他们留下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李硕勋在香港、海南的英勇斗争

何 锦 洲

李硕勋，1903年2月23日生于四川高县庆符镇，曾任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会长、上海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主席，中共上海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书长、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党代表、党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南省委（领导江苏、浙江、安徽、上海4省市）军委书记。1931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他由上海到香港，准备从这里赴苏区，任红七军政治委员。

5月下旬，李硕勋写信给党中央，告知已到达香港，并请中央迅速决定他的行程。这时，蔡和森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章汉夫任省委宣传部长、杨捷芳任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凯丰任青年团两广省委书记。中共两广省委机关设在香港，这一年春夏间曾多次被反动派破坏，许多同志被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为此，中共两广省委写报告给党中央，请加派干部到广东工作，特别要求留李硕勋在两广省委工作。5月底，李硕勋以“素”为笔名，写信给党中央说：“函谅达，我去留如何，速复电，即遵行。”^①

由于多年带病艰苦工作，李硕勋到香港后病情加重，留在香港就医。6月10日，蔡和森在香港参加海员干部会议，被反动派逮捕，后被引渡到广州，壮烈牺牲。鉴于广东急需干部，党中央、中央

^① 原信无年月日，据分析应是1931年5月底。

军委任命李硕勋为中共两广省委军委书记^①，就地留在香港工作。

李硕勋在香港时，曾住在九龙深水埗长沙湾道中共香港市委秘书长潘亚波家中。在此期间，他除了与章汉夫、凯丰经常研究工作外，还常与中共香港市委负责人郑仁波^②、党中央驻香港交通站负责人李少石、中共两广省委军委干事廖独航、潘亚波等研究开展革命工作。有时，他找廖独航、中共两广省委代理军委负责人袁策夷（袁仲贤）等军事干部研究海南岛、东江、粤北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情况，分析形势，肯定前一阶段的成绩，并指出存在问题，商量怎样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现有的革命根据地，壮大红军队伍，进行土地革命。当时，在中共两广省委、省委军委领导下，广东武装斗争在极其艰苦情况下，仍在曲折中发展。在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人数已发展到2000余人，且在澄迈、定安、琼东、乐会、万宁、陵水等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东江一带，开辟了以大南山、八乡山为中心的9块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粤北的南雄油山一带，也有工农红军活动。李硕勋对海南岛武装斗争的发展非常高兴，他很希望能到这个号称天涯海角的宝岛去工作，进一步扩大发展武装斗争，再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李硕勋对东江红军也十分喜悦，称赞广东的军事斗争确实很有成绩。他指出东江革命根据地要注意继续发展，将来力争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李硕勋对粤北军事斗争的发展愈加喜悦。他指出：粤北革命武装将来要向南发展，与东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大片，进一步扩大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香港期间，李硕勋还与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干事、时任岭南（岭东）中学教员的林增华有过来往，共叙昔日情谊，畅谈阔别后多年工作、学习、生活状况，并互相勉励，今后认真搞好

^① 李一氓：《革命先烈李硕勋》，《新观察》1951年第12期。

^② 据柯麟回忆：郑仁波后被反动派逮捕，被关在中山县石岐镇，抗日战争初期才被保释出狱，后到澳门，转赴美国。

工作^①，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

那时，党中央认为：李硕勋一个人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容易引起别人怀疑，所以决定派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的赵君陶到香港，使他们夫妇团聚，以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

1931年7月1日，李硕勋与柯麟到香港码头迎接由上海乘轮船来香港的赵君陶及儿子李鹏。李硕勋见到赵君陶后兴奋地说：幸好你早来，如果迟来，我已到琼崖去了^②。原来，中共两广省委决定派李硕勋到海南岛策划游击战争。此后，李硕勋与赵君陶、李鹏住在九龙中共两广省委军委机关。这个机关，过去只有廖独航住此，是在一间商店内，以商店作掩护。廖独航住在楼上，李硕勋住在楼下。房东是廖独航的叔父，在店内做些小买卖^③。

有时，李硕勋也带赵君陶到柯麟、潘亚波处。

一星期后，李硕勋按照党的指示，准备去海南岛，主持召开琼崖游击队负责人的军事会议，并指导海南扩大武装斗争。^④他在香港首先召集省委军委的干部和有关工作人员开会，部署了东江、粤北等地的军事斗争，并说明他即将赴海南岛参加军事会议。随后，他到柯麟处辞别。柯麟想：李硕勋根本不会讲广东话，更听不懂海南话，派这样一个好同志到陌生之地搞秘密工作，开展武装斗争，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李硕勋党性和组织观念都很强，听从组织分配，准备赴琼崖^⑤。柯麟和爱人陈志英认为，此去天海茫茫，是凶是吉，很难卜算，只得以好言安慰，希望他沿途和到达目的地后，千万要处处留意^⑥。

8月，李硕勋乘上了从香港到海口的轮船。赵君陶携李鹏到码

① 柯麟口述、何锦洲整理：《李硕勋同志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的战斗》，1984年8月21日。

②③ 赵君陶口述、何锦洲整理：《忆硕勋》，1984年8月26日。

④ 李一氓：《革命先烈李硕勋》。

⑤⑥ 柯麟口述、何锦洲整理：《李硕勋同志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的战斗》，1984年8月21日。

头送行，彼此互道珍重，依依离别。当时，赵君陶已怀孕，但没有告诉他。因此，李硕勋只知有一个儿子李鹏，还不知道有遗腹女李琼（李琼在其牺牲后于1932年3月17日诞生）^①。赵君陶千叮万嘱他沿途要格外小心，到海南岛后迅速写信告知地址和去向，并望他参加琼崖军事会议策划游击战争后早点返香港。她在轮船启航时，依依挥手亲切辞别，只盼望他早日平安凯旋归来，重聚天伦之乐，孰料从此一别，竟成永诀。

几天后，李硕勋到达海南岛的首府海口市，住进得胜沙路中民旅店，并立即按秘密地址与琼崖党组织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联系，准备主持召开琼崖游击队干部的军事会议。他是四川人，既不懂广东海南地方话，又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作掩护，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密探是和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密探叛徒秘密勾结的。他不躲避这种艰险，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②，毅然到达海口，迅速开展革命斗争。正当他在海口从事紧张的革命战斗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于8月13日夜被当时反动军阀广东省军事委员会委员陈策派出的密探逮捕了^③。

在狱中，李硕勋铁骨铮铮，忠贞不屈，坚决不泄露党的秘密。敌人残酷拷打他，使他皮开肉裂，鲜血直流，体无完肤，最后两条腿骨被打断，也不说出任何情况。他知道叛徒已出卖了他的身分，只愤怒地说了一句：“我李陶是共产党员！”除此之外，敌人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一点党的秘密^④。为了不连累故乡庆符的亲友，他在狱中改籍贯为四川省宜宾人，改名为李世勋。敌人无奈，把他押送到琼山县政府监狱。

在铁窗里，敌人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法，劝李硕勋投降。他对党始终忠贞不二，誓不降敌，宁死不屈，自知即将就义，秘密写下绝命

① 据赵君陶1984年8月1日的回忆。

② 李一氓：《革命先烈李硕勋》。

③ 聂荣臻：《回忆李硕勋烈士》，1984年6月3日。

④ 四川省高县档案馆存《革命烈士李硕勋同志略传》。

书两封。一封给爱人赵君陶,说: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 九·十四^①

另一封是给陈志英的:

英姊:

我本不识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寄一函存你处托转她。我死不必念,务望代安慰她!!!并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指章汉夫—作者)处要数百元作路费回家(川),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

勋托 九·十四^②

李硕勋写好两封遗书后,通过狱友传出监外寄出。

遗书送出前后,当时驻在海南的军阀陈策与海南反动派头子商议,迅即把李硕勋的情况电呈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核办。9月初,陈策等得到将李硕勋就地枪杀电令。

1931年9月5日^③,李硕勋离开监狱,赴海口市东较场刑场(今海口至琼山府城的一块草地),由于他的两条腿骨已断,不能走路,敌人用竹箩抬他到就义地点。他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从容自若,大义凛然,中弹倒在血泊中,年仅28岁^④。

① 李硕勋给赵君陶的遗书,1931年9月,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② 李硕勋给陈志英的遗书,1931年9月,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③ 据1931年9月19日国民党琼山县县长陈明栋给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呈文说:“职府于8月13日晚在海口捕获共产党要犯李世勋”,“当经查讯属实,电奉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支电,准予就地枪决,等因奉此,遵于本月5日提出该犯,验明正身,漏赴刑场,执行枪决”。据此,李硕勋于1931年9月5日被杀害。

④ 李一氓:《革命先烈李硕勋》。

不久，李硕勋的两封遗书，经多方转折，由一位热心人邮寄到香港九龙岭南中学教员林增华家，再由林寄到香港九龙南华药房陈志英处。柯麟和陈志英看了这两封遗书后，心情十分悲痛。柯麟迅即向章汉夫汇报了情况，考虑到李硕勋可能尚未遇难，请章汉夫迅即派人到海南岛设法营救。柯麟对章汉夫说：他有一个熟人吕君璧，曾是前广东省省长陈炯明部下，现在海南工作，可送些钱给吕，托吕想尽千方百计营救李硕勋出狱。

李硕勋离开香港后，赵君陶曾带李鹏到柯麟处。柯说：琼崖有个别地方有组织地有系统地叛变；李硕勋不懂海南话，到那里工作是很危险的。过了一段时间，赵君陶仍未接到李硕勋来信，心忧如焚，再到柯处，也无音信。

李硕勋本来不熟悉陈志英，只知道陈是上海人，是赵君陶的朋友。他通过这样辗转寄遗书，目的是避免敌人发现和破坏，以保护地下党组织和同志。

柯麟收到遗书后，没有马上告诉赵君陶，深恐她悲伤过度。柯曾想把遗书先寄到上海赵君陶的三兄那里，再由他转交。后来，赵君陶多次问柯麟有没有收到李硕勋的信？万般无奈，柯麟还是把遗书交给了赵君陶。赵君陶看到遗书，非常悲痛，随即一方面写报告给党中央，另一方面把情况告知章汉夫。不久，党中央指示，要迅速尽力设法营救李硕勋^①。赵君陶对章汉夫说，她要赴海南想方营救。章汉夫说：你不要去，明天有船，我们派人去。

不久，赵君陶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出版的广州《国民日报》刊载一则消息说：“日前海口公安分局在得胜沙中民旅店，拿获之共党首要李世勋”，“经已讯明系来琼整理共产党务”，“应即依法处以死刑，并电呈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电准就地枪决。”除“呈报外，合行布告周知、此布。”

赵君陶看到这则消息后，知道李硕勋已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

^① 赵君陶口述、何锦洲整理：《忆硕勋》，1984年8月26日。

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她迅即把李硕勋的两封遗书和剪下的这则消息放在一个代乳粉罐内，保存了几十年^①。

这时，柯麟告诉赵君陶：1931年春夏间，设立在香港的中共两广省委、中共香港市委地下机关，多次被敌人破坏。蔡和森等省委书记和一些同志被捕壮烈牺牲。而中共香港市委秘书长潘亚波却太平无事，依然留在香港。李硕勋刚到海南岛不久即被逮捕，说明他下船时就有人把消息传到海南岛，情况可疑^②。并请赵君陶快点离开香港，赶回上海，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向党中央汇报。请中央派人到香港。

不久，章汉夫问赵君陶愿不愿意留在广东工作？赵君陶回答说：不愿留在广东工作。稍后，上海互济会寄来500元旅费给赵君陶。柯麟代买好船票后，赵君陶与李鹏随即回上海。

1950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看到李硕勋给赵君陶的遗书，深受感动，回顾在三河坝战役中与李硕勋日日夜夜并肩战斗的历程，欣然挥笔，为遗书题跋：“李陶（即李硕勋同志），四川庆符人，中国大革命时的共产党员。曾参加一九二七年的八一的南昌起义，进兵东江。后奉党命调广东工作，赴琼崖策划游击战争，不幸为反革命当局捕杀。硕勋同志临死不屈，从容就义，是人民的坚强战士，党的优秀党员。他对革命的功绩永垂不朽！”

1950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周士第将军为李硕勋遗书题跋：“义举南昌，战赣粤闽。分途找党，话别天心。白区工作，奋不顾身。牢狱不屈，遗书义深。公等鲜血，解放人民。忠心浩气，永耀不泯。遗志未竟，吾辈仔肩。革命必胜，公可安眠。”

1951年1月2日，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副总理郭沫若也为

^① 根据赵君陶的回忆，1984年9月1日。

^② 柯麟口述、何锦洲整理：《李硕勋同志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的战斗》，1984年8月21日。另据柯麟回忆：潘亚波与廖独航后来离开香港，叛变。

李硕勋遗书题跋：“五星红旗是无数志士的鲜血所染成的，硕勋同志的血也在里面炫耀着。捧读遗书，从容就义、慷慨临刑的精神活跃于纸上，使千百代后人见之，亦当肃然生敬。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成功的左券，是训育革命后进的不朽教材。”

1962年6月20日，为了纪念先烈，教育后人，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撰写了《悼念李硕勋烈士》一诗：

锦城初识美英华，有志男儿爱国家。
北伐从军趋武汉，南征转战别流沙。
几行墨迹明心迹，万顷涛花湧血花。
遗骨琼州何处觅，喜看红日照天涯。

在此前后，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撰写了《甲子一周怀硕勋》一文。全国政协委员、李硕勋的爱人赵君陶也写了《题硕勋遗照》诗一首：

英姿栩栩肖生前，
出入龙潭虎穴间。
不悲未竟平生志，
红旗染有公血鲜。

1983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为李硕勋题词：“李硕勋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此后，聂荣臻在回忆李硕勋时还说：他最早认识李硕勋同志是在广州，知道是上海大学的学生，搞学生运动，以后在南昌起义、在上海白区工作中都曾有过接触。硕勋同志对革命事业忠诚，工作积极活跃，很有活动能力。他所知道的李硕勋简历已写在他的回忆录上册“白区工作”一节中。全文如下：

“李硕勋同志，即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同志的父亲，1924年就参加共产党，曾长期领导学生运动，南昌起义时任过二十五师党代表，后任江苏省军委书记，1931年到香港后，任广东省军委书

记。省委派他去海南岛工作时，在海口市因被叛徒出卖而英勇牺牲。”^①

1986年12月14日，经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在海口李硕勋就义的地方建立了李硕勋烈士纪念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于1986年11月26日在该亭的李硕勋塑像上题词：“李硕勋烈士永垂不朽”。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震为纪念亭题名：“李硕勋烈士纪念亭 王震敬书 1986年11月”。

1993年9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题词：“李硕勋烈士革命精神永存”。1993年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为李硕勋题词：“浩气长存”。199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题词：“伟业千秋存、英名万古留”。

^① 聂荣臻：《回忆李硕勋烈士》，1984年6月3日。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作用

王 棣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新疆盛世才地方当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新疆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3年“四一二”政变,盛世才被推上新疆临时边防督办的宝座。他为了巩固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在投靠国民党无望的情况下,就投靠苏联。苏联从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出发,希望新疆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府,以保持苏中边界的安宁,便决定支援盛世才。盛世才在苏联驻迪化(现乌鲁木齐)总领事、何语竹等进步人士、俞秀松等联共党员(原先是中共党员,后转为联共党员)帮助下,制定并实行进步的“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作为新疆的施政纲领。1936年7月14日,他在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文中,发表了“七项救国纲领”,表示决心与全国各界同心同德、精诚团结,以救中国。“西安事变”发生时,《新疆日报》及时予以报道,盛世才表示尽力支持张学良,并在迪化召开了庆祝捉蒋大会。在国际战争浓云密布、国内抗日呼声此起彼伏中,新疆以其“无论对内、对外政策都是进步的、革命的,符合革命利益的”^①形象昭示全国。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地方当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可

^① 陈潭秋:《在新疆的工作任务与工作方针》。

能。

1936年冬，西渡黄河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队阻击。为了迎接西路军，党中央指派在莫斯科的陈云、滕代远为代表到新疆。1936年11月，陈云、滕代远和冯铨、段子俊、李春田等5人，从莫斯科出发，经阿拉木图到中苏边界苏方边防军军营时，适逢“西安事变”，他们接到中国共产党驻国际代表团通知：停止前进，等候通知。在他们行前，已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与盛世才取得联系，请他协助迎接西路军。同年12月初，盛世才在西大楼召集教导团部分军官，说：“我过去在关内有几个老朋友。现在他们带着一部分人来新疆，你们的任务是去把他们迎接到新疆来。”接着宣布，以教导团步兵第一营为基础，组建教导第四大队，到甘肃迎接，后因“西安事变”而暂停。盛世才准备迎接的，正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惨败，余部左支队于4月下旬进入新疆星星峡。陈云、滕代远一行5人，也于4月下旬到达迪化，经边务处副处长陈培生（即刘进中，中国籍联共党员）引见，与盛世才会晤，面商迎接西路军事宜。盛世才派教导第四大队随同陈云、滕代远等人前往星星峡迎接。中国工农红军400余人于5月7日到达迪化，驻扎在阜民纺纱厂休整。

西路军左支队，是失败后撤入新疆的。到新疆后去哪里尚不明确。当时部队思想比较混乱，有的要求去苏联，有的要求回延安。“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决定撤入新疆的西路军就地学习。陈云经与盛世才磋商，改编为西路军总支队，移至东门外盛世才教导团营房，对外称“新兵营”（意为盛世才新兵）。1937年10日，周小舟以八路军代表身分到新疆，和陈云一起与盛世才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盛世才表示愿与我党合作抗日，商定建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周小舟回延安后，滕代远任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盛世才地方当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二

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人一批批从延安、苏联来到新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利用一切可利用的阵地,宣传、教育各族人民,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起了特殊的作用。

(一)培养和训练了一批多兵种军事技术干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决定西路军左支队就地学习,开始学习文化和政治,后经陈云提议,党中央决定,利用党和盛世才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苏联支援盛世才的军事教官、军事装备,培养训练特种军事人才。1938年初,西路军总支队开始转入学习军事,如学习驾驶和修理汽车、装甲车、坦克和飞机技术,学习炮兵、无线电通信技术等,还有少数同志学习医学。西路军总支队先后培养了400多名现代化军事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高级干部,尤其是空军、炮兵、装甲兵的主要领导同志,相当一部分是当年西路军总支队和新疆航空队飞行班、机械班的学员,仅副军以上领导骨干,就有40多人。

胡鉴曾回忆说:“新兵营”对我军后来空军、炮兵、机械化部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这些部队不少的骨干都是经过那里培养的。如果现在要写空军史、炮兵史、装甲兵史,都得从新疆写起^①。

(二)保障了国际交通要道的畅通,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联系。

193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与盛世才达成通过新疆运输苏、美援华物资的协议。10月

^① 《胡鉴同志谈抗日时期在新疆工作情况》,1959年8月9日。

20日,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在兰州成立中央运输委员会,同年末在新疆设立分会,作为接待援华人员和转运进出口物资的特设机构,并开辟了经新疆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分为公路运输和航运两条。公路:新疆境内是从中苏边界的霍尔果斯至甘新边界的星星峡,沿途在新二台、精河、乌苏、绥来(玛纳斯)、迪化、奇台、吐鲁番、鄯善、七角井、哈密设立接待站。航空:从伊犁至哈密,在伊犁、迪化、奇台、哈密设立临时航空站。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这条国际交通要道,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维护这条国际交通要道畅通,成为中共、苏联、国民政府和盛世才共同的意愿。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把维护这条国际交通要道畅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1937年11月12日,陈潭秋给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指示信中列出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怎样巩固这个抗战的主要后方和国际交通要道。”

1936年,苏联应盛世才邀请,出兵相助,于1937年消灭了马仲英、张培元和马木提的势力,巩固了盛世才政权。1938年1月,苏联红八团进驻哈密,任务是防止马家军袭扰和国民党渗入新疆,这对维护这条国际交通要道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援华人员和军用物资,基本上都是从这条国际交通线通过的。据统计,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8月,苏联援华军火物资就有985架飞机,82辆坦克,1317门大炮,1550辆汽车,30台拖拉机,14025挺机关枪,16400万发枪弹,190万发炮弹,82300颗炸弹。1940年底又供给中国政府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3000门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1938年至1940年苏联向中国政府先后派出军事顾问140人,来华支援抗日的苏联志愿空军人员约2000人。1940年7月,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封锁了滇缅公路后,新疆成了国际援华物资输入的唯一通道。当时邵力子任驻苏大使,经与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假道苏联的中亚细亚共和国运输英

国援华物资的协定。暂定过境运货 19000 吨,平均每月 1600 吨^①。

新疆国际交通线的开通,使中国共产党加强了与共产国际、苏联的联系。从 1937 年到 1942 年,我党许多领导干部都是通过西安、兰州、迪化这条路线来往于延安——莫斯科之间的。当年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住过的领导同志有:周恩来、邓颖超、王稼祥、任弼时、蔡畅、陈昌浩、刘亚楼、孔原、张子意、方志纯、马明方、高自力、乔国桢、秦化龙、刘护平、曾传芳、杨芝华、李握吾、杨南桂、李景春等。王明、康生 1937 年回国,林彪 1941 年回国,也是经过这条路线去延安的。

(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在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下,盛世才地方当局和新疆各族人民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政治上的声援。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各民众团体,为了响应全国抗战号召,通电表示:“新疆虽僻处边陲,抗日救国,尤为吾人之素志,枕戈待旦,誓与国人共同奋斗。”1937 年 8 月 22 日,八路军将领就职通电发表后,盛世才发出了贺电,高度评价了工农红军,贺电说:10 余年来,红军以最大之牺牲与毅力,为民族抗日和解放中国作斗争,以期完成救国图存之伟大神圣事业,中间虽屡经波折,但奋斗精神与历年之伟绩确为全国民众所钦佩^②。1941 年 1 月 23 日,新四军将领陈毅等通电就职,呼吁全国人民“拒绝内战,一致对敌”。盛世才也复电支持,指出:“此次皖南事变,诚属抗战中之晴天霹雳,凡属爱国同胞,莫不惊诧痛愤。查贵军转战大江南北,深入敌后,劳苦功高,坚持抗战,屡建奇勋。不幸正当贵军与敌浴血苦战之际,闻墙变起,不独国人痛心,且亦震惊国际听闻”^③。每逢抗日捷报传来,新疆地方当局和各民众团体,都立即通电慰问、致

① 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 60 辑,第 193 页。

② 延安《新中华报》,1937 年 9 月 14 日。

③ 延安《新中华报》,1941 年 2 月 13 日。

新疆抗日救国后援会

贺，并且数次申讨汪精卫的卖国行为。1938年冬，反帝总会发动全疆各族人民，写了10万封各民族文字的慰劳信，亲切慰问喋血前线的将士们。万里关山外同胞的亲切关怀，使前线将士在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

物质上的支援。1937年9月，在反帝总会号召和领导下，新疆民众抗日救国后援会在迪化成立，并随即发起募捐运动。不到3个月时间，从城市到农村、牧区，从机关到蒙古包，从政府官员到工人、农牧民、商人以及监犯，迅速掀起了募捐热潮。

1937年10月，反帝总会发起了募捐10万件寒衣运动。这次募捐运动，除金银元宝外，收到现款67.8万元。1938年冬，反帝总会又发动了献金和防毒募捐运动。迪化设立的献金台，仅在3天内，就收到献金2亿两省票^①。1940年，为了抵抗敌寇使用惨无人道的毒气战，减少前线将士的牺牲，反帝总会再一次发起防毒募捐运动，捐款总数合法币7万余元。以上4次捐款，除金银首饰外，现金总数合法币200余万元，其中一部份捐款，从苏联购买了10架战斗机，并聘请苏联驾驶员开往武汉，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

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日前线的物资和现金，一部分直接运送到了延安。1937年10月，盛世才送给八路军皮大衣3万件，机枪一批；同年11月，送给王明美金1万元。同月，滕代远、李先念、程世才从新疆返回延安时，带了一批机枪和大衣；盛世才还派副官向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送去皮大衣3600件；1938年1月，又送去皮大衣103包。1938年1月11日，邓发致洛甫并转中央诸同志报告中称：“所需药品，盛仍可送一部份，我亦可再买，‘一二八’募捐的二百多万准备买药来。鹿茸精已着友方机师在阿城购买五百瓶送来。”1940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360名指战员返回延安时，配有步枪30支，机枪4挺，手枪2枝，子弹1.5万余发。

（四）促进了新疆经济的发展。

^① 当时新疆省票以两为单位。

1938年2月10日,毛泽民被任命为新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从延安派来的高登榜、郑亦胜、蒋连穆、钱萍等10多名共产党员也做财政工作,他们在新疆经济建设中起了重大作用。①培养财税干部:1938年2月,毛泽民创办了财政专修学校,培养了80名财税专门人才。在南疆的共产党员,也分别在阿克苏、焉耆、莎车等地培养财税干部500多名。②改组银行,改革币制:1939年1月1日,毛泽民经盛世才批准,将省银行改组为商业银行,奠定了新疆金融和经济基础。同时,进行币制改革。当时,市场主要流行以两为单位的省票,另有喀票、铜元、洪宪银元、天罡等,省票不断贬值,通货膨胀严重。为了稳定物价,繁荣市场,1939年2月1日发行了以黄金储备为基础,以元为单位的新币,兑换并废除省票。1940年底,新旧币兑换工作完成。为了防止奸商盘剥,减轻人民负担,毛泽民在商业银行设立了“公济当”。③制定第二期三年计划:毛泽民任建设计划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财政组长,参与制定新疆1940至1942年第二期三年计划。计划总收入1.03亿元,比第一期增长53.3%;总支出也是1.03亿元,比第一期增长58%。④发行建设公债:为了巩固国防,支援抗日前线,加速新疆建设,解决资金不足问题,毛泽民主持发行建设公债500万元。全疆各地共产党员为发行公债做出了积极努力,实际推销了668.91万元。⑤整顿税务,减轻人民负担:新疆原来税收制度十分混乱,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加上税收人员贪污受贿严重,致使人民负担过重。毛泽民在财税系统委派了10名共产党员和一批新培训的财税干部,清除或调整了有劣迹的分子,在农业区开展验契工作,防止富人隐地逃税,同时制定《征收牧税奖惩条例》,使牧税按牲畜数目合理负担,豁免了鸽粮、鼠粮等苛捐杂税,减轻贫苦百姓负担。⑥促进了工、农、交通事业:毛泽民大量拨款或贷款扶植新疆工、农、交通事业。工业方面,先后兴建迪化、伊犁电厂,面粉、皮毛、锯木、火柴、肥皂厂和新光电灯公司。农业方面:扩大贷款,1940年贷款51.8万元,1941年贷款100万元。交通方面:修筑了从迪化通向塔城、伊犁、哈密、喀什的4

条公路,总长 4160 公里。汽车由几十辆增至 400 多辆。

(五)发展了新疆的教育、文化和新闻事业。

1、发展新疆教育事业。1938 至 1942 年,从延安派来的林基路、祁天民、李云扬、朱旦华等 27 名共产党员,先后担任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领导职务或教学工作。他们团结各族教育工作者,为发展新疆教育事业做了下列工作:第一,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1938 年冬,教育厅召开第一次全省教育行政会议,确立了“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教育”的方针,并提出发展教育的十项具体要求。林基路作为新疆学院教务长,提出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教学方针。第二,健全中等学校课程设置,改善招生办法,充实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第三,编印小学课本,补充教材,加强抗战教育,开展社会活动,并出版《教育文摘》。第四,扩大民众学校,大规模举办冬学、初级职业学校和各种政治、技术训练班,扫除文盲。经过共产党人在新疆教育战线的努力,全疆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1942 年,全疆有小学 2463 所,其中公立学校 580 所,会立学校 1877 所。学生 27.11 万人,其中公立学校学生 9.1065 万人,会立学校学生 18.0038 万人。1942 年与 1937 年相比,学校增加 62%,学生增长 1.4 倍。

在中国共产党人和沈雁冰等著名学者的培养、教育下,许多青年学生懂得了革命道路,并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以齐国仁和阿巴索夫为代表的新疆一代青年在成长。后来阿巴索夫成为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

2、开展新文化运动。1937 年中国工农红军左支队进驻新疆,带来了思想健康、内容新颖、鼓舞斗志的抗战歌曲。1938 年从延安派来的共产党人,进一步掀起唱抗战歌曲的高潮,新疆学院、省立一中、省立女中和省立第一师范积极教唱抗战歌曲。1938 年,反帝总会举办歌咏比赛,更加掀起唱抗战歌曲的高潮。当时流行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流亡三部曲》等 20 余首。1938 年“五·一”、“七·一”西路军总支队

先后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无名英雄》、《血祭九·一八》、《警号》等话剧。同年秋,新疆各大中小学在林基路、李云扬、朱旦华领导组织下,举行话剧比赛,演出了《死里求生》、《一个游击队员》、《牺牲》、《呼号》、《黑眼睛》等20多出话剧。1939年茅盾、张仲实、赵丹等人来新疆,成立文化协会和实验话剧团,演出了《新新疆万岁》、《战斗》、《突击》等话剧,把新疆的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

3、办好《新疆日报》。1938年1月至1942年9月,中共派到新疆的干部中有9人先后在新疆日报社工作。他们团结各族职工共同办好《新疆日报》,为抗日救国,建设新疆,巩固后方,支援前线,大造舆论:第一,宣传“六大政策”。“六大政策”是盛世才地方当局的政治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地方当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新疆日报》始终把宣传“六大政策”作为重要任务。第二,宣传抗日。《新疆日报》先后刊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谈话》、《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向延安东方各族反法西斯大会的致词》,朱德的《八路军抗战一周年》、《胜利在望,团结向前》等文章。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新疆日报》连载长篇通讯《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并发表《学习晋察冀,援助晋察冀》的社论,帮助新疆各族人民“了解整个抗日战争的前途”,加强“抗战必能最后胜利的信心”。1941年1月后,《新疆日报》又增辟“七日时事”、“时事漫谈”等专栏,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分析反侵略战争的发展形势。第三,培养新闻技术人才。从1939年至1941年,《新疆日报》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人员训练班,培训学员(当时叫练习生)150人^①。

〈六〉改革政治制度,改善民众生活。

毛泽民任民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期间,废除了地主、巴依专权的“农官乡约”制度。他参照延安实施的民主选举办法,结合新疆

^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日报社的活动》,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经省政府批准,于1941年1月1日公布实施。《章程》公布后,农村由公众推选办事公道、德高望众的人担任区、村长,市镇由居民选举街长。为了培训区、村长,毛泽民还编印了《区、村长须知讲义》等教材,促进了民主建政。1941年8月,毛泽民亲自拟定了《各区、县救济院整顿大纲》,新建了17所救济院,共收容鳏寡孤独及残疾人员3400人。1941年9月10日,毛泽民被推选担任积谷备荒公社委员长,并组织人员编写了《积谷备荒公社宣传大纲》,开展积谷备荒工作,从而保证了贫苦农民的生活。

当时担任行政长、县长领导职务的黄火青、林基路、韩光、许亮、李云扬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工作岗位上也十分注意实行民主,注重民生,成为贯彻六大政策的表率。他们处处从维护各族人民利益、增强各族团结出发,体察民情,解除冤狱,兴修水利,修桥补路,救苦恤贫,办了许多好事。

中国共产党与新疆盛世才地方当局经过5年多的统战合作,至1942年9月,因盛世才公开走上反动的道路,逮捕、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破裂。中国共产党人人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关于旗帜问题的历史回顾

郑必坚 龚育之

“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结尾所说的这段话，是整个报告的画龙点睛之笔。

回顾我们党 76 年的历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以党的创建载入党的史册的。建党前夕，毛泽东就指出：革命的人们要实行“主义的结合”。他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有所指望，回答向何处去；知所趋赴，回答走什么路。中国共产党人立起的旗子，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之前，许多仁人志士寻觅和立起过多种旗子，都没有能够指引人们找到救中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然而，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开辟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努力和牺牲，经历艰难和曲折。从党的二大到六大，各次大会都为此作出过贡献，都还没有能够解决这个历史性课题。

党的七大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标志载入党的史册的。毛泽东思想，按照七大的提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七大作出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的决策，是以建党以来 24 年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的。在这 24 年中，党经历了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土地革命的

胜利和失败，从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以后，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得到空前规模的胜利发展。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延安整风和总结历史，毛泽东思想逐渐在全党取得共识。七大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决不是意味着抛弃或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已经产生了科学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在中国，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党的八大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在这个新的探索的复杂进程中，我们党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很大成就，又经历了两大严重挫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党的九大和十大，举着“文化大革命”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旗帜。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粉碎“四人帮”，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供了契机，但是，党的十一大仍然举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旗帜，没有能够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这个历史责任担当起来，从而成为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邓小平领导我们党进行拨乱反正，总结历史，开创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口号；党的十三大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轮廓”；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新水平上，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阐明了这个理论的指导意义，论述了这个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这反映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这个理论形成、发展和全党对这个理论的认识逐渐提高的历史进程。十五大作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的决策，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理论旗帜问题上的决策的进一步发展。

历史证明，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旗帜，给党和人民带来伟大的胜利。“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纠正“文化大革命”实践和理论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举起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旗帜，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胜利。这样一种大跨度的历史比较，鲜明地显示出旗帜问题、指导思想的理论问题，对于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党的中央都必须有鲜明的旗帜，使全党“有所指望”、“知所趋赴”。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这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鲜明旗帜。

（摘自《旗帜·灵魂·标志》）

邓小平何时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

高 放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被世人称誉为“天才的创造”、“智慧的表现”。然而“一国两制”这个崭新的概念究竟是何时第一次提出的呢？这是许多理论工作者以至实际工作者都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细读《邓小平文选》，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个提法是在1984年2月22日他会见美国乔治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发表谈话中才首次出现^①。一个新概念的形成和提出一般都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深思熟虑的结果，一般都经历了从思想观念的初步酝酿到语言文字的准确表述的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自己于1984年7月31日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所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②据此，我深信：小平同志早已提出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不会是到1984年2月才首次出现，只是最早提出的文稿并未收进《邓小平文选》。这样，我在读书刊时就留意对此有什么新的说法。

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参考消息》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一份重要报纸。在该报1997年4月8日“香港小资料”专栏刊出了编辑部人员编写的《何谓“一国两制”》短文。文中这样说：“1982年9月，邓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② 同上，第67页。

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正式使用‘一国两制’的提法，明确提出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法来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对这种说法我深感疑惑和兴奋。因为我细读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的谈话，其中有“一国两制”的明确思想，但是并未有“一国两制”的正式提法。我想：莫非新华社的同志是根据未发表的谈话内容编写的？于是多次向《参考消息》编辑部的有关同志问个究竟。终于找到该文撰稿者，他说只是参照一本香港问题的问答书编写的，书名与出版单位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真的查到香港知识竞赛活动组委会编的《香港知识五百问》一书（同心出版社与北京科技出版社1996年8月版），在该书第19页上果然是这种说法。其实，此说在先前出版的书刊中颇为流行。例如，写于1984年、由中国新闻社播发的很有影响的《“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及发展》一文就是说：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①写于1988年的《当代中国大思路——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也是说：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时，“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使用‘一国两制’的科学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页）我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因此不可信。

随后我又读到《人民日报》今年6月23日头版头条的专稿《非凡的胆略——邓小平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该报记者张虎生、傅旭、张首映在专稿中写明这是采访了理论家龚育之等人之后合写的。文中说邓小平是从1978年底头脑里开始酝酿，到1982年1月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记者并没有具体地写明是在1982年1月的什么文稿中提出的。收入《邓小平文选》的1982年1月的文稿只有《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一文，显然不是指这篇文稿。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一国两制”论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我便向对邓小平理论和著作深有研究的龚育之同志求教。他接到我的电话后很认真、很热情,亲自回信,并给我寄来两本有关的书:一本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另一本是他与石仲泉合著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1997年2月第2次印刷)。前一书并未收入邓小平1982年1月发表的文稿。后一书第294页写道:1982年1月“邓小平首次使用”“一国两制”的概念,材料出处注明转引自1987年3月30日《瞭望》周刊海外版。实际上是转引自李家泉的《“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一文。

根据这个线索,我又向国务院台湾办公室、中央统战部和台湾研究所的有关同志讨教,并查阅一些书刊,终于弄清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五年年表。

(一)最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978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瓦克时曾经表示:“和平统一实现以后,台湾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也就是可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是“一国两制”构想的萌芽。

(二)1979年1月他在访问美国时向参众两院议员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同年3月29日,他在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进而讲到:“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拥有广泛的自治权,拥有自卫武装力量。当然不能有两个中国,也不能有一个半中国。”他还郑重指明: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香港问题不管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时间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在这里,“一国两制”构想的轮廓已经初步描出。

(三)邓小平于1980年5月12日在回答应邀来访的英国工党领袖卡拉汉提出中英双方在适当的时机应该商讨香港问题时,明确表态:“我赞成你的意见,但现在还不到时机。我们国内还有许多比这更重要的问题要应付。我还是那句老话,投资者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香港投资,将来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处理方法,我们都不会让投资者的利益有所损失。”这是对“一国两制”构想轮廓加深着色。

(四)1981年4月,邓小平在北京会晤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卡灵顿时,重申了1979年对港督麦理浩讲过的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通报了将要宣布的对台湾的方针要点,并且建议英方研究中国对台湾的新政策。这预示着“一国两制”的具体模式将要出台。同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全面阐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正式提出了“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的具体模式。

(五)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接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时明确说道:“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几条。可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新概念正是在这时才第一次正式提出。随后他发表的已收进《邓小平文选》的多次谈话,进一步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的基本内容、实际依据和重大意义作了系统阐述,而且在1982年9月开始的中英谈判中首次付诸实践。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进而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更简明地称为“一国两制”。

由上可见,从1978年底“一国两制”构想的萌芽,到1982年初“一国两制”概念的提出,这个“天才的创造”是怎样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的增多,一步一步地成长并成熟起来的。

(摘自《理论前沿》1997年第19期)

联共(布)领导对国民革命军 北伐态度的演变

[俄]A. II. 卡尔图诺娃著 马贵凡译

译者按:本文作者 A. II. 卡尔图诺娃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科学顾问、历史学博士,她长期研究中国 20 年代工人运动,已发表著作 50 多篇(本),主要有:《上海工人运动(1925—1927)》(1960)、《加伦在中国(1924—1927)》(1970)、《1925 至 1927 年革命前夕中共在工人问题上的政策》(1983)等。1997 年 6 月,卡尔图诺娃博士应邀来华访问,参加了“第八次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革命学术讨论会”。本文是她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原标题为《联共(布)对华政策中的国民革命军北伐问题》,现标题为译者所加。译文略有删节。

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①出版以前,国内外论述苏联对华政策的史学著作都没有涉及联共(布)领导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态度问题,原因是研究者接触不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那些影响莫斯科整个对华政策的秘密决定。文件集的出版,公布了这些决定,从而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使他们得以有根有据地系统研究莫斯科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策划和实施的不同时期对这次北伐的态度,以及决定联共(布)领导所采取的态度理由。

^① 指《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1 卷和第 2 卷第 1、2 册,莫斯科 1994、1996 年版。

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有关北伐的决定看,我们认为,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演变和它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三个时期(与北伐的阶段并不一致):1、从1925年12月到1926年8月末;2、从1926年9月到12月末;3、武汉革命时期(从1927年1月到7月中)。我们只探讨前两个时期的联共(布)对华政策中的国民革命军北伐问题。

我们不再重复在史学著作中已作了充分阐述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酝酿过程,仅提醒不要忘记两个事实:1、由广东革命根据地北上讨伐北方军阀以期统一国家的主张出自孙中山,孙作过两次尝试,但均未成功,因而未能实现自己的意图,国民党认为这个主张是孙的主要遗嘱之一。2、1925年2、3月间广州政府军按照加伦(加伦是B. K. 布留赫尔在华工作时的化名——译者)的计划并在他的参与下成功地进行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而后于1925年5月末6月初又进行了歼灭滇桂军阀唐继尧、刘震寰和杨希闵的战役,使广东革命根据地逐步得到巩固。考虑到国民党极力要进行北伐和客观上需要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地盘,加伦制定了著名的《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工作规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如何做好北伐准备工作作出的多方面探讨。加伦得出结论说:“为了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在计划的注释中加伦补充说:“这个计划的政治方面应由政治代表机构制订,军事计划应是其补充。”^①但是设在广州的政治代表机构(鲍罗廷)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没有制订北伐计划的政治方面。

在上述三个时期中的第一个时期,对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立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可能是1925年12月3日的决定,该决

^① A. И. 卡尔图诺娃:《B. K. 布留赫尔在中国(1924—1927)》,莫斯科1979年版,第199、207页。

定说：“认为拟议中的广州人要在目前进行的北伐是不能允许的（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译者）。建议广州人将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内部巩固上”^①。

现在公布的文件和其他材料证明，这个时期莫斯科在处理北伐问题时，不只是担心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能因西方列强进行干预而失去华南革命根据地。联共（布）领导还担心，到1925年底1926年春会积存不少问题，既有涉及苏联国际处境的问题，包括与它的对华政策有关的问题，又有涉及苏联在华（特别是在西北国民军中）军政顾问和其他工作人员活动的问题。1925年下半年，苏联领导的政策受挫，当时它把赌注下在以冯玉祥为支柱的北方军政事件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5年12月3日的决定实际上重申了6月22日的方针，即“驱散现政府（北京政府——作者），依靠冯玉祥和国民党军队组建吸收国民党人参加的新政府”^②。这个决定较温和地明确说：“我们认为，北京政府应当是一个吸收冯、国民党人和其他较温和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③。然而这个方针未能实现，与之相联系希望也成了泡影。

在满洲，特别是在1926年1月，围绕中东路出现了紧张局势。苏联同日本的关系不是很和谐，两国的利益在满洲发生了冲突。在华南，无论在国民政府中还是在国民党内，统一战线内的情况复杂化了。在国民革命军将领之间的关系中，特别是在蒋介石同华南苏联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古比雪夫（在华工作时化名季山嘉——译者）的关系中积存一些消极现象。苏联军事顾问在西北国民军中的工作的无成效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心。

所有这一切以及一些其他问题，促使联共（布）领导去认真反思和修订苏联的对华政策，包括探讨在最近的将来国民革命军进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卷，第666页。

② 同上，第576页。

③ 同上，第666页。

行北伐是否适当的问题。因此中央政治局几乎同时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以布勃诺夫为首（在文献中称伊万诺夫斯基使团），在中国工作约3个月（1925年2月至4月下旬），另一个以托洛茨基为首，在莫斯科工作。

布勃诺夫使团访问了张家口、包头、北京、广州和上海，了解了事件发生地的情况。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军政政变时，布勃诺夫使团就在那里。由于使团决定向蒋介石及其一伙作出一定的退让，在一定时期保持了某种均势局面。现在发表的伊万诺夫斯基使团文件^①涉及当时在华南出现的所有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探讨这些问题。在本文题目范围内，我们要强调指出，布勃诺夫把苏联在华顾问后来的整个工作都与北伐的前景联系起来，他提醒在华工作的顾问避免产生把这次远征看作是纯军事措施的错误倾向。布勃诺夫1926年3月27日写给鲍罗廷的信含有就北伐问题作出的指示：“没有必要决定北伐问题，因为全军和全体指挥官都确信，北伐是时间问题和行动方式问题。使团认为，现在就要对北方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力求进攻吴佩孚的尾部……同时，要为大量国民军北上做十分认真的准备工作。”^②

可见，加伦和布勃诺夫在事件发生地评估广东局势和国民革命军及国民党中的情绪时，都认为进行北伐是符合逻辑的，应当毫不迟疑地为此做准备。

与此同时，鉴于事态发展，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另一种想法。1926年3月，奉系军阀进攻国民军，占领天津，进而又进逼北京，一个月后国民军放弃北京北撤。考虑到中国的这种事态发展和国际形势，即（1925年12月签订的）洛迦诺协议的反苏倾向、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对苏联实行政治孤立和财政抵制的努力

^① 指伊万诺夫斯基1926年3月24日在广州团工作人员大会上的报告和A. C. 布勃诺夫1926年3月27日写给M. M. 鲍罗廷的信等。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1册，第161页。

(目的在于破坏 1925 年 12 月联共(布)十四大制订的苏联工业化计划),以及欧洲的某种稳定和“帝国主义者全面提出中国问题”,中央政治局进一步明确了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策略方针。在 1926 年 4 月 1 日就托洛茨基委员会起草的文件《我们对中日的政策问题》作出的决定中,中央政治局表示相信,最近一个时期广大工农民众运动会得到发展和加强。同时考虑到“变得十分困难的”国际处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得出结论:苏维埃国家也和“中国革命运动需要赢得喘息时间”一样,需要“延长喘息时间”。并认为“在欧亚新的革命浪潮到来之前,中国革命顶不住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①

在这种情况下,北伐不符合“喘息”方针。同一文件还说:“在中国革命运动缓慢发展情况下,不仅需要把广州看作是临时的革命桥头堡,而且是拥有 3700 万人口的大国,它需要有正确而稳定的经济制度和国家制度……在目前这个时期,广州政府应该坚决拒绝接受关于进行进攻性军事远征和采取那些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者走上军事干涉道路的行动的主张”^②。

1926 年 4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以中央名义给加拉罕发一封电报,重申中央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的指示,并说:“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实行”^③。同时会议记录附录中的个别条款还指出,由于国民军在北方的失利,“我们今后加强广州军队的工作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广州政府对教官和物质支援的要求应尽量予以满足。”^④

由于国民军在北方遇到了困难,国民政府就更加孤立了,国民党右派试图利用“三二〇事件”后果从内部搞垮国民政府,破坏同中共的合作,瓦解国民革命运动。在这种形势下,1926 年 4 月先是

①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2 卷第 1 册,第 166、170 页。

③④ 同上,第 174、176-177 页。

托洛茨基后是季诺维也夫向联共(布)中央提出让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并提出一个“左”倾口号:“打倒同资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① 中央政治局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这个要求作出了反应,于1926年4月29日作出决定,认为有必要“实行在国民党内保留共产党的方针”^②。

其实,南方的形势也在变化。国民革命根据地的地盘在扩大。4月20日贵州与广东联合,5月3日广西也与广东联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蒋介石当选为主席。5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蒋介石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6月5日国民政府又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手中集中了很大的权力。他急于巩固“三二〇事件”成果,认为最好的机会是在近期准备和进行北伐。

而在莫斯科,1926年5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了布勃诺夫使团的报告,在根据这个报告作出的决定中,像以前一样,仍然含有“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内容^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1925年4月成立)收到来自广州的报告后,于1926年5月29日作出决定,请求最高领导机构对5月20日的决定作出补充,说明“坚决谴责进行北伐和准备北伐,绝不意味着可以裁减广州军队和降低它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现在,鉴于广东受到来自吴佩孚方面的实际威胁,更不能这样做,而相反,要继续千方百计加强它的作战能力。”^④

1926年5月,由于蒋介石的一再要求,加伦作为总军事顾问再次来到广州。他对形势作出分析后得出结论:准备远征的时间应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决定》,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220页。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1册,第202页。

③ 同上,第228页。

④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4,目录22,卷宗116,文件夹11,第123页。

当更多些。但是在他到达广州之前，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已经制定了两个远征方案^①。加伦使广州确信这些计划是有缺点的，并制定了新的计划，1926年6月23日由军事委员会通过。

加拉罕竭力要实现最高领导机构“阻止”广州北伐的指示，但是他知道在业已形成的形势下没有取得成功的希望，他在1926年6月12日和7月24日写给契切林的两封信中报告了这个看法。加拉罕希望，如果能占领湖南全省并满足于这一步，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同时他也担心，广州军队援助湖南省可能发展成北伐^②。好像是对莫斯科的严格指示作出的反应，加拉罕在7月24日写信给契切林说：“不能误以为莫斯科作出决定，我们就能迫使广州准确无误地执行。不要忘记，几个月前还发生了‘三二〇事件’。不要忘记，尽管我们在广州毫无疑问有很大影响，但我们不能迫使他们做出那些从广州的整个情绪角度看，从全体国民党员角度看和首先从蒋介石角度看都是明智的和必要的举动，并且这些举动在虚荣心很重的总司令眼里是可以变成为其赢得革命声誉的事业的。”^③

1926年7月9日北伐正式开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于8月5日作出决定，认为鲍罗廷、加伦和维经斯基有责任“向政治局提交尽可能准确的与北伐有关的广州情况报告……还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说明进行所谓的北伐的动机和设想。”^④

这里不能不指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政治顾问鲍罗廷的立场。北伐开始后，他设计了某种抽象的事态发展模式。1926年8月9日在会见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和8月16日在共产国

^① A. H.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事顾问札记）》，莫斯科1968年版，第123页。

^{②③} 俄罗斯联邦外交档案，全宗8，目录22，卷宗112，文件夹171，第58页；全宗100，目录10，卷宗2，文件夹123，第121页。

^④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1册，第307、309、324、325、331页。

际执委会远东局会议上,他提出了“北伐在政治上必然遭到彻底失败”的论点,并断言,“北伐的结局将是蒋介石及其一伙的政治灭亡”。^①他建议等待这次“彻底失败”的到来。所以他曾等待。后来1926年12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成员拉菲斯在莫斯科作远东局工作报告时,注意到鲍罗廷的这个模式,他说:“在广州,我们遇到了对待北伐的特殊态度,即利用蒋介石的失败,(完全虚假地)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左派和汪精卫取得胜利。”^②

1926年8月18日,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在长沙下令进攻武汉。8月末,鉴于国民革命军顺利向北推进并已势不可挡,莫斯科开始认真研究北伐问题。

总结第一个时期,我们要指出:莫斯科的指示,即“不要准备北伐”,“也不要考虑北伐”,在时间上拖得太长,没有考虑广州的事态发展,特别是自1926年春季以来的事态发展,以及国民党内的情绪。莫斯科没有考虑到可供选择的方案,即不管莫斯科态度如何,北伐都可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反正都会给国民党以军事技术上、财政上和军政干部上的援助。蒋介石很明白这一点,在自己的行动中也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开始进行北伐时并不管莫斯科的态度如何。

客观上由于没有考虑可供选择的方案,联共(布)领导在1926年上半年并没有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帮助,也没有向国民党施加力所能及的影响和针对北伐的特殊条件制定国民革命运动的某种妥协性的政治社会纲领。驻广州的政治代表机构更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二个时期。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推进到长江岸边,占领了汉口和汉阳,10月10日又夺取了武昌。这样就从军阀武装手中解放了武汉三镇。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1册,第355—356页。

^② 同上,第419—420页。

莫斯科密切注视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军事战略问题、对张作霖和孙传芳的策略问题,以及国民革命军继续推进的路线问题向广州提出了建议,并指出了冯玉祥武装同广州军队互相配合和两支武装联合的必要性。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大力加强国民党对不久前同广州联合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加剧奉系军阀集团内部的争斗。中央政治局还指出,必须协调包括广州军队在内的所有国民革命军的行动^①。最后这个问题由于当时蒋介石同唐生智第八军军长之间的角逐而显得尤为突出。1926年11月25日,政治局在发给鲍罗廷、加伦和武官隆格瓦的电报中指出,必须“劝告国民党中央利用自己的全部声望和影响消除或那怕是缓和蒋介石、唐生智等将领之间的意见分歧”^②。

然而,苏联驻华顾问对发生冲突的竞争双方——蒋介石和唐生智的评价和在业已形成的局面中对他们采取的策略并不是相同的。如加伦在1926年11月26日写给张国焘的信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需要有唐生智作为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力量”,“需要利用唐把蒋介石掌握在手中”,而且“不能让蒋介石摆脱与他相抗衡的力量,否则他就会变成能与国民政府相对抗的力量”^③。中共中央认为加伦对唐生智的态度是“错误的”,将其视为对蒋介石的间接支持和对唐生智的估计不足^④。鲍罗廷则面向了唐生智。

当时北伐军司令部和总军事顾问没有从广州和莫斯科得到任何指示。可能莫斯科的指示传达到广州后就扣在那里了。后来苏联全权代表机构武官隆格瓦报告说(见隆格瓦1926年12月4日至1927年1月18日南行报告),鲍罗廷“在整个北伐期间没有指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1册,第483—485页、497—498页。

② 同上,第521页。

③ 同上,第519—520页。

④ 中共中央给加伦同志的信,1926年11月9日。

导加伦,没有给他下达指示”,尽管加伦在5个月期间给鲍罗廷发去几十份报告和请示电报^①。1926年10月6日加伦从高安给广州、汉口、北京、上海、莫斯科发电报说:“尽管我发了数十份电报,我仍然未收到任何指示。”^②看来,鲍罗廷在期待北伐的彻底失败,所以他默不作答。很长时间加伦也没有收到中共领导有关北伐问题的任何指示,加伦只是从1926年10月末才开始收到中共领导的信。在这种情况下,加伦只好自己承担解决北伐时期一些复杂问题的责任,说服总司令使之相信解决出现的问题的某种方案的合理性。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在群众性工农运动空前高潮形势下的顺利推进,1926年9至11月间莫斯科开始探索解决一些与北伐有密切联系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它注意到“特别是在与广州联合的省份做工农工作”和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必要性。同时联共(布)领导纠正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从中国发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电报中含有的“左”倾建议。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26年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批准发给北京、广州、汉口和上海(维经斯基)的电报,这是对维经斯基1926年10月22日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的复电^③。中央政治局拒绝了加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豪绅的斗争的建议,认为在当时这个建议“提的过早,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最高领导机构认为,这等于“把资产阶级、商人和豪绅推向帝国主义者和奉天的怀抱”。中央政治局主张,在目前形势下“国民党应当爱护自己可以争取到的一切盟友”。中央政治局还拒绝了一旦国民革命军部队和夏超将军的部队占领上海,“依靠广州军队和浙江军队在该城建立由国民党和商人组成的权力委员会”的计划。最高领导机构认为,“靠工人武装在上海搞的政变有可能湮没在上海无产阶级积极分子的血泊之中,因

^{①②} 中共中央给加伦同志的信,1926年11月9日。

^③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1册,第512页。

此需要谨慎从事”。至于土地问题，中央政治局同意这个问题“应当提上具体日程，没有农民的支持，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央政治局反对立即在农村展开内战，因为“这会削弱国民党的战斗力”。电报中警告说，如果国共两党在它们所面临的任務方面不能协商一致，那么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协调”是“极其危险的”^①。

1926年10月下半月，与北伐相联系的军事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蒋介石急于让东路军向江西推进，试图占领南昌。但是两次尝试均未成功。在武昌的加伦急忙挽救局势，他认为江西的失败可能导致北伐的彻底失败。按照总军事顾问的计划，1926年11月7日占领了南昌。这样一来，由于加伦的帮助，蒋介石巩固了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地位。1926年11月间，从军阀武装手中彻底解放了湖北、江西两省。到此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一阶段结束。在华南，军事因素的作用在日益提高。蒋介石已成了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

从1926年11月下半月起，联共(布)领导开始具体解决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广州迁往武汉的问题。1926年11月11日，中央政治局认为，可以“不反对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往汉口”，理由是“需要依靠湖北工人的同情和在华中尽快组建行政机关”^②。1926年11月16日，第一批国民政府成员由广州出发取道南昌(前往汉口)，与他们同行的有鲍罗廷和张太雷。鲍罗廷在南昌同蒋介石举行了会晤，讨论了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是设在武汉还是南昌。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导致了武汉同蒋介石之间的危机，因为实际上这个问题具有政治性质，涉及总司令是否隶属于武汉国民政府的问题。企图搞个人独裁的蒋介石想方设法回避了这个问题。1926年12月8日，国民政府成员以及鲍罗廷和一些俄国顾问抵达汉口。

从1926年11月末起，在联共(布)的决定中，继续进行北伐问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第1册，第198页。

② 同上，第512页。

题好像已退居第二位。大家一致认为，在作战中遭受损失的国民革命军需要休整。这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积极探讨的中国革命发展前景问题上升到首位。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作出了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其中提出了具有革命国家结构的“中国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针，所谓革命国家结构即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专政”，而政府具有反帝倾向。由此可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制定的纲领中，指导方针发生了变化，由进行国民革命转为进行有限阶级性质和狭窄社会基础的革命，这里没有考虑到国民革命军的绝大多数军官和将领来自于地主资产阶级阶层，而北伐还远没有结束。全会制定的纲领乃是急剧的左转弯，没有有能力在当时实现这个纲领的社会力量的发展水平作保证。此外，这个纲领也是与国民党的纲领性目标不相容的。

总结第二个时期，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由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做了明确的分析性和通报性工作，中央政治局对中国的军政形势和北伐进程了解得很详细。莫斯科向广州提出了基本上符合实际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被扣留在广州，没有传达到总司令和总军事顾问那里。然而北伐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在苏联继续培训中国军事干部并把他们派回国内，给予中国财政援助，定期提供军事技术，以及莫斯科仍坚决主张国共继续合作，并在发给广州和上海(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坚持这一点。此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也还没有传到武汉。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概述

霍海丹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是一套依靠集体力量精心编纂，真实记录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的资料性图书。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这套丛书已累计出版 68 卷 96 册，约 4500 余万字，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80 年代初期，为对研究党史和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帮助与借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着手统一规划，联系中央和全国各省市、军队的党史、历史、档案工作部门及有关单位，共同参与编纂这套主要以资料汇辑的形式客观地反映党的历史上一系列重要事件的丛书。1989 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并后，编纂这套丛书的牵头工作改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80 年代中期后，这套丛书的相当一部分卷（册）陆续编纂完成，由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 年以前为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向国内外发行。丛书迄今已经编成出版的各卷是：

反映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历史事件的《共产主义小组》（上、下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下册）、《衙前农民运动》；反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史事件的《八七会议》、《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下册）、《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下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下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下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一二九运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历史事件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

下册)、《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共3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共3册)、《山东抗日根据地》、《苏北抗日根据地》、《苏中抗日根据地》、《苏南抗日根据地》、《淮北抗日根据地》、《淮南抗日根据地》、《皖江抗日根据地》、《浙东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反映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历史事件的《中共中央南京局》、《一二·一运动》、《淮海战役》(共3册)、《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卷(上、中、下册);反映全国解放和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史事件的《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湖北卷、福建卷,《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上、下册),《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卷共计28卷39册(按90年代初的行政区划,除西藏、海南、台湾外,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各立1卷,其中上海卷、河北卷、江苏卷、浙江卷为上、下两册,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重庆、成都、西安7城市在各省卷中单立分册),《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一、第二卷(起止时间分别为1949-1956年、1957-1978年)、《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福建卷、西藏卷。

此外,还有《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日军在华制造“无人区”》、《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工人运动卷、农民运动卷和统一战线卷、《绥远和平解放》、《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中央卷和部分省级地方卷与城市卷、《“一五”计划和156项工程》、《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三卷(起止时间为1979-1995年)、《1975年的整顿》、《拨乱反正》中央卷和(除台湾外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卷、《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中央卷和(除福建、西藏、台湾以外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卷以及《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历史发展》第一至四卷等多部书稿正在抓紧编纂或者已经编纂完毕,将于近年内陆续同读者见面。再下一步,丛书一批新的卷帙的编纂计划已在拟议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丛书的编纂和出版,逐渐以反映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的重要历史事件为主题。

作为多卷本的系列史料集成，“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从一开始就按照统一的体例进行编纂。丛书已出和将出的各卷，在内容上一般分为“综述”（个别卷中称“概述”）、“历史文献”（部分卷中称“文献”或“文献资料”）、“回忆录”（部分卷中称“回忆资料”）、“大事记”、“附录”等几大部分。按统一的规划，各卷的“综述”部分，由一篇对该卷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做综合性评述的文章构成（文章之名即为“综述”或“概述”，由各卷的编者组织撰写）。“历史文献”部分，由辑录历史上有关的文件、报告、电报、文章、信函而成。“回忆录”部分，选入重要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大事记”部分，由编者在认真搜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有关的时间顺序撰写。“附录”部分，收录史实考证文章、图表、资料索引等等（个别卷的“大事记”也归入“附录”之中）。除此之外，在已经出版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等卷中，报刊资料与其他资料分开，单列为一个部分；《南昌起义》、《皖南事变》等卷中，增设了“参考资料”部分，辑录当年敌方的文电信函及敌方当事人的回忆录，作为研究有关历史事件的参考或反证材料。《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的各省、市、区卷和《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一至三卷中，专设了“典型材料”或“专题资料”部分（有的二者皆有；有的二者合一，称“典型专题材料”），收入若干专题文章，反映一批有代表性的城市单位、工商企业，农村人民公社、乡、村镇及乡镇企业，城镇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工业企业在各有关时期的有关情况。在这后三类书的每一卷的末尾，都附有详细的统计图表，向读者提供各类数据。再者，丛书已出的各卷，一般还载有若干珍贵的历史照片，为整套丛书增色不少。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出版以来，受到众多读者特别是部分专家学者的好评。它不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供了相应的帮助，而且对于人们学习、了解党的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起了积极作

用。这套丛书具有多方面的突出特点,本文限于篇幅,仅就其中的两点略加说明:

一、史料丰富、准确。“广集精编”、“求真求实”、“立准立好”,是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丛书的编者克服种种困难,广泛搜罗、征集史料,钩沉补阙,去伪存真,精心整理,精心编辑,付出了大量劳动,从而使迄今出版的丛书各卷普遍具有较高的史料包容量,并且入选的史料都有很高的准确度(供参考用的敌方资料另当别论),其中一些史料藉丛书的出版才首次向社会公开,或者是经过丛书编者的努力才被发掘、整理出来。由于编者的辛勤努力,丛书的读者只要一卷在手,便能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了解。例如,《共产主义小组》一卷辑录历史文献和回忆录 200 余篇,读者从中可以遍览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等 8 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活动情况。《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卷辑录历史文献 300 余篇、回忆录近 30 篇,向读者系统展现了陕甘宁边区发展、建设的全貌。《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与天津卷,分别辑录历史文献 170 余篇和 140 余篇、收入典型材料约 40 篇和 30 篇、附录统计表各近 20 幅,读者从中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地了解 50 年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上海和天津两大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详细情况。

二、“综述”别具一格。“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的各卷,无一例外地均以“综述”开篇,这是它明显有别于其他同类图书之处。丛书各卷的“综述”,由各卷编者在充分占有和研究历史资料以及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组织撰写,对各卷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做客观的介绍和评论。这既有助于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和了解党的历史,也有助于专家学者及有关部门了解和掌握党史领域的新成果、新动态。例如,《共产主义小组》一卷的“综述”(即该卷“概述”),对长期以来因资料不足而说法不一的当年各共

产主义小组的产生、沿革情况给以清晰明了的交代和评价，既具史料价值又有相当的学术性。《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的“综述”，对50年代中期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并且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予以全面、客观的评价，既肯定其伟大意义和历史功绩，也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和出现的失误，读来颇有新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一卷的“综述”，述及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5年底国共两党关系中的若干变化和两党为第二次合作而做的某些准备，1935年底至西安事变前两党通过4条渠道进行的秘密接触和潘汉年同陈立夫的会谈，西安事变后两党的西安谈判、杭州谈判、两次庐山谈判和两次南京谈判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史事，构思严密，行文起伏跌宕，准确地勾勒出当年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的来龙去脉，并予以恰当的评价，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至今仍在继续编纂出版之中，它对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将起到特殊的作用。

新书选介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卷(建设时期):该书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的力作之一,写的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间作者亲身经历的大事、要事,突出了这一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巨大胜利,也反映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失误。该书史料翔实丰富,说理深入浅出。近期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本书是国务院港澳办原副主任李后撰写的关于香港问题的权威著作。作者结合自己参与香港问题决策与实施的经历,运用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详细记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进程,同时远溯了鸦片战争以来香港问题产生、发展及其建国前的状况。书中披露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关于对香港政策的大量谈话,着重介绍了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酝酿、形成过程。全书25万字,1997年4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拉贝日记》(中文版):该书是德国人约翰·拉贝目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的拉贝先生作为亲历人和目击者,以日记的形式逐日记载了400多起日军暴行,并保存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侵华日军、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的60多份抗议或交涉文件及近百幅有关日军暴行的照片。该书是近年来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

系文件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史料。全书 50 万字,1997 年 9 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回忆中国工合运动》: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倡导的生产自救运动,为支援长期抗战克服经济困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甚至国际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书历经周折,搜集了艾黎、斯诺夫妇、卢广绵等当时主要参与其事者的回忆文章,生动地再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卢广绵等编著。全书 30 万字,1997 年 11 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该书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由中央档案馆编著而成。编者选编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的长征档案史料,其中以电报、文件为主,并收有少量长征路上革命历史报刊上的史料。全书 42 万字,1997 年 11 月由学习出版社出版。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本书是一部研究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专著,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大后方的抗日民主活动,同时涉及国民党对民主宪政的态度及其在民主运动中的表现等。李蓉、叶成林编著。全书 30 万字,1997 年 6 月由华文出版社出版。